

应天
文化季刊

Yingtian
Culture Quarterly

春之卷
2022



应天文化季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吴金山 郭文佳

副主任 高建立（常务） 陈晓明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媛媛 王立 王琰 冯志伟

卢忠雷 刘万华 吴金山 陈晓明

李卫军 张松林 李相中 李瑞华

郭文佳 高建立 常丽洁 薛立芳

总编辑 吴金山 郭文佳

主编 高建立 陈晓明

主编寄语：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伴随着朱自清《春》的声音，一路从少年走到了而今的知天命之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留下的，却是对《春》挥之不去的记忆，《春》之于我，已形成一种丰饶的审美意象，化作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心田。

每当春天来临，《春》的声音油然萦绕耳畔，沉醉于春之烂漫，恍若重回少年时光。此情此景，是耶非耶？虚耶实耶？然无论如何，斗转星移，春天的脚步近了。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四季之始，春天是播种之季，春天是“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在这骀荡的春风里，我们的心灵之约——《应天文化季刊》随之即将诞生。

办刊是我此生心之所系行之所往，从中学时代办手抄报《春江》，到大学四载办宣传板报和油印报，及至参加工作的32年里，其中22年美好年华都投入到学报编辑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少算得上一个报刊人了。

去年，也是春天，按照组织安排，我来到了人文学院工作。人文学院，向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虽然成立于2016年年底，为时不久，但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由原来的文学院和历史与社会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再向前追溯，无论是文学院的前身中文系，还是历史与社会学院的前身历史系，都是商师四十年以上的老牌强势专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学院历经岁月洗礼，弦歌不辍，已形成了人才辈出、底蕴深厚、实力强劲的人文风貌。

目前，人文学院设有汉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文化产业管理系和秘书学系，现有专职教师80余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28人，博士47人，在校学生近2000人，学生社团9个，教师科研氛围浓郁，学生文创活动丰富，呈现出才智氤氲的人文气象。但气象终究是抽象而非具象，如何将这内蕴丰厚的气象留驻在学院历史中，把一段段精彩时光定格于记忆长廊里，是我到人文学院工作以来一直思



考的问题。前不久，偶然看到一则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的“旧”闻，记述的是2015年1月20日总书记到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走访，房子简单古朴，院落干净整洁，植物生机盎然。一家七口，四世同堂，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总书记的“记得住乡愁”这几个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乡愁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乡愁是走到天涯海角都难以割舍的牵挂，乡愁是对故乡深沉的爱的情怀，乡愁是对过往岁月的深情眷恋。乡愁如此，对于学子们来说，菁菁校园又何尝不是他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人文学院，也终将化作离校学子的浓浓“乡愁”。怎样才能留得住这“乡愁”？结合从事报刊工作多年的经验，我开始谋划筹办一份刊物，意在构筑一方承载人文学院学子们独特青春体验与记忆的精神家园，把这份特殊的“乡愁”，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做一定程度的“固化”，以兹作为后来者唤醒“乡愁”的依凭。这，即是创办《应天文化季刊》的缘起，也是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之一；目的之二，是为人文学院师生打造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充分发挥学院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专业优势，开展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彰显人文气象魅力；目的之三，是把人文学院的另一个牌子——应天书院进一步做实做强，以《应天文化季刊》为阵地，开展应天书院文化研究和文艺创作，提升应天书院这一商丘文化图腾的软实力，厚植书院文化，擦亮书院品牌；目的之四，是发挥高校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培养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积极融入校地合作，深入挖掘商丘地方文化，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2022年2月4日，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开幕，张艺谋导演的大型舞蹈《立春》惊艳了全世界，一声清越悠远的笛声响起，万物复苏，新芽涌动，洋溢着满满的仪式感，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国家如此，一地方，一团体亦应如此，“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乘此春和景明、万物竞发之际，让我们携手并肩，扬帆起航，铿锵前行，共筑未来。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2022年2月10日于人文学院（应天书院）



目 录

应天史话

- 范仲淹丁母忧应天府守丧事迹考述（李可亭·1）
北宋应天府王洙与王尧臣文化世家（张学勇·5）

文学沙龙


- 苍劲悲凉话乡思（宋立民 范剑克·19） / 从重庆到宜昌（常丽洁·23） / 那时的爱情（李瑞华·26） / 闲话苏辛（瑞果·28）
 / 北漂一年（肖雯·29） / 故里寻乡（高学梅·31） / 古城纪游（魏中华·33） / 春的无奈（张梦璐·34）
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一：叩问：庄子休先生，您家在哪里？（庄桂森·35）

书院研究

- 明清太丘书院考（刘万华·38）

学术论坛

- 佛教在宋代的发展与儒佛会通的宗教实践（高建立·45）
浅谈《高梅亭读书丛钞》的文献价值（李卫军·52）
焦延寿及其《易林》刍议（陈功文·55）
《哈姆雷特》中“天命”思想的多重文化根基研究（张松林·60）



总编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教学天地

基于 OBE 理念的高校教育教学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以商丘师范学院为例（郭文佳·68）
初中国学课程的学理分析与教育策略（张甲子·71）

学子文苑

试论《呼兰河传》儿童视角下的诗化特性（韩灵·76）
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以 COVID-19 为例（李佳倩·81）

艺术空间

曹天成美术作品（曹天成·88）
商丘师院梁园校区风光摄影作品（高远·88）
风景摄影（麦子·89）
人物摄影（尚启玉·89）

学术动态

金璐璐博士获批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 刘万华博士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顺利结项（4）/ 王阳博士获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34）/
时国强教授、孙佳博士、郝鹏飞博士获 2021 年度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37）/
陈功文博士、刘万华博士著作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59）/ 杨
金华的博士论文获第六届胡适研究一等奖（75）/ 常丽洁博士、陈功文博
士分别荣获 2020 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75）/ 李
相中博士、杨金华博士获批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87）

● 应天史话 ●

※ 范仲淹丁母忧应天府守丧事迹考述 ※

□ 李可亭

《宋史·范仲淹传》载：

（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1]

这是《宋史·范仲淹传》对范仲淹丁母忧应天府守丧事迹的记载。由于记载比较简略，后人对其其中的一些时间、地点、事迹等诸多问题言人人殊，以至于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似是而非甚至是积非胜是的情况，很有必要加以厘清，以正真伪。

一、“迎其母归养”在何处

“迎其母归养”，主要意思是说范仲淹对母亲非常孝顺。

“迎”，基本上没有歧义，就是把母亲从山东长山迎来这里，侍养母亲，也是范仲淹践行自己离家到应天府书院读书时对母亲的承诺。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载：“既长，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2页。^[2]南都，即应天府（今商丘），应天书院所在地。南宋楼钥所作《范文正公年谱》转引《家录》说，当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后：“公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页。^[3]现在，范仲淹“举进士第”，做官“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是正常的。

但“归”在何处，就有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范仲淹迎母亲到广德侍养。诸葛忆兵《范



仲淹传》认为：“到广德后，范仲淹将母亲接到身边”。并说“从外出求学到出仕为官，母亲已经数年不见范仲淹了。因为想念儿子时而哭泣，范仲淹母亲视力已经很差了，几乎到了失明的地步。作为下层官员，范仲淹收入微薄，又要孝敬母亲、养家糊口。”^[4]另一种观点认为，范仲淹迎母亲到应天府宁陵县侍养。马学庆著《范仲淹与商丘》一书，内中有详细考证。马学庆认为事实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接到广德侍养。因为“归养”就是“回家奉养父母”；“迎其母归养”，就是“接母亲到家中奉养。”“广德作为范仲淹的仕宦第一站，肯定不是其家。再者，即使将母亲接到广德，范仲淹刚履新赴任也无暇照料老人。”那么，范仲淹的“家”在哪里呢？“首先，苏州肯定不是其‘家’，范仲淹此时仍名朱说。其次，长山此时也非心中之‘家’，离开长山求学目的就是以为有作为接走母亲。此时，范仲淹的‘家’只有一个地方：应天府家！”马学庆又进一步考证，范仲淹不仅将母亲接到应天府，而实际居住地在应天府宁陵县。^[5]

笔者认为，根据范仲淹的身世、与母亲的感情及其为人处事的态度，他“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后，迎其母到广德侍养是有可能的，不能轻易否定。当地还流传有“卖马接母”的传说，也是人们对范仲淹迎其母到广德侍养的一种美好期待。但由于范仲

淹忙于政务及其他原因，母亲在广德的时间不会很长，很快就转移了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应天府的宁陵县。这一点，亦可从下述的“母丧”和“丁母忧”的地点在应天府得到证明。

二、“母丧”“丁母忧”的地点

据《范仲淹年谱》：“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38岁。……八月，丁母谢氏夫人忧。”范仲淹母亲去世的时间是天圣四年八月。

范仲淹母亲去世时，他在“知兴化县”任上，兴化县在今泰州市。这里的问题是：范仲淹“母丧去官”，那么“母丧”何处？《宋史·范仲淹传》和《范仲淹年谱》均无明确记载。然《范仲淹传》言“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年谱》亦说“守母丧于南都应天府，晏殊出守应天府，邀仲淹掌应天府书院”。这说明“母丧”不在兴化，“母丧”“守丧”均在应天府。

杨德堂《为人做官之道——范仲淹“忧乐思想”启示》一书中也说：“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与应天府李昌言的长女结婚后，其母谢氏便与儿媳李氏居于应天府。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去世，范仲淹辞官回应天府守丧。”^[6]在这里，该书不仅说明了范仲淹在母亲去世后回应天府守丧，而且他的母亲自从“范仲淹与应天府李昌言的长女结婚后”就与儿媳一起一直“居于应天府”。

南宋丁黻《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有“朱氏云，族有在应天府者”。北宋魏泰《东轩笔录》中有“范文正公仲淹贫悴，依睢阳朱氏家”。这里提到的“朱氏”，是范仲淹的同母异父弟弟。继父朱文瀚对范仲淹很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很多关爱。范母谢氏再嫁给朱文瀚后，又生育有三子。范仲淹一人在应天书院求学五年，生活贫寒。于是范仲淹的几个兄弟就和母亲一起来到应天府，用微薄的收入支持范仲淹求学。范仲淹入仕后，“家计于宁陵”，又反过来用其所置田赡养“朱氏”异父兄弟。

清康熙三十二年《宁陵县志》卷九《人物志·明贤》“范仲淹”记载：“范仲淹，本苏州人，少孤，母适长山朱氏，公随就育。及长，读书应天，因家计于宁陵，其异父兄弟朱某者多在宁陵。后公贵，以其田贍之，故与朱氏书每言及焉。”其《艺文志·书类》中《与朱氏家书二通》“序言”亦说：“公本

苏州人，少孤，随母适长山朱氏。及长，读书归德。宋都汴，公立朝之日，多宁陵足迹，惯游地也。其言宁陵家计，或公行馆谷与，抑其异父兄弟朱某者侨宁陵。”^[7]

很明显，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时，受其异父兄弟朱某的接济。范仲淹入仕后，又置田宁陵，以赡养母亲。所以，范仲淹“多宁陵足迹”，宁陵是他的“惯游地”。今宁陵县老城南街有“朱氏井”，为当年异父兄弟朱某的住处汲水井。异父兄弟朱某与范仲淹为同胞弟弟，其情至亲；朱文瀚的大儿子游手好闲，与范仲淹不睦，在此情况下，范仲淹“家计宁陵”，既是史实，也合情理。

三、“厝葬”何处，何时迁葬万安山

《范仲淹年谱》：“天圣六年（1028），40岁。是年，葬母于河南万安山。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经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

一般认为，范仲淹根据自己的身世情况，苏州、长山、宁陵皆非母亲长眠之地，又受姚崇葬母的启发，将母亲从应天府迁葬到了伊川县万安山下。

母亲去世后，范仲淹将母亲“厝葬”在应天府，其具体地点依然是宁陵县。在今宁陵县阳驿乡西北有范氏家田，后形成村庄——范庄。“厝葬”在自己的家田里也比较符合乡情。今宁陵县阳驿乡范庄村的村民能清晰地指出“厝葬”的具体位置——今宁陵县西三公里处的老麻袋厂附近。后又迁葬到了伊川万安山下。

范仲淹丁母忧守丧，时间从天圣四年（1026）八月至天圣六年（1028）十一月。因为天圣六年十二月四日，诏命范仲淹充秘阁校理，则范仲淹终丧期应在十一月。^[8]关于迁葬到伊川万安山的时间，《年谱》说是天圣六年（1028），显系有误。

范仲淹《上求追赠考妣状》中说：“今又俯临葬礼，尚阙褒封”，这是范仲淹向皇帝祈求为母褒封的申请状。又说：“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余两个月。”“改授京官”应指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36岁时“迁大理寺丞”，这可以从晏殊的《举范仲淹状》中“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证。^[9]这样推算下来，从1024年“迁大理寺丞”，“到今七年”，以及“持服月日”和“四年余两个月”，应在1031年（天圣九

年），即是说，迁葬到伊川万安山的时间是在母亲去世五年之后。

四、“真”掌应天书院及时间

《宋史·范仲淹传》：“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真府学。”“真”，置也，安排、放置之意。没有具体说明让范仲淹“掌府学”或“做山长”。《资治通鉴长编》说“掌府学教习”，^[10]《年谱》亦说“天圣六年(1028),40岁。掌应天府书院教习”，都直接用了“掌”字。《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卷一载：“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这里，范仲淹不仅是“掌府学”，且“训督有法度”。

“掌”与“真”，显有不同含义。而“教习”之职，其义有二：一是传授学业（教授），有“教师”之意；二是学官名，掌课试之事，且“教习”之官设在明朝。由此可见，范仲淹“掌府学”，不是做山长，应是书院的教师，兼管课试之事，且“训督有法度”。《资治通鉴长编》所说“掌府学教习”，是比较确切的说法。

《宋史·晏殊传》称晏殊“善知人”。“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当时，同在书院执教的还有王洙和韦不伐。可见，晏殊延聘的名师，并非范仲淹一人。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知应天府，他重视教育，延请名师，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时范仲淹正在丁母忧，晏殊“闻仲淹名”，于是“召真府学。”在《举范仲淹状》中，晏殊对范仲淹评价甚高：“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范仲淹不负众望，在执教应天书院近两年的时间里，“四方从学者辐辏”。

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时，写下了著名的《南京



书院题名记》，追溯应天书院办学历史，抒发对应天书院的感情。又作《上执政书》，阐释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忧乐”思想亦在此时期形成。

五、丁母忧期间是否到嵩阳书院讲学

《范仲淹传》与《年谱》均未言到嵩阳书院讲学事。

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之《嵩阳书院》（宫嵩涛著），言范仲淹与欧阳修、梅尧臣、晏殊、尹洙等人曾到嵩阳书院讲学，但时间不在丁母忧期间：

范仲淹，在北宋真宗赵恒在位期间(998-1022)，曾到嵩山崇福宫奉安真宗赵恒御容（画像），让大家朝谒，其时讲学嵩阳书院。据明傅梅《嵩书》卷六《宦履篇·宋范仲淹》记载：范仲淹“尝奉真宗御容崇福宫，登高履胜，与欧阳修、梅圣俞有嵩山唱和诗十二章，今传于世”。清景日吟《说嵩》卷十七《传人二·宋范仲淹》也有“尝奉真宗御容崇福宫，登高履胜，与欧阳修、梅圣俞唱和焉”的记载。……在崇福宫奉安真宗玉容是件大事儿，很多官员、社会名流都到嵩山崇福宫真宗像前朝谒。这其中就有欧阳修、梅尧臣、尹洙、晏殊、晏几道等人。朝谒之余登嵩山、访名胜、看古迹，成为范仲淹和众好友的“自由之旅”。唱诗赋词，不亦乐乎。其中范仲淹在《自峻极中院步登太室中峰》诗中说的“不来峻极峰游，何能小天下？”成为登嵩山俯瞰中原的千古佳句。因崇福宫毗邻嵩阳书院，书院自五代后唐始，讲学之风浓烈沿传，气氛热烈。范仲淹有早年在应天书院读书和讲学的经历，嵩山之行，书院讲学，必不可缺少。因为是和众位朋友在一起讲学，主要听众是书院生徒。他一反平日严肃刻板模样，讲到动情处，或击掌高歌，或迎风长啸，虽然有点放浪形骸，但其自然无拘无束的讲态，让听者也自由随形。^[11]该书在第七章“嵩阳书院的历代名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但《欧阳修年谱》记载：“明道元年（壬申），公年二十六。是春及秋，两游嵩岳。秋，盖从通判谢绛奉御香告庙也。礼毕，同游五人，皆见峭壁大书神清之洞。”据《欧阳修年谱》，游嵩山讲学嵩阳书院，在明道元年（1032）。这一年，范仲淹43岁，欧阳修25岁，梅尧臣30岁。这一年的春天，

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杨愈、谢绛等人嵩山聚会，是偶遇，没有事先预约。范仲淹是从东京开封出发，西行去嵩山，经郑州、巩县入轩辕关到登封县。而欧阳修、梅尧臣、杨愈、谢绛、尹洙、晏殊、晏几道等人则是从西京洛阳结伴东行，经过洛阳县、偃师县，登上轩辕关，来到登封县。他们意外谋面，欣喜地结伴畅游中岳，崇福宫、会善寺、少林寺、中岳庙等名胜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宫嵩涛《嵩阳书院》一书，言范仲淹游嵩山讲学嵩阳书院之事在“丁忧”之前，而《欧阳修年谱》之记载又在“丁忧”之后。那么，范仲淹“丁忧”期间是否到嵩阳书院讲学？何时讲学？还需要再作细致研究。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宋史·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67-10268页。

[2]《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2页。

[3]《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页。

[4] 诸葛忆兵：《范仲淹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22页。

[5] 马学庆：《范仲淹与商丘》，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6] 杨德堂：《为人做官之道——范仲淹“忧乐思想”启示》，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

[7] 转引自马学庆：《范仲淹与商丘》，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7页。

[8]《宋会要·选举》31；《资治通鉴长编》卷104，第2419页。

[9] [元]脱脱：《宋史·列传第七十·晏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97页。

[10]《资治通鉴长编》卷105，第2435页。

[11] 宫嵩涛：《嵩阳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48页。

（作者简介：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学术动态●

金璐璐博士获批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1年9月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对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申报结果进行了公示，我院青年教师金璐璐申报的《礼制及其变革与汉代文体谱系的形成》成功获批。在此之前，金老师曾以《汉代职官制度视域下的汉代文体研究》中标2015年教育部青年项目。此次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仅是学界对其十余年从事学术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标志着我院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中连续十年中标。据悉，金老师今年还申报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果尚未公布）。此次更上一层楼，与其个人勠力向学与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今后我院将继续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力争每年均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入选，俾助力一流学科及申硕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刘万华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2021年8月3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8月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结项情况》。刘万华老师的《明清商丘宋氏家族文学研究》历经数年学术攻坚，正式完成结项工作。据悉，刘老师十年如一日，专研商丘家族文学与家族史研究。在此之前，其编纂之《宋荦全集附宋氏家集》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曾获2019年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及河南省社科成果教育厅一等奖。此次结项，不仅是对其过去十余年学术工作的充分总结，必将为其明年继续申报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提供扎实的研究基础。上述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我院各级领导对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

北宋应天府 王洙与王尧臣文化世家

□ 张学勇



家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家的成员。世家包含了家族、家世的意味，是世代为官的家族。文化的传承、积累与发展，人才的培养与成长，离不开家族的影响，文献也多有记载。北宋时，作为陪都之一的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成

为京东、京东南文人讲学游学的荟萃地，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洙与王尧臣文化世家便得此惠泽滋养。如此“三代十二进士”，在封建社会里实属罕见，王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代表。

一、应天府虞城王氏先祖探源

北宋应天府（宋州）虞城人王洙与王尧臣是叔侄关系，他们的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北宋欧阳修给王尧臣写的墓志铭中记载有：“公（尧臣）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州衙在今山东单县）刺史，遭世乱，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后又徙宋州之虞城，今为应天虞城人也。”^[1] 欧阳修给王洙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了王洙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和官职情况，“公（洙）应天宋城人也，曾祖讳厚，祖讳化，赠太傅。父讳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2] 南通大学王树林教授在编著的《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中，记载了王砺的父亲王化的情况，“王砺的父亲王化是应天书院宗师戚同文的好友（当有姻亲关系），王砺是戚同文名弟子，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其子孙多至通显。”^[3] 从以上资料看：如果王尧臣为应天虞城王氏七世，王尧臣的叔叔王洙当为六世，王砺当为五世，王化当为四世，王厚当为三世，二世名字不祥，王尧臣的一世应该是北宋欧阳修给王尧臣写的墓志铭中记载的“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刺

史”，后“徙宋州之虞城”，就是应天府（宋州）虞城人。

二、五世兴盛——王砺

王砺（～1015），南京应天府（宋州）虞城人，生于五代。王砺的学问渊源于应天书院的祖师，即应天府名儒戚同文。王砺通礼学，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踏入仕途后曾宦游金陵、余杭等地。太宗雍熙末（约987），由秘书丞知袁州府。真宗景德二年（1005）四月，王砺以职方员外郎知越州，官至屯田郎中。王砺喜好吟诗联句，常于清夜诗兴大发。有时诗思滞塞，便假寐沉思，至夜半方罢。王砺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4]

王砺是宋州楚丘人戚同文的著名弟子，王砺之后，他的子孙们皆得力于睢阳之学，代有隽秀，多登台阁，甚至位列公卿。

北宋应天府南京人张方平学成于应天府书院，在给王砺的儿子王洙写的墓志铭中云：“父砺，赠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司虞，生五代，屯会委高贵，从儒者游习，通礼学，州辟从事，始为士族。时乡人正素先生戚君同文聚徒讲业，学者自远方至，仆射府君，戚之自出，着牒门下，以高业取甲科，仕至屯田郎中，名载国策。实生子七人，六登进士第，世绪炽昌，遂为睢阳冠冕。”^[5] 《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王砺事母甚谨，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至屯田郎中。子洙、澹、渊、冲、泳、洙。洙子稷臣，澹子尧臣，并进士及第。洙子梦臣，进士出身。”^[6]

王砺长子王涣官至礼部侍郎，仁宗庆历末与杜衍等为睢阳五老诗会。二子王洙精于经学，真宗时主教应天书院，蔡齐推其“经明有风节”。应天书院初建“虚师席待公，自诸耆旧大生，皆执经北面。材经匠手，无不成器”^[7]。其第四子王冲，“少则好学，议论依名节，慷慨自喜，不与众浮沉”。^[8] 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与范仲淹同学于书院，“尤长于诗，诗凡千余篇”^[9]。其幼子王洙，更是博学多才。欧阳修说他，“始能言，已知为诗，指物能赋。既长，

学问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训故字音，无所不学，学必通达。”^[10]王砺的七个儿子天资不同，各有异秉，其仲子王洙与幼子王洙都是应天书院名师，与戚氏世代交好。正是睢阳书院因材施教，成就了各自的事业。

南宋王应麟在《玉海》中记载有：“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聚徒百余人，许驥、宗度、郭承范、董循、陈象舆、王砺、滕涉皆其门人。”^[11]今检《河南通志·选举志》载，太宗朝进士三十三人中有六人是归德军宋州人，^[12]“王砺，虞城（属宋州）人，太平兴国五年（980）第，屯田郎”。^[13]

今有《赠日本僧寂照》诗，喜为诗，《王氏谈录·训子》记王洙回忆其父王砺，“先公在金陵、余杭，清夜多作诗，必召吾起草或属数句，未成且假寐，吾持笔侍侧，往往至中夜不敢退”。^[14]

王砺亦终身事戚同文如父，承戚氏衣钵，传戚氏之学。北宋南京应天府虞城的王氏家族，自五代至国初的王砺，到王砺之子王涣、王洙、王渊、王冲、王泳、王洙等皆登进士第，再到官至相位的王尧臣及兄弟行稷臣、梦臣、纯臣、钦臣、力臣等及以后子孙们，多举进士，他们学行并称，孝悌传家^[15]。以文学、吏治通显于北宋中后期。这个终北宋一代的显赫的文化世家，与应天书院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以后应天书院建设与发展，王氏一门做出很大贡献。

戚同文去世后，王砺仲子王洙及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一直共同支掌戚氏学堂。直至大中祥符（1008～1016）初曹诚重建书院并得到真宗皇帝赐名，王洙成为书院名师。王砺幼子王洙又加入书院的授徒队伍，功绩卓著，他从应天书院迁除国子监、翰林院等职，掌教国子之学，将应天书院的授徒之法带入大宋国学。纵观北宋一代，是戚同文及其应天书院培育了王氏子弟，而王氏子弟为应天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6]。

三、六世鼎盛

（一）王砺长子——礼部侍郎王涣

王涣（972～约1062），王砺长子，宋太宗（976～997）末年举进士第，仁宗庆历元年（1041）以太子宾客退居南京。仁宗皇祐（1049年～1054

年3月）、至和（1054年3月～1056年9月）年间与太子太师致仕祁国公杜衍、司农卿致仕毕世长、兵部郎中致仕朱贯、驾部郎中致仕冯平，共建睢阳五老诗社，饮酒赋诗，优游陪都，官终礼部侍郎。^[17]嘉祐二年（1057），王涣改礼部侍郎。王涣即“睢阳五老”之一。

这五位长寿老人均是“退休高官”且年至耄耋。丞相祁国公杜衍80岁，驾部郎中冯平87岁、兵部郎中朱贯88岁、礼部侍郎王涣90岁，年纪最长的司农卿毕世长，时年已经94岁。出于对睢阳五老的敬重，睢阳当地一位丹青高手为五人各绘制了一幅全身像，题名《睢阳五老图》，并让五人在图上赋诗。钱明逸于北宋至和三年（1056）为之作序。此画绘制精美，尤其是人物脸部描绘细腻生动，栩栩如生。欧阳修、晏殊、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苏辙、黄庭坚等18位北宋重量级人物纷纷在画上题诗题跋。

当时王涣题诗云：

分曹归政养耆年，李下何由更正冠。

贤相赋诗同啸傲，圣君优诏去盘桓。

庞眉老叟俱称寿，凌雪乔松岂畏寒。

屈指五人齐五福，乡人须作二疏看。

范仲淹有诗《依韵和同年朱兵部王宾客交赠之什》云：

鹤禁兰宫达了身，高居南阙重为邻。

西园冠盖时时会，北海樽罍（léi）日日亲。

共弃荣华抛世态，同归清静复天真。

一如刘白东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从诗中可以看出范仲淹与王涣、朱贯的情谊是很深的。

南宋至清末，上百位名人为之题赞，可谓流传有绪，堪称一部国宝级画作。《睢阳五老图》的珍贵不仅在于画作本身，历代名家的题跋在书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该画于民国时期以册页形式被一分为五流出海外，《毕世长像》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冯平像》和《王涣像》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朱贯像》和《杜衍像》藏于纽黑文耶鲁大学博物馆。

王涣有《睢阳五老会诗》《昭庆寺看芍药》诗二首，诗句二。^[18]涣子：稷臣、梦臣。

(二) 王砺次子——太常博士王洙

王洙(974~1030),字希圣,南京宋州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县)人。王砺次子,应天府书院初建,虚师席以待公,自诸耆旧大生,皆执经北面。材经匠手,无不成器。四方学校,其规模条教,皆源于应天。乡举宾兴,尝占第一。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第,仕至太常博士^[19]。王洙几乎竭尽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应天府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他不仅是睢阳戚氏学堂弟子,更是应天书院的名师。天圣八年(1030)卒,终年56岁。洙长子尧臣,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次子纯臣,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文雅开敏,邦之彦也。一女归魏氏,国子博士舜卿。孙五人:廷老、商老、同老,并秘书省正字;国老、周老。诸弟子侄先后登进士科者十二人。

1. 王洙早年的读书求仕生涯

王洙出生于宋太祖开宝(968~975)末年(约974),少年时亲聆宗师戚同文的教导。当时感学大盛,天下才士不远千里而来。着牒(dié)门下的弟子数百人,登进士的五六十人。做京官,践台阁的十余人。王洙的父亲就是宋太宗(976~997)在位之初中进士的,当时王洙六七岁,少年“风调雨顺,凛凛有奇节,尝慨然曰:士志于道,在得其大者、远者,学而不究于古今之变,究而不适于几深之用,岂士也乎?”^[20]正是当时的睢阳学风士风,淬砺着这位少年才俊,青少年时期就立志高远,探学术大道、究古今之变于“几深之用”。这为他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名师奠定了根基。

真宗登基之初,大兴文治,广揽天下英才。据夏竦《文庄集》记载:“景德二年(1005)夏六月,颁劝学诏于天下。秋九月甲寅,诏张六科取士,广文德而励儒业也。”^[21]宋初开科取士尝立三科,盛度建言真宗,请设四科以取士。即“经术之士若典刑备举则政教流行,请设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尧舜臣以事,不直以言语笔札求人,审官期于适用,请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今戎警未除,调边劳戍,必资良帅以集事功,请设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狱事之繁民命所系,若推按失实,则枉情伤生,请设明晓法律、能按章覆问科”^[22]。景德二年(1005),沿盛度前议,遂置六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严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23]诏下天下,文士奋起,年近而立的王洙,更是跃跃欲试,参加了这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张方平《乐全集》载:“公(洙)奋曰:此非吾时邪?起就贤良,举文中高选。”^[24]中选后,等待朝廷召用。

2. 王洙执教应天书院及宦迹考探

景德三年(1006),以宋州为应天府。此时,宗师戚同文已逝,戚氏学堂因戚维、戚纶服官在朝,无暇经营,委戚纶长子戚舜宾主持。宋州自五代以来都是节制京东路的重镇,“地望雄于征镇,疆理接于神州。实都畿近辅之邦,乃帝业肇造之地”^[25]。当时官学未兴,路府州县皆不设学宫,每当朝廷中书省下京东地方选材,考试都在宋州戚氏学堂举行。时戚门弟子遍布朝野,美名传扬,戚氏之学的沿绪与复兴,成为戚氏后人和戚门弟子的迫切愿望。宋州富家曹诚,因应形势,大义慷慨,捐资五百万,助学堂修建。戚维、戚纶与在朝戚门弟子(王砺当为其重要参加者),划一而上,在原建筑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成了一座宏伟雄敞的新学宫。天下文士闻风而来,宋州宋城又出现了感学振兴的新气象。大中祥符二年(1009),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真宗大为佳叹,应天府戚氏学堂正式赐名为“应天府书院”。张方平云:“因后中书试里人于正素(戚同文,私谥“贞素、正素”)旧庐,建庠序,虚师席待公。”^[26]新建戚氏学堂,虚席以待王洙这位新科学士。王洙作为戚门再传弟子,当然当仁不让,王洙时举贤良,遂成为应天府书院赐名前后的书院讲师。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皇帝祀老子礼毕,回驾应天府,升应天府为南京,大赦天下,并张举六科。王洙居应天书院师席,遂应试,再举“服勤词学科”,廷试优等。因用韵被主考陈彭年指为有疑音,欲置乙榜,王洙于真宗前当面辨释,并批评贵近大臣,伸道不为名,虽中选而不就任。大中祥符八年(1015)复登进士第。张方平云:大中“祥符七年(1014),景毫回銮,举服勤词学科,既廷试第优等。考官翰林学士陈彭年指公赋用韵有疑音,上亲为问公(洙),言彭年所指非是,援据详明。欲处公(洙)乙第,辞不就,以布衣浊贵近于上前,伸道不为名,士林魁之。明年(1015),乃登第释褐,试校书郎,临江决曹掾。”^[27]这年,王洙在应天府书院前后授徒

已有七年之久。

大中祥符八年（1015），父亲王砺卒，登第未及到官，遂守丧家居，并继续于书院执教，直至天禧元年（1017）服除，调维州团练推官。徙新平幕，举黄州麻城榷茗，迁大理丞，知楚州山阳县。改殿中丞，详议审刑，赐五品服。天圣元年（1023），仁宗初即位，太后听政，“弟（王）冲宰陈留，大姓田氏豪黠，赂交权要为奸利。（王）冲弹治之急，则飞语毅下，浸闻献后付中人，推（王）冲性刚毅不辱，终莫肯承，献后盛怒，谪（王）冲雷州。公（浚）坐监征淮西，顷之移倅海陵（泰州），就郡改奉（太）常博士。”^[28]时淮甸水灾，饥民数以万计，王浚发廩粟并捐出自己家中的囤粮供给饥民，并巡视赈灾，每事必躬，因遭疹疾，不幸去逝，年仅五十有六岁。

张方平说他当初参加六科考试，名动学士文人间。一些贵家子弟四处游走皇亲国戚、名公大臣之间以争宠论荐，或自托朋辈推附，但由于王浚学问早已闻名天下，且执教应天府书院，没人敢与他攀比。在朝大臣以为他出仕一定能上至公卿，被用于时，一定能建功立名。但两次六科中选，一次正逢应天府书院初建，一次因为与当道大臣争论学术问题而皆不及授官。以正科中进士，正逢父丧，又尽孝守制三年。及劾官释褐，所至必有政绩，初潍州团练推官，查验水情，导流筑堤，为民兴利除害；审狱决疑，正义凛凛。以榷茶税官莅黄州麻城，慎用不切实际新法，而颀用旧制，麻城成效最着。官殿中丞，详议审刑，案无留滞，屡蒙诏褒；上朝事疏便宜十余条，皆见纳用，朝议嘉其论事有大体。蔡齐时在中书，荐王浚经明有风节，命官御史之职，但“命垂下而公不待，士君子惜之”^[29]。观王浚一生，“才高而位不充，志大而时不与，曾莫展发，殁于中身”！^[30]惜哉！！

3. 王浚的教学与学术

王浚虽为官仕途坎坷，但在应天府书院的执教授徒，却使他名垂青史。张方平云：应天府书院初建，“虚师席待公，自诸耆旧大生，皆执经北面。材经匠手，无不成器。后登朝廷，著名迹者甚众。今四方学校，其规模条教，悉权舆于宋焉。乡举宾兴，尝占第一。”^[31]张方平说他首先是学问渊博，学术深正，一些老学者、名弟子都非常信服，“皆执经

北面”。其次，说他授徒成果显著。材贤之士经匠手指教，无不成器。多登进士第，仁宗朝着名迹者甚众，如范仲淹、蔡抗蔡挺兄弟、赵概、张方平等，还有他的弟弟王洙、儿子尧臣、纯臣兄弟，多登大位，为一朝名臣。应天府下各县，乡举宾兴，与全国其他府州相比，尝占第一。其三，是他在书院管理制度的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王浚任教期间，书院内部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比较完善。除书院主持之外，还有“掌教”、“管记”等职务。王浚的主要任务是“掌教”。据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载，当时奉（太）常博士王浚“时举贤良，始掌其教”。职方员外郎张吉甫“时以管记，以领其纲”。“掌教”当主管书院的教学工作，如课程安排，学子考校等。而“管记”当主管财务及后勤工作。至仁宗朝地方庠序复兴，四方州府学校，其规模条教，悉遵应天府书院的教育范式。

王浚为教，爱护生徒，石介在应天书院读书时，家境贫寒，尝助以食。宋朱熹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十有云：“守道（石介）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浚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32]潘永因编《宋稗类钞》也记载石介在书院贫苦读书，教师王浚赠以食物而石介不食的一则故事：“石守道（石介）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固穷苦学，世罕其比。王侍郎浚闻其勤约，尝以盘餐遗之。守道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但常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复继！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王大嗟重之。”^[33]王浚见石介（守道）穷苦勤约，不仅不弃，还见赠以食物。这则故事不仅说明石介安贫乐学，也体现了应天书院“有教无类”，不讲门第贫富的教育思想。爱护在学寒素子弟，这是自戚同文传下的学风院风，如范仲淹、孙复等皆得书院老师的资助。^[34]

王浚有《文集》十卷，^[35]后佚。《备对制策》十卷，^[36]后佚。诗有“东湖富泉石”^[37]句。

（三）王砺四子——南京留司御史台王冲

王冲（989～1056），字景儒，王砺的四子，王浚弟。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中进士，知兴国军永兴县，后授武昌军掌书记。仁宗天圣（1023～1032）初历知寿丘、晋源、陈留县。天圣九年（1031）五月，因讦宦官罗崇勋，罢官配雷

州编管。时任审刑院详议官、殿中丞的王洙亦连累监蔡州税。王冲后于景祐（1034～1038）初起用知越州会稽县，范仲淹于宝元二年（1039）知越州，二人曾相约游云门山。

范仲淹有《题留云门山雍熙院》诗云：

一路入岚堆，还警禹凿开。

林无恶兽住，岩有好泉来。

云阵藏雷去，山根到海回。

莫辞登绝顶，南望即天台。

王冲有和诗《次韵范公游云门》云：

高蹶五云堆，平看万象开。

樵风溪路远，华雨梵天来。

刹倚三峰直，钟传万壑回。

叨陪上万燕，依约近中台。

仁宗康定（1040～1041）初，王冲通判干州、华州。历知干、洋、秦等州，领南京留司御史台。嘉祐元年（1056）卒，年六十八。^[38]

主要作品：《备边策》《御戎策》。宋刘敞《公是集》谓“康定初，复为秘书丞，通判乾州。自元昊畔边，边将数战不利，而民力消耗殆尽。王冲上《备边》《御戎》等策。”^[39]

《诗集》千余篇，宋刘敞说他“喜读书属文，尤长于诗。诗凡千余篇，读之，其志可见也”。^[40]今存《次韵范公（仲淹）游云门》《续寄一章》诗二首。^[41]

（四）王砺幼子——翰林学士王洙

王洙（997～1057），字原叔，一字源叔。宋城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县）人。王砺最钟爱的幼子。生于太宗至道三年（997），仁宗天圣（1023～1032）间进士，官至尚书吏部郎中。卒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谥文节。洙子：叟臣、力臣、钦臣、陟臣、曾臣。

王洙少年时就开始舞文弄墨，且诗赋皆能。王砺宦游时，常带王洙在身边，王砺每清夜吟诗，王洙便为他父亲抄录吟成的诗句。在兄弟七人中，王洙声名最显，学问最为博深。王洙长大成人后，从经、史、百家，到图纬、方技、阴阳、五行、律吕、天文、算术、音律、训诂、篆隶等无所不学，且学必通达。随着他学问的日进日博，每每与人讲论，精微而有条理，名臣贤士交相称赞。王洙曾校定《史记》、《汉书》，预修《集韵》、《国朝会要》等。

仁宗朝参与制定明堂礼仪、雅乐制度。^[42]

1. 王洙的求学与应举

《宋史》本传说王洙“少聪悟博学，记问过人”。欧阳修《文忠集》记载：“其生始能言，已知为诗，指物能赋。既长，学问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筭（suàn）法、训故字音，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其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之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时名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着天下。”^[43]自幼深得父亲王砺的喜爱，十五六岁时，随父官金陵、余杭等地，清夜多作诗，必召王洙起草或属数句，未成且假寐，王洙持笔侍侧，往往至中夜不敢退^[44]。时二兄王洙与戚舜宾全力经营戚氏学堂，继而主教应天府书院，王洙与范仲淹、嵇颖、石介等在书院同研共习，与嵇颖（字公实）、窦充（字公持）最善，张方平《乐全集》说嵇颖在书院“与王洙源叔、窦充公持为益友，三人更相箴微，闻义而徙，偕成德业，乡论称之。”^[45]天禧三年（1019）初举进士，《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天禧三年（1019）春，“乙亥，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mào）缙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稹引咎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时有司欲脱宋城王洙，问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愿易也。’遂与稹俱罢。”^[46]郭稹，字仲微，开封人。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喜收藏，孙奭、冯元等学者推之。与王洙少年为友。初举二人同榜，而郭稹因母丧未落第，王洙拒卖友求荣，可见其少年意气。

2. 王洙执教应天书院

天圣二年（1024），王洙再举进士甲科，补舒城（今属安徽）县尉，坐覆查县民钟元杀妻不实得罪而罢官，归虞城。时兄王洙出仕，戚舜宾等知王洙学富力强，延入应天书院为讲说。天圣五年（1027），晏殊为应天知府、留守南京，力兴书院教育，读到王洙《驯鹤小池赋》，非常喜爱他的文笔风格，于是以礼相待；又延范仲淹主教书院。天圣六年（1028），朝廷调王洙富川县主簿，晏殊让范仲淹代笔，举荐他继续留书院讲书。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十八《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

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府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曰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干冒圣威，臣无任云云。

晏殊乞留王洙为书院讲书时，王洙此前在书院已执教三年余，当时范仲淹因守母丧掌教应天府书院，才有代晏殊撰此留状。这则史料还记载，当时书院有至圣文宣王庙，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并赞扬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当年范仲淹离开应天府书院，而留教的王洙接掌书院教席。《宋史》王洙本传也有“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荐为府学教授”的记载。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亦云：

初举进士，为庐州舒城尉，坐事免官。归居南京，故相临淄晏公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礼。久之复调贺州富川主簿。未行，临淄公荐其才，留居应天府学教诸生。会诏举经术士为学官，京东转运使举公应诏，召为国子监直讲。

王洙自仁宗天圣三年（1025）至天圣六年（1028）在应天府书院任讲说。晏殊入京为御史中丞，荐王洙留任，直到仁宗的景祐元年（1034）入京师为国子监直讲，前后在应天府书院任讲说将近十年。在晏殊任后的七年中，蔡齐、宋绶、刘随等相继官应天知府南京留守，对王洙礼遇有加，尤其是宋绶，公事一毕，便邀王洙相对而坐，或论书议策，或切磋诗文，相知甚厚。王钦臣《王氏谈录》中《相知之厚》条记述了王洙任教时与晏殊、蔡齐、宋绶在应天书院互为知己，讲论学问的往事云：

蔡文忠守南都，公时为书院说书，且将荐公，而谓公曰：欲荐而未有人可令草奏以叙君之美，莫若烦君自为之。公谢曰：才不足当公荐。今石太祝延年众爱重，宜置某而荐石。蔡公曰：石固欲荐之，

亦当自令草奏。公徐曰：得之矣。遂命公草石奏，而石为公草奏。初罢舒城尉里中，是时晏丞相为留守，方修后圃，而使诸曹掾赋驯鹤小池。户曹掾玉初邀同赋，既成，并上临淄公。公喜，遇之甚厚。及临淄公还朝，力荐为应天府学讲书，语在公家传中。是后蔡文忠继守留钥，复待以上客。蔡公既去，而宋公来，其所以遇之尤加。每公事退，开郡阁邀公，殆日以为常，相对但持书册论议而已。宋公嗜食干果，罗列左右间，或相劝食，或以文章示公。句意有所欲易，及一字不安者，必曰：君试思之。公曰：以某句某字如何？曰：更试思之。或至再三遂用。后宋公还朝，公亦入上庠，又陪佐史局，无一日异于初。宋公薨，公为之议谥，撰著行状，象篆勒墓铭，诸宋以服带缙钱遗于公甚厚，公不发其封悉还之。李邕公戏简公曰：可惜笔端得来尽被车儿推去。后老，思宋公平昔之知，尝叹曰：相知之厚，不愧古人，今亡矣夫。去年公谒告还里中，钱于飞侍读为留守，其妻宋公女也。闻钱宴公于郡斋，曰是往者日与吾父论书于此斋中，吾家为肴羞尊酒以待者也。因泣下。明日，钱以其妻语语公，公亦为凄然。

晏殊作为真宗、仁宗间的著名文人，在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南京留守时，修后园花圃，命府署各曹掾赋《驯鹤小池赋》。户曹掾玉初邀王洙同赋，赋成，上之晏殊。晏殊见王洙赋，大喜，遇之甚厚。说明当时南京留守官员与书院讲师常有赋诗为文之雅聚。蔡齐继守南都，更是厚遇王洙。蔡齐是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亲点的状元，当时轰动朝野，学问人品为时敬仰。蔡齐早知王洙学问欲荐王洙入京为官，但对王洙还不了解，想先让王洙代自己草拟一荐状。而王洙反而推荐他的应天书院同学好友石延年。石延年与王洙皆是应天南京名士，又是著名诗人。蔡齐被王洙不为名利为国荐才的高尚精神所感动。遂让王洙代草石延年荐状，而让石延年代草王洙荐状，一时传为佳话。天圣九年（1031），蔡齐入朝为御史中丞，宋绶继知应天府留守南京。宋绶为留守三年间更是与王洙建立了深厚情谊。宋绶常开郡阁邀王洙探讨学术，相对持书册论议，或以文章示王洙请王洙评点。宋绶卒，王洙为撰行状，并为其墓铭用篆书题额勒石。并不收宋绶后人的润笔之费。告老还里，又与宋绶

的女儿、女婿相见，王洙凄然落泪。

3. 王洙对应天书院学术的发扬光大

宋绶于明道二年（1033）还朝，王洙于明道三年（1034）四月，范仲淹召回京任右司谏，再一次举荐了学富五车的王洙。王洙被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他将应天府书院授徒经验带到了国学。在国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主要从事校书修史工作。《宋史》本传云：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擢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为天章阁侍讲，专读《宝训要言》于迩英阁，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杜衍、富弼等实行新政。王洙与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同襄盛举，为时为御史中丞的王拱辰所忌。苏舜钦官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事，值进奏院祀神，苏舜钦按常例，用所拆奏封的废纸换钱置酒饮宴。王拱辰诬奏苏舜钦，而株连王洙被贬外任。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云：庆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执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发，而杜丞相子婿苏舜钦为集贤校理，负时名，所与交遊皆当世贤豪。已而舜钦坐监进奏院祠神会客，为御史所弹，公以坐，客贬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学问经术，多识故事，宜在朝廷。复召为史馆检讨，同判太常寺侍讲，充史馆修撰，知制诰，权判吏部流内铨。范仲淹举荐王洙的札子见《范文正集》卷十九《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文中云：

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臣窃见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词精贍，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臣在中书日，洙曾求知越州，时章得象以下并言，朝廷每有典礼之疑，则问此人，必见本末，岂当许求外任？遂不行所请。寻以撰成《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蒙恩进直龙图阁，依旧天章阁侍讲，仍赐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后以赴进奏院筵会，乃在京诸司常例得从一日之休，徒以横议中伤，例遣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臣近见此人来知襄州，复能精勤政治，废务修举，清简和恕，吏民乐康，

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员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龙图阁亦又四年，未曾迁改。伏望圣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以备询访，则斯人之选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发明议论，润色训谏。欲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补，则乞就迁近职，别领大藩使搢绅之列，知稽古有功为善弗掩，实圣政之端也。

范仲淹的这篇奏札，对王洙的学问、人品、执政能力，都充分褒扬，也是公允之论。至和元年（1054）九月，擢翰林学士。三年（1056），因王尧臣为参知政事，叔侄同参内阁大政，以避嫌改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嘉祐二年（1057）九月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王洙病时，八月开迩英阁，侍臣并进讲读，而王洙独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往问。既而，王洙病卒，天子震悼，赙卹加等，赠给事中，特赐谥曰文节。^[47]

欧阳修说他：为人宽厚乐易，孝于宗族，信于朋友。公以文儒进用，能因其所学，为上开陈其言，缓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说。意有所欲必以问之，无不能对。施于为政，敏而有方。其在朝廷，多所论议，遇人恂恂惟谨，及既歿，而考其言，皆当世要务。言天下民田税不均而奸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税，请用郭谿、孙琳千步开方为均田法，颁之州县。及论河功邊（biān）食，皆可施行。^[48]

4. 王洙的学术贡献

王洙从应天书院走入社会，又在应天书院教书授徒，研修涵养近十年。最终成为北宋著名的学术泰斗。宋王偁《东都事略》载：王洙“性彊敏，学问过人，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历、星官、算法、训故、字书，无所不通。”《宋史》本传说他，“洙汎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由于学力深厚，又勤于耕耘，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

王洙为人宽厚，为政有方。他孝于家族，信于朋友。族中的孤儿不能自立的，皆为之嫁娶。知襄州时，本地戍兵骄横，前任对之既担忧又无能为力。王洙始至，将骄兵皆召来庭前，正色诘问，然后将当事人中的一两个绳之于法，杀一儆百，从此，戍兵皆知收敛惧怕。在徐州时，遭逢天灾，百姓饥

饷，王洙不仅免收赋税，而且打开公私粮仓以赈济灾民。在朝廷，多有议论，且皆当世要务。如论“亲戚近幸冒法干恩泽，以乱刑赏”事；论“天下民田税不均，而奸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税，请用均田法”等，切时弊，补时漏。

《宋史》本传说他，“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着《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说他，“既领太常，吉凶礼典撰定尤多。尝修《集韵》，校定《史记》、前后《汉书》，编《国朝会要》《乡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皇祐（1049～1054）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读学士宋祁进言：明堂礼废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学者，诏公共草。其仪礼成，撰《大享明堂记》。又诏修雅乐。晚喜隶书，尤有古法。着《易传》十篇。其他文章千有余篇”。所以，王洙精通《礼》学。

王洙还洞晓律吕，自己能辨声度曲。他细究古乐到今乐的变化，作《古今乐律通谱》，并受诏修《雅乐》。在音韵方面，他认为：“学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终为不识字人”，所以修《集韵》以示后人。

王洙曾向当时著名的《易》学家赵期学《易》，在他以明经术而侍讲天章阁时，集前世诸儒关于《易经》的论说，依卦变为类，撰成《周易象象外集》，即《宋史本传》所谓《易传》十卷。又元代陆森编《新刊图解玉灵聚义占卜龟经》四卷（明天一阁刻本），也署名王洙所撰。

王洙在史学方面也贡献卓著。他先后校定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与宋绶、李淑等以国朝故事，因革制度，修撰《国朝会要》150卷；与欧阳修等编有《三朝圣政录》10卷；又预修《祖宗故事》二十卷、《三朝经武圣略》十卷、《乡兵制度》等。这些撰著，为后人研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制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撰写宋史、研究宋史也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王洙还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宋宫廷中新建殿榜题名多出他的手笔，庆历间士大夫家的墓志铭，如晏殊碑铭、范仲淹碑铭，皆王洙手录。他作书要求用笔圆劲，结体方正，以奇古为工。他本不善习隶书，晚年因诏令书写献穆公主碑始作隶，谁知隶书一出，竟古意横溢，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喜评古今书法，与大书法家蔡襄常从朝到夕评书不止。当

然，品评前人的过程，也就是长进自己书艺的过程。

作为藏书世家，王氏藏书甚多，关于藏书也就有了一整套妙法。如书纸浸湿后复原的处理，卷页散佚后的重新装订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洙及子孙们不仅藏书。而且时常编次校勘那些散乱失序的藏书。汉代扬雄的《方言》本无次序，王洙类编次后，成为流行的善本。按类编次13卷《高适诗》为10卷。恢复郑氏古《易》旧次。特别是王洙对杜甫诗集的整理，为以后杜甫诗集的规范、完整有奠基之功。

杜甫本传载杜甫有诗60卷行于世，至唐润州刺史樊晃，其《杜工部小集序》言“采其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称：“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王洙将采自朝廷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处的所谓杜甫别集、小集、杂编及自家所藏唐人旧集共99卷，剔除重复，得1405篇，按照诗人居行次序及时间先后分为18卷；又别录杜甫赋、笔、杂著29篇分为两卷，辑为《杜工部集》20卷，并为之作序。其序说：“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世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等次矣”。可见，校定编次杜甫诗集是多么浩繁而艰苦的工程。王洙及其家人在收藏、编次、校勘、整理古代典籍方面，为古代文化的保存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49]。

王洙对待子辈，有慈父的深爱，也有师长的严格。循循善诱，用心良苦。他既教导儿子们写诗文，做学问，又教导他们做人、处事。他勉励儿子要无愧于哪怕是卑微的职位，尽心力于大大小小的事务；要求儿子修身行道，性贵平淡，对人遇事要心意平和。王洙为文尚古，他告诫儿子：“为文以造语为工，当意深而语简，取则于六经、《庄》、《骚》、司马迁、扬雄之流”；又说：“壮年为文，当以气焰为上。悲哀憔悴之词，慎不得法”^[50]。

从以上史料可知，王洙在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皆有着作传世，可谓著作等身，不愧北宋前期的大文献学家。

四、七世鼎盛

（一）天圣五年状元、参知政事王尧臣

1. 王尧臣基本情况

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王洙之子,王砺之孙。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六世祖唐末避乱东迁,遂为北宋应天府虞城(今商丘虞城)人。他幼年受系统的教育,加之其勤奋好学,掌握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军事知识,为其成年后建立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圣五年(1027),王尧臣中进士第一。张方平在《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说:“尧臣,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天圣中今上初临轩,大选天下士几四百人,翰林策名第一,通材雅望,辉光笃实,践历显重,为朝廷羽仪,岩廊之瞻,积有日矣。”^[51]

从此,王尧臣步入仕途,释褐(è,脱去平民衣服)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试,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出知光州。丁父忧,服除,为三司度支判官,迁右司谏、知制诰;再迁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陕西体量安抚使、泾原路安抚使、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成为北宋的一名重臣。王尧臣墓地在今虞城县古王集。

王尧臣为官三十多年,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于政治、军事多所建树。然而,他只活到56岁,就因病于1058年8月卒于位,卒谥文安,神宗时改谥文忠。有《崇文总目》传世。王尧臣为人诚恳,无所矫饰,知人善任。与弟纯臣相友爱,世人以之为孝悌的榜样。

尧臣子:同老、朋老,皆官大理评事;周老,官太常寺太祝,早卒。

2. 王尧臣的突出成绩

王尧臣生活的年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王尧臣坚定地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体恤人民,勇于进谏,持公守正,裁抑权幸,为北宋政权的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王尧臣任光州知州时,该地发生了严重灾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于是,一些富于反抗精神的农民就组织起来,抢劫官府粮仓。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处以死刑。但王尧臣却认为:“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这是饥寒交迫的黎民为了求生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正是应该采取荒政措施(中国历史上救济灾荒以稳定政权的措施。其内容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饥察、除

盗贼等多项)加以抚恤的。于是,他勇敢地上疏宋仁宗,要求开仓赈济,并明确宣布对因饥寒而抢劫官府粮仓者免以死刑。仁宗准奏,并颁布了诏令,这一诏令不仅使光州人民免于流离饥毙,生活得到安定,而且作为定律沿用多年,对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进谏有功,王尧臣被升为京官,任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其间,宦官阎文应勾结奸相吕夷简,利用皇室内部矛盾,鼓动宋仁宗废掉为人正派的郭皇后,将其打入冷宫,又挟太医诊视,致郭皇后暴死。朝官议论纷纷,但多惧怕阎文应权势不敢直言。王尧臣挺身而出,奏请仁宗,要求将此案交御史审理,考核虚实以释天下之疑,终将阎文应以离间和陷害罪关押,为朝廷清除了一大奸佞。

庆历(1041~1048)年间,王尧臣升任三司使(负责统筹盐铁、度支、户部三部的最高财政机构的行政长官),他所面临的是国与民皆凋弊的现状。由于战争不断,边防用度骤增,三司厚赋暴敛之余,甚至动用内藏。受命之初,王尧臣即果断地进行改革:制定三司条目法度,罢免不堪重用的副使、判官十五人,荐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一年过后,民用足;二年过后,偿还了挪用内藏的数百万;三年过后,内藏积聚数千万,国民皆安。以母老请罢,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王尧臣任三司使时,宦官张永和向宋仁宗出了一个坏主意:收缴民房租金的十分之三,以扩充军费。对此,王尧臣坚决反对。他义正词严地向宋仁宗指出:“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cǐ)之乱也。”意思是,这是使世道衰败的做法,这样做必然要危害到百姓的利益,招来怨恨。唐德宗招致朱泚之乱,被迫离京出奔,险些亡国的教训就在这里。王尧臣说得有理,宋仁宗只好把张永和的建议下放给三司审议。为了动摇王尧臣的决心,张永和就暗中派人送厚礼拉拢他,遭到他的申斥。度支副使林澹畏惧张永和的权势,附会张永和的主张,王尧臣就奏请宋仁宗撤了他的职。不久,益(四川成都)、利(四川广元)、夔(四川奉节)三路转运使又奏请仁宗,要求增加民间盐井每年的税额,说什么这样可以使朝廷每年多得十几万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赋税。对此,王尧臣再次坚决谏止。他认为,皇上的恩典未曾给边远地区

的人民带来福利，反而从那里牟取厚利，这只会加深人民的怨恨，从而又一次阻止了滥向人民增加负担的错误主张。

王尧臣不仅在理政上才华横溢，有功有勋，而且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1038年，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其首领李元昊领导下脱离宋朝，建都立国，自称大夏（西夏），并开始攻宋西北边防。宋廷因久不用兵，宋军连吃败仗，尤其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境内）的惨败，使得朝野震惊恐慌。自那以后的三年之中，宋军损兵数万，折将数十名，边地屡遭掳掠，人民困苦不堪，北宋王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041年，忧国恤民的王尧臣被宋仁宗任命为体量安抚使，前往陕西一带巡察边备、安抚将士。临行前，王尧臣又首先想到了处于战乱中的人民。他向仁宗请求说：“以往，使者举着皇上的诏令，不论走到哪里，都存心只安抚官吏将校，而不问黎民百姓。自元昊叛反三年以来，关中百姓颠沛流离，贫困凋敝。请圣上下一诏令，传谕百姓，平了贼免除其两年租赋。”仁宗准奏，立即写了诏令。王尧臣携带诏令，每到一地，都既安抚官吏将校，又安抚黎民百姓，传达仁宗免赋两年的旨意。逃亡在外的黎民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返回故里恢复生产，并协助驻军抗击夏兵。由于耕耘努力，关中人民第一年就基本达到了自足，第二年又以其余偿还了向官府所借的数百万石粮食，第三年就有了数千万石的积存。看到这种情形，王尧臣高兴极了，他说：“我所追求的就是这呀！”充分表达了他追求人民安居乐业的思想情操。经过安抚和实地考察，王尧臣上疏仁宗，指陈边防形势，以及边备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军队屡次失利的原因；其原因有二：一是敌众我寡。“陕西兵二十万，分屯四路，然可使战者止十万。贼众入寇，常数倍官军。彼以十战一，我以一战十，故三至而三胜，由众寡不侔也。”^[52]二是敌善于先据胜地，诱我追击，而我方将帅不善据险击归，又常循道追击，故多遭敌埋伏合击。而主帅又“不思应变以惩前失”^[53]。有鉴于上，王尧臣提出了加强边防，克敌制胜的三点建议：一是扩充军队，加强训练，特别要加强近敌巢穴之重镇。二是诏敕边吏，常远侦察，遇敌入侵，度远近立营寨，然后量敌奋击，不得轻出。三是精选将帅，任贤用能。力荐因好水川兵败而削去招讨副使之职，谪知

秦州的韩琦，和因私自与李元昊通书而夺去招讨副使，谪知耀州的范仲淹，他指出：韩琦、范仲淹“二人者，皆忠义智勇，不当置之散地”。又称赞：“种世衡、狄青有将帅才。”可堪重用。宋仁宗赏识王尧臣的军事谋略，完全依其所奏行事，并颁布诏令，西北边境因韩、范等将领而安，西贼闻听韩、范而丧胆。在第二年的战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于是，宋仁宗又派王尧臣安抚泾原。

通过安抚泾原，王尧臣更深刻地认识到，宋军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军事制度的腐败，在用人上，过分重用亲旧恩幸之人，而轻视良将帅才，从而造成各路军队名号各异，所禀非一，兵势分散，不能协同作战。他提出了“精择将佐”，统一指挥，统一号令，充实兵力，耕战结合，加强边防城寨建设等一系列革新措施。这些措施如能实施，无疑会对克服宋朝军事制度的腐败，提高部队战斗力，稳定边疆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宋仁宗并不真想革新军制，整饬军队，也不想与西夏决战。他在遣使安抚西北边防，起用韩琦、范仲淹的同时，已密令延州知府庞籍与西夏和谈，终于1044年以屈辱的条件实现了对西夏的妥协。

皇祐三年（1051），王尧臣为枢密副使（负责军国要事的副行政长官）。王尧臣持法守正，不避豪贵，因此裁抑了众多的权倖，致使小人构怨，京城之内，陷害、中伤、恫吓他的言论一时四起，匿名信也随之而至，就连仁宗身边的近臣也时不时谗言相加。他们一方面利用其党羽在京城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损害王尧臣的形象，一方面串通起来，轮番在宋仁宗面前议论王尧臣的短处。然而，王尧臣却泰然自若，依然秉公把各种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王尧臣几次上言请求罢去枢密副使，但仁宗深知尧臣为人纯质，对一切流言置之不理，对王尧臣的忠诚丝毫不怀疑，并下令立即查问拘拿流言飞书者。

王尧臣官至枢密副使时地位高了，但思想上、行动上却更加谨慎，一如既往——“持公守正，以身任天下事”。特别是在处理关系皇帝宗室、宦官、医师、乐正、帝王宠幸者的问题上，坚决不搞滥恩幸请那一套。在小是小非问题上，对于滥恩幸请，可减少的则减少，可拒绝的则拒绝；对重大原则问题，则一律著为定令，按原则办理，决不敷衍姑息，私相授受。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因战功而居高

位。其下属经常造作言语，寻衅闹事，人们普遍不满，而狄青却自鸣得意。王尧臣目睹此事，深为忧虑。于是，他当着众人之面把狄青教训了一顿。他列举历史上不少将帅出身贫贱，居高位后不能自省，骄横跋扈而遭杀身之祸的教训使狄青受到震动而有所改进。^[54]

嘉祐元年(1056)，尧臣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与宰相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官位更加显赫。但他遇到不同见解总是反复切磋，从不独断专行；在仁宗面前陈述天下利害，总是据实而论，详尽周到；他所提出的各项措施，也都层次分明，十分得体。因而，他深得仁宗赏识。制词称其“艺文醇深，器识高正”，“智略可以断国论，经术可以纬皇猷”。

嘉祐三年(1058)，迁吏部侍郎，8月卒于任上。

3. 王尧臣的学术著作

以文学仕进的尧臣，从右司谏到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再转右谏议大夫，在朝中典内外制十多年，留下大量书牍奏议，并有文集50卷（一作60卷）行于世，后佚。《宋史》本传云：“尧臣以文学进，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词温丽。”“元丰三年，子同老进遗稿。”

《崇文总目》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著录经籍共3445部，30669卷，是北宋最大的目录书。《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按四部分四十五类。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朝廷以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或重复芜杂，或残缺不全，或谬误伪讹，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与馆阁校勘欧阳修和史馆检讨王洙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又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书目。历经七年至庆历元年（1041）七月成书60卷，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由翰林学士王尧臣上奏，赐名崇文总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评价此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贋，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渊，艺林之玉圃也。”^[55]

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艺文志》中，载有欧阳修的一篇志铭《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仆射文安王公（尧臣）墓志铭》，是写给虞城人王尧臣的，记载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缘。

欧阳修曾与王尧臣共同编修《崇文总目》。王尧臣精于目录学，他们是怎样进入《崇文总目》的编纂班子的呢？据宋代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景祐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正条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秘校欧阳修等，咸被其选”。^[56]由此可见，他们两人是三馆官员中应选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结下了深情厚谊。在王尧臣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赞曰：“公为人纯质，虽贵显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世称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诚意，无所矫饰，善知人，多所称，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57]

有《怀天台隐士》诗一首，见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一。

有《请于陕西缘边四路益屯兵马奏》等文23篇，辑入《全宋文》两卷，载五九五、五九六。

关于王尧臣的思想和政绩只散见于部分史籍中，有待于人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二）北宋藏书家、图书馆官员王钦臣

王钦臣（约1034～约1101），北宋藏书家、图书馆官员。字仲至，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洙第三子。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记载：王洙有“子男五人：长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钦臣，秘书省正字；次陟臣，将作监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适太常博士陈安道。”^[58]

王钦臣早年以文章赞见文坛领袖欧阳修，深得器重。后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神宗熙宁二年（1069）赐进士出身。做官为宦于北宋朝激烈的新旧党争时，素有高风亮节的王钦臣宦途难免坎壈。元祐（1086～094）初，他以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回朝后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哲宗本想擢钦臣为学士，但因新党人物、丞相章惇（dūn）不喜而作罢，代钱勰领开封府。在新党所谓“绍述熙丰”的行动中，王钦臣被排挤出京师，先后出知和州（今和县）、饶州（今江西鄱阳），终斥提举太平观。徽宗即位，始复待制，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59]《宋史·王洙传》对王钦臣有明确记载：

钦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赞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

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对，哲宗言：“此阅书诏，殊不满足人意，谁可为学士者？”勰以钦臣对。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为学士，钦臣领开封。改集贤殿修撰、知和州。徙饶州，斥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卒，年六十七。

王钦臣继承了父亲嗜古和藏书、整理古籍的癖好，对收藏古今图书极其用心。他在父亲藏书的基础上，搜罗书籍数万卷，亲自一一校订，世人称为“善本”。《宋史·王洙传》对王钦臣有明确记载：“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惟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讎正，世称善本。”^[60]徐度谓“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观其家藏书目至43000卷，而类书卷帙浩繁者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数。虽秘府藏书丰富却不能超过他。每购得一珍本书，先以废草纸传写，另求它本参校，直至无误时，方正式缮写。所用纸张，必以鄂州蒲圻（今属湖北）纸为册。一书作二本，一作专以借人传阅及子弟诵习之用，另本以素绢装裱，号称“镇库书”，不得已不能见。其镇库书达5000卷。与宋敏求交游密切，曾订有互借之约，每互借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有疑问，互相质询。其镇库书于宣和（1119～1125）中，由孙王问献出，王问封官为承务郎，而镇库书副本犹存。建炎（1127～1130）初，北宋亡，藏书留于睢阳旧居中，渐亡。精于校勘，所藏书大部分均手自讎（chóu）正，世称善本。史称古今校书之精，莫过于此家。

王钦臣辑录父亲王洙生平言论之书《王氏谈录》99则。书中涉及父亲教子、谈学、解经、论校书、评书法、说藏书、论诗之语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虽为语录，时见形象跃于纸上，是研究王氏家学不可缺少的资料。^[61]《王氏谈录》亦收少量他人睿言慧说。^[62]《文渊阁四库全书》杂家类三《提要》云：“王氏谈录一卷，不着撰人名氏。”《说郛》载之，题曰王洙撰。《书录解题》则以为翰林学士南京王洙之子录其父所言。今观此书凡九十九则，而称先公及公者七十余则，则非洙所着明甚。盖编此书者见卷尾有《编录观览书目》一则，末题云“王洙敬录”，遂以为全书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则乃嘉祐

（1056～1063）以前人所为，洙特录而跋之，其子附载书末耳。世无自著书而自标敬录者也，其“解绘事后素”一条，朱子集注取之。其论校书当两存、解经不可改字就义，皆为有识。其称校书之注二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亦深有理。

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王钦臣传世著作有《广讽咏集》5卷，始见《直斋书录解题》二〇，后佚。《杜诗刊误》1卷。今皆不存。

《王仲至诗》十卷，始见吕颐浩《忠穆集》七《跋王仲至诗》，云其“博学善属文，尤工于诗”。

有《宿华岳观》等诗十三首，句四，分别见《淮海集》九，《侯鯖录》二，吕颐浩《燕魏杂记》，《能改斋漫录》一一、一八，《声画集》《天台续集》中，《宝真斋法书赞》一七，《宋诗纪事》二四等。

（三）转运使王纯臣

王纯臣，应天府南京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洙次子，王尧臣弟。仁宗皇祐三年（1051）为崇文院检讨、日历所检阅文字^[63]。至和元年（1054）以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通判扬州^[64]。哲宗元祐（1086～1094）初通判岷州^[65]。任转运使等职。^[66]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记载：“纯臣，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文雅开敏，邦之彦也。”^[67]

王纯臣有诗《启至大寨闻擒鬼章捷书上奏喜而为诗》曰：

黄城匹马捷音来，且喜洮东破虏回。

纵使淮西功第一，未闻生缚七渠魁。

今刘敞^[68]有诗《贺王纯臣》为：

昔者岩穴客，多随辟书起。荣名耀山泽，高阁下闾里。

此道不复振，此时竟已矣。不图廷中贤，有意及之子。

十年困乡书，三黜竟不仕。一朝遇知音，籍籍到天耳。

穷通谅有数，自古多若此。年华犹未晚，富良方自治。

伐木情所深，弹冠坐增喜。请歌反招隐，以激南州士。

有《青宫懿典》十五卷，^[69]“庆历中进，诏

藏秘阁。”^[70]后佚。

有《贺岷州太守种谊破鬼章》诗一首^[71]。

(四) 右司郎中王陟臣

王陟臣，字希叔，应天府南京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洙四子，钦臣弟。仁宗嘉祐六年（1061）三月，辛丑科王俊民榜进士第三人。神宗元丰元年（1078），官检正中书吏房、刑房公事，权发遣两浙路提点刑狱。神宗元丰四（1081）年，为度支判官。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右司郎中。^[72]

有《送程给事知越州》诗一首^[73]。

出疆直欲请长纆，绝域皆知郑众名。

拥节初闻归禁闼，怀章非是厌承明。

凌虚观阁仙鳌晓，倒影湖山鉴水清。

遥想兰亭多胜集，早传佳句到都城。

(五) 王稷臣、王梦臣及其他

王稷臣，王涣之子，王尧臣的堂伯兄弟。进士及第。

王梦臣，王涣之子，王尧臣的堂伯兄弟。进士及第。

另外，王洙长子王叟臣，早卒。王洙次子王力臣，太常寺太祝。王洙五子王曾臣，某官。

五、八世以后情况

据北宋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记载，王洙有“孙五人：廷老、商老、同老，并秘书省正字；国老、周老，皆幼。诸弟子侄先后登进士科者十二人，盛矣哉！”^[74]目前，有史料记载，可查到的王氏八世有：天圣五年状元、参知政事王尧臣有子：王同老，秘书省正字。王朋老，官职不祥。王周老，官职不祥。转运使王纯臣有子：王廷老，秘书省正字。王商老，秘书省正字。王国老，官职不祥。王氏九世、王钦臣的孙子王问，承务郎。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后裔世代繁衍生息已有一千多年。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战乱。灾荒，特别是元末明初，族人迁徙或者流落他乡，今古王集及周边大王庄、许楼、刘小庙、刘集史楼、稍岗杨八楼、小侯王祖师庙、梁

园区郭庄曹庄、李口镇王庄以及江苏铜山黄山镇等，皆为该支王氏一族。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一门考中十二个进士，多人在朝为官，当时被传为佳话。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二《文安王公（王尧臣）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王洙）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洙、王洙。
- [4] 张方平《乐全集》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宋庠《元宪集》卷二《屯田郎中王涣父砺可赠尚书左丞制敕》，《江西通志》四六《秩官一》，《浙江通志》一〇四《职官·宋》。
- [5]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
- [6] 《宋史·卷四五七·戚同文传》。
- [7]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8]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七授徒管理志。
- [9] 宋刘敞《公是集》卷五三《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公墓志》。
- [10] 《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王洙）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应天府书院》。
- [12]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九人物志——先师志·戚同文。
- [13] 《河南通志·选举志》。
- [14] 王钦臣《王氏谈录·赠日本僧诗》、《全宋诗》五四第1册第598页。
- [15]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九人物志——先师志·戚同文。
- [16]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洙、王洙。
- [17] 张方平《乐全集》三〇《请应天府致仕官王涣、朱贯给俸札子》。
- [18] 见《事文类聚》四五、《关都文料续编》二九、《輿地纪胜》一七、《全宋诗》七三第2册第843页。
- [19]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20]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六《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21] 夏竦《文庄集》卷二四《广文颂并序》。
- [22] 夏竦《文庄集》卷二四《广文颂并序》。
- [2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
- [24]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志铭并序》。
- [25] 《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九《升宋州为应天府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9页。
- [26]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洙）墓

- 志铭并序》。
- [27]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28]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29]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30]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31]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32] 宋朱熹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十。
- [33] 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十一《品行》。
- [34]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浚、王洙。
- [35]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36]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37] 宋王象之《与地纪胜》卷二人《江南西路·隆兴府》，辑入《全宋诗》卷一六二第3册1625页。
- [38] 宋刘敞《公是集》五三《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冲）公墓志铭》。
- [39] 宋刘敞《公是集》五三《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冲）公墓志铭》。
- [40] 宋刘敞《公是集》五三《尚书屯田郎中提举兖州仙源县景灵宫王（冲）公墓志铭》。
- [41] 清厉鹗《宋诗纪事》一七引《云门志略》、清王昶《金石萃编》一三三，辑入《全宋诗》一七〇第3册第1920页。
- [42] 《宋史·王洙传》二九四卷。
- [43]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4] 王钦臣《王氏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5] 张方平《乐全集》卷四〇《嵇公墓志铭》。
- [4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
- [47]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8] 欧阳修《文忠集》卷三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浚、王洙。
- [49] 王树林主编：《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之（虞城王洙、王尧臣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81-484页。
- [50] 王钦臣《王氏谈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1]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52] 《宋史·王尧臣传》。
- [53] 《宋史·王尧臣传》。
- [54] 李广瑞主编：《宋州古今学人》，新华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作者，郭世民。
- [55] 王树林主编：《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之（虞城王洙、王尧臣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87页。
- [56] 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引宋·罗畸《蓬山志》。
- [57]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二《文安王公（王尧臣）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8]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一《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9] 《宋史·王洙传》二九四卷。
- [60] 《宋史·王洙传》二九四卷。
- [61] 王树林主编：《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之（虞城王洙、王尧臣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484-485页。
- [6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
- [6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
- [6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
- [6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
- [66] 《宋诗纪事小传补正》二。
- [67]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 [68] 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樟树）。庆历六年（1046）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算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著有《公是集》。
- [69] 《宋史》二〇七《艺文六》著录。
- [70] 南宋王应麟《玉海》一二九。
- [71] 《宋诗纪事》三二。
- [72] 《续资治通鉴长编》二八八、二九二、三一二、四〇二。
- [73] 《续会稽掇英集》四。
- [74] 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浚）墓志铭并序》。

（作者简介：张学勇，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文学沙龙 ●

苍劲悲凉话乡思

——读范文正公《苏幕遮·怀旧》断想

□ 宋立民 范剑克

1.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吹落了思乡的尘，吹不去额头的纹，走完了天下的路，才想起回家的门——天涯明月引得乡思绵绵，于是登楼涕下，执手销魂。其实，音问即销魂，古来皆然。但是，在各路学者云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共同探讨“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渊源之际，在睢阳古城同贺“应天书院赐匾 1010 周年”之际，在五洲四海范氏宗亲重阳佳节怀乡思亲之际，咀嚼范文正公的名篇《苏幕遮·怀旧》，别有一种情怀，别有一层悲壮，别有一番风味，别有一层意义。

2. “夔，一足也”。范文正公词，数量甚少，流传下来的，不过苏幕遮、渔家傲、定风波、剔银灯等寥寥数首，每每为后人所遗憾。但文正公每有所作，皆为脍炙人口之绝唱，此种现象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也实属罕见。当然，真正让范公在中国词学史乃至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还是其至今传诵不衰的边塞词《苏幕遮·怀旧》与《渔家傲·秋思》。其铁板铜琶、气贯长河、横扫千钧、一气呵成的“边塞乡思”，一改昔日的凄凄惨惨戚戚而凸显雄浑悲壮，“其沉郁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文贵精不贵多，诗词亦然。《苏幕遮·怀旧》当初入选《宋词三百首》，至今仍然被选入中学教材，成为高考必读篇目，已然独步千古，如同陈子昂一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写尽平地补天的宇宙意识，后人难以超越。正所谓一声苏幕遮，大漠孤烟起，壮阔乡思壮绝今古也。

3. “苏幕遮”又名“古调歌”“云雾敛”“鬢云松”“鬢云松令”等，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苏幕遮”是当时高昌国——汉族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语之音译，意思是游牧民族“泼寒胡戏”舞蹈之际为了不使冷水浇到头上而戴的一种涂了油的帽子。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考证，苏幕遮原为波斯语的译音，原义为披在肩上的头巾。《苏幕遮》的曲名正是因歌舞者的这种服饰而得名。唐玄宗时，由于这种“泼寒胡戏”被朝臣视为胡虏之俗而有伤风化，玄宗于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七日，曾颁诏书《禁断腊月乞寒敕》，使此俗一度“禁断”，但在民间仍得以保存与流布，只是由以前的十一月变为七月初，“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且由胡戏变成了驱鬼消灾的民俗。

“苏幕遮”的调式原为西域传入唐教坊的曲子，宋代词家用此调多是另度新曲。^[1]

4. 范仲淹原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笔者将其翻译为——

雪白的云朵一抓一箩
飞舞的黄叶随风吟哦
无尽秋意弹拨着涟漪
冷雾轻抚远逝的碧波

斜阳优美地滑下山坡
气爽秋高正水天一色
芳草萋萋万物为刍狗
有情无情待后人评说

一缕乡魂直飞向河洛
游子羁旅愁绪太折磨
纵有忘川引诱我沉睡
边关梦难觅夜夜笙歌
月明楼高望眼已婆娑
寒秋独立满目是忧乐
九曲愁肠靠浊酒冲洗

思亲的苦泪化为黄河

5. 钱钟书先生曾言：“夫一家诗集，词意重出屡见，藉此知人，固其念兹在兹，言之谆谆。”^[2]该词重复的字眼为“天”、“波”、“斜阳”、“夜”，而这几个词语，亦足以成为理解全词的切入点。

坊间皆知范文正公《苏幕遮·怀旧》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所本，实际上，王实甫仅仅用“碧云天，黄叶地”作为写景的导引，下面变为“西风紧，北雁南飞”。但是，王实甫的引用却是恰到好处。因为一般人——尤其是后人——是不容易理解崔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未登程先问归期”即“生别离”之凄绝的。到了后来，各种笔记小说乃至“语文辅导材料”遍地开花地引用“碧云天，黄叶地”，已经纯粹是“为写景而写景”，或者“为了高考作文而点评”，或者“我注六经以己意为之”，甚至“断章取义”歪批斜解也。

6. “少女心爱的镜子，把少女弄丢了。”满世界的“碧云天黄叶地”，极有可能把真实的范仲淹隐没了。

其实，该词正可以与“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渔家傲·秋思》对读，是立足边关、把矛持盾、仰望冷月的“思乡”，其间不绝如缕的乡思，每每被“燕然未勒归无计”——今人曰“舍小家为大家”的现实所悲壮地笼罩，其间的悲壮、大气，横绝今古，绝非卿卿我我之辈能够理解也。

孟子云：“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范文正公悲壮的“大”，是建立在镇守边关、杀敌立业的壮阔背景之上的。所以，这首《苏幕遮·怀旧》必须站立在“边塞诗”的基点上解读，方才能够读得懂，化得开。那些思乡的“抒情主人公”不是“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的美女，而是铠甲俨然、让劲敌胆寒的将士。惟其如此，才能够明白范仲淹境界的苍劲悲凉而不至于将此大作并入“怨妇思归”的俗套。

7. 彼时，边境曾经传唱一歌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夫宋仁宗一朝，天下以“韩”、“范”并称。“韩”是做过北宋宰相的韩琦。韩琦与范仲淹两人虽然起初在对外政策上有所分歧，但日久见人心，二位后来共商军务，协调谋划，相得益彰，终成忘年之交，情谊深厚。范仲淹诗云：“吾爱古名将，毅若武库森。其重如山安，其静如渊沉。有令凛如霜，有谋密如阴。敌城一朝拔，戎首万里擒。虎豹卷韬略，鲸鲵投釜鬯。皇威彻西海，天马来駸駸。留侯武侯者，

将相俱能任。决胜神所启，受托天所谋。拨开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关支一柱，万字覆重衾。”应该说，范仲淹对于韩琦是看得深透而佩服有加的。此种肝胆相照的男子汉情怀，岂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同仁同事同日而语。

8. 当然，艺术欣赏里不可以缺少“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主观审美”——后来叫“接受美学”的欣赏派，只要自圆其说，就是一家之言。

鲁迅曰：“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了淫，革命家看见了排满，流言家看见了宫闱秘事”^[3]——能够从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里看出“儿女情长”乃至千里闺怨，也是不无可能的——欣赏者根据自己的阅历与情感而赋予这首佳作以新的意义，也属于审美的常理。仅仅这一点，又恰恰说明了《苏幕遮·怀旧》审美品格的“莎士比亚化”——用“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来做“一锤定音”的概括是困难的。周振甫先生的《诗词例话》里有关“多边”与“二柄”的描述已经肯定：倾向性隐蔽得艺术化，“化”到了千人千面、足足可以“各取所需”的地步，亦为欣赏之常态。

9. 细细考查古人诗词，我们认为，乡思同样有阳刚与阴柔之分。柳三变“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蘼皋”，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阴柔之美也，属于“悲悯”的审美范畴。而张衡“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杜子美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苏东坡的“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等等，与范文正公的“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则属于阳刚的乡思之美，乃是撰写“大景观”中的情怀。

10. 再进一步，所谓“阴柔之美”，特质在于其委婉情结的柔软度，而阳刚之美的特色，则在于内在的力度。阴柔的审美，其辐射的指向性是向内的，以个人的心理背景为底色。而阳刚的乡思，指向性则是与向外的，与江河湖海、辽阔苍天水乳交融。

试看鲁迅写完《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之后的跋语：“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笛，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4]男儿有泪不轻弹，即

便是痛断肝肠，也还是咬牙切齿、仰天长啸，此乃悲壮的力度——在西方美学里，“悲壮”常常与“崇高”是近义词——中西美学的文化精神是能够兼容的。

11. 境界无大小，审美无高下，阳刚阴柔都能够写出千古名句。不同的是，阳刚之乡思把儿女情长的乡土，化入“水随天去秋无际”的“天人合一”大背景，化为远大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齐天浩叹，愈发证明“家”与“乡”的概念，与“国”之命运是息息相关而唇齿相依的。“三声戍角边城暮，万里乡心塞草春”。把青春与生命交给了边关、大漠、沙场的诗人，连呼吸都折叠着边塞风与金石气，乡思不过是“芝麻浸油使其更油”也。

12. 张惠言评价《苏幕遮·怀旧》云：“此去国之情。”（《词选》）许昂霄亦云：“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词综偈评》）针对黄蓼园《蓼园词选》所“艺增”的“芳草喻小人”的说法，编《宋词选》的胡云翼先生反驳云：“从具体的词看，除了反映出‘去国之情’，很难找出其中有什么‘忧天下’的含意，黄蓼园所赋予这首词的思想意义完全是外加的。”

而征人思家之所以与常人不同者，使命更重、责任更重、凶险更多、环境更恶劣、还家更不易也。又正因为以上种种，思绪更浓也。所以，范文正公笔下的碧云、黄叶、寒波、翠烟、芳草、斜阳、水天……已经不仅仅是自然景色，而是粘连在“愁肠”之上的病苦，是被作者担忧、珍惜、魂牵梦绕的对象。其画外音或许是：这一切的一切，现在我还能够亲眼见到，还能够怀揣着乡思“欣赏”，还能够作压抑情绪作“平铺直叙”科，明天早上我还能这样吗？须知元昊大军近在咫尺，大举攻宋已经不止一次。

13. 与“燕然未勒”相比，“归无计”是算不得什么的，何况早已经“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值得歌哭的、应该歌哭的、能够歌哭的，已经歌哭了千千万万遍了。“道一声去也送别河头”，任他“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也。

有论者总结说，《苏幕遮·怀旧》是“以秋景写秋心”的典范。窃以为这个“秋心”不是厌战、反战的“薄暮秋冥”、神思恍惚——固然“黯乡魂，追旅思”不无记叙战争残酷的客观描述——而是以爱惜自己的边关战士，爱惜祖国的大好山川为底色的思念。比较一下林妹妹的《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心胸的宽窄，视野的远近，焦

点的大小，立马可见。

当然，我们不会也不必要去要求林妹妹像范仲淹一样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她的目光也很难越出自己的潇湘馆与宝哥哥的怡红院，这是历史与环境要负责的局限。但是，在宋学开山、士林领袖、“饮食梦寐，四海九州”的范仲淹的笔下，“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秋景，正是壮阔所在，苍劲所在。“酒入愁肠”，愁的是功名未竟而家国均不安宁。都说是“明月楼高休独倚”，其实，有边关在，有麾下的将士在，有锣鼓、金戈、战旗、铁马在，他范文正公是可以偶尔“独倚”的，但是，“独”也罢，“群”也罢，那“壮志未酬”的“秋心”，何曾孤独过、寂寞过？甚至，何曾有过孤独与寂寞的机会？

简言之，彼时彼地，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是吾侪未曾身临沙场的书生所无法体验的。

14. 之所以用老子的“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翻译“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一句，是因为这句词貌似绘景，实乃大有历史渊源。

夫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以至于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管闲事、落个自逍遥。无奈范文正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实实在在在一个“不忘初心”。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间，范仲淹赶赴西北边塞的军中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的军事——这是中国历史选择了这位诗心盎然的将军。

彼时彼刻的范仲淹，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初知延州，便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为基地，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改知庆州后，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葫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归附大宋。然而，战事仍然不断，边关始终不得安宁。这一切的一切，无情的芳草是不明白的——它们一味地傻长、疯长，蔓延到一望无际的天涯。莫非这一望无际的芳草是“战事连绵有家难回”的隐喻？莫非夕阳照不到的地方就没有一块安宁的绿洲？

呜呼！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也。

黄蓼园评论曰：“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文正当宋仁宗之时，扬厉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乃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5]

15. “黄叶满山篱落晚，北风吹雨湿荒寒”。萋萋芳草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什么都说了。

李叔同著名歌词曰“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在李氏那里，群山是安稳的，静默的，笛声是悠远的，平缓的。那是夕阳晚照图，是衬托着淡淡惆怅的美景。而范仲淹的“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不同，那是苍凉的空旷、未知的空旷，是无可言说的寂寞，甚至无路可走的荒芜。没有“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军旅生涯如吾侪者，哪里会知道“更在斜阳外”五个字后面有多少无奈，多少怅惘，多少希冀，多少悲怆。

16.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此处仍然是虚拟语气。

“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日渐黯淡的乡思，追赶着羁旅的愁绪，不招自来，挥之不去，无始无终。若果有停歇的片刻，那就是做了美梦的夜里吧。

虚拟语气的核心在于“除非”，反复念叨的，总是已经失去的或者极难得到的。我们甚至怀疑：范文正公究竟有没有过安安稳稳做一次美梦的时候。

但是，我们分明看到了期待：看到了鸣金收兵的时候，看到了勒石为证的时候，看到即便自己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儿孙辈“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时候——在戎马倥偬之短短的间隙，能够做一次功名成就的美梦，已经是戍边将士的大愿了。

呜呼！这又是怎样的失眠者与托梦者！

17.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乍看上去，此句与李后主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与温飞卿的“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等近似，其实，如前所述，其实质性内容即“精气神”是绝然不同的。

鲁迅曰：“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在这个“明月楼高休独倚”的背后，是烟尘翻卷的军旅生活。在这个“明月楼高休独倚”的近旁，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边塞大漠。这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犯愁，是家国不能两全而“醉里挑灯看剑”的犯愁，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相思，是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的相思。其雄浑高远的意境，悲凉苍劲的格调，与卿卿我我、柔肠寸断的相思岂能同属于一个世界？

18.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论点来自明人谢榛《四溟诗话》的“情景孤不自成”

理论：“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认为情景始终的合一的：“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

范仲淹的天才之处恰恰在于：明明是一日思亲十二时，风刀霜剑人未知，却是含而不露地着力于秋色的描写，把一腔乡思深藏于秋景之中，以至于让人误以为意涉“艳情”而忘却了黄沙远上的大漠风尘。

19. 山水是心头之文章。盖情语完全隐匿只是一味写景，或许缺少了气势，掩盖了寄托；而情语过多而过密，调式一直高平，则易于直奔主题地“席勒化”，同样会将诗美抹煞。真正的好诗词，应该是像《苏幕遮·怀旧》一样，笔笔有景而笔笔是情，因境生情而情在景中，越是品味越觉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也。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时间与地点，“一切情语皆景语也”亦未必成立。“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是需要“直奔主题”的，是不必想也想不出风景画的。当然，把诗词写成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讲义，不是诗词的不幸，一定是理论的不幸。

20. 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而《琴操》曰：“《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椽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终，投河而死。”

此掌故让人记起屈原夫子，高洁、正直、用死亡把生命的意义诠释到极致。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写出来《苏幕遮·怀旧》的范文正公，正是霜一般锋利而洁净的人。

参考文献：

- 【1】舒梦兰编撰，王新霞、杨海健注《白香词谱·学词入门第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9页。
- 【2】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7页。
- 【3】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八卷，第179页。
- 【4】鲁迅《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八卷，第536页。
- 【5】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宋立民，广东文理职业学院教授，原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从重庆到



□ 常丽洁



进去了。点了号称特色的招牌鱼、风味兔头和光头司令，又点了北方不大能吃到的西芹炒藕带。鱼要不辣的，尔羊吃一口便吐出来，呼辣不迭。兔头和藕带自然也都辣，直吃得大汗淋漓。光头司令者，脑袋大小的麻团是也，难为

他们炸得那么松泡。西芹炒藕带这个菜，说好听点叫浑然天成，说不好听就是鱼目混珠，我猜纯粹是藕带太贵，饭店不舍得炒一整盘，就拿口感形状都比较近的西芹来凑数。但长江沿岸的友人纠正我说，市场上藕带便宜得都不愿买，可见我到底是见识短浅的北方食客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北方的藕带也差不多是这意思。

重庆地势高低起伏，不独共享单车没有市场，导航也不好。导航显示两公里的，找当地人一问，也许就在脚底下，往下走一段台阶就到了。同样，导航显示就在附近的，也许要上上下下兜很大圈子才能找到。去过的城市中，坡度如此大的，似乎只有旧金山，还比这里显得更整饬些。坐了一次地铁更是服气，从地面连乘四长截扶梯才到下面站台，目测距离地面逾五十米，约等于二十层楼高低。一脑袋扎下去，真有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感。

江边的洪崖洞算是一处名胜，大约好处在依山而建，又有古意，可见重庆旧日风情吧，可对顶着大太阳上上下下的人来说，却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又据说夜间灯火通明时参观最好，次夜在船上见到了，也觉平平。只确实理解了这座城市在战时的好处，它不是平面铺展而是立体交叠的，山体坚固，防空工事易于修建，又兼水多雾重，更有扑朔迷离之感。时至今日，重庆市招仍不时可见“陪都”字样，端底理直气壮。

4月27日飞重庆，近午到江北机场，通道一侧大幅广告片上有王昌龄《泸溪主人》诗：“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

时节还未入夏，重庆已给人郁热感，坐在出租车上，虽然开着窗，也觉周身黏嗒嗒的不爽利。行到半路，终于忍不住向司机开口了：“打开空调吧。”

住处选在解放碑附近，31楼，隔窗下瞰，正对着嘉陵江。时值蓄水期，江中水位下降，不少地方裸露出河床，看去并无浩荡之感，有些失落。

街上多是挑了竹筐沿街兜售水果的小贩，妇人居多，挑的多是荸荠、乌梅、樱桃、枇杷、丑橘之类时令果子，扁担前后各一筐，索价颇昂，多是15一斤。尔羊和我都是荸荠爱好者，尤其是去了皮的雪白的荸荠肉，一口气吃二斤一点问题没有。于是接下来两三天里，我们吃了一百多块钱的荸荠。

左近有饭店名杨记隆府，见门外很多人排队，便很自觉地去排，又因同意跟人拼桌，不多会儿即

晚约学生童君共饭，其人有心，选周师兄大刀腰片火锅，盛名在外，自然又是大排长队，这次却没那么幸运了，足足等了俩小时，闲话说尽，荸荠吃完，又点了一只酸奶牛的外卖饮品喝下，还是没等到座位。可怜尔羊饿坏了，我当机立断去吃小吃，糍粑虾饺肉串汤圆凉粉，吃得也很开怀。

二

与别处相比，重庆人显得更生机勃勃，更勤于谋生之事，满街都是匆匆赶路的人，似乎容不下闲庭信步，道路又窄，稍有停顿，便要遭遇摩肩接踵的超越与高声大气的抱怨：“快点儿走嘛！”以今推古，抗战时期，勤劳耐苦、赋性褊急的土著，与以闲雅雍容自诩的下江人的冲突，就很可以理解了。

同样因此之故，重庆市面一派繁华，即便僻远破落处，也少见懒散怠惰者。到处生意十足，可算一个较直观的感触，虽然所见有限，未必一定可靠。

沿江大码头盛产挑夫，武汉的挑夫人手一根扁竹片，连人带竹统称“扁担”，街头呼一声：“扁担！”立时便聚拢来好几人。与之仿佛，重庆的“棒棒”也是早有耳闻，与武汉的扁竹片不同者，乃是人手一根圆竹棒，守在码头、市场与街头热闹处，多四五十岁的壮汉，黝黑粗壮，怀中竹棒负持摩挲经年，呈现玉器包浆般的油亮，棒杪还有粗犷字体刻下的“朝天门胡春生”一类字样，以为区别。

沿街有小菜店，成筐的豆角、尖椒、蒜苗、小葱、油菜之类，都显见是新采摘的，挺拔翠嫩，脱离植株与土壤绝不会超过三小时，这是很鼓舞士气的场景，每天吃这样新鲜蔬菜的生活，应该不会有因循与颓丧吧？这样想时，那些买卖蔫嗒嗒果蔬的人全都不可原谅。

肉铺里挂着各种部位与形状的肉，奇特的是还有新熏制的、乌黑的两条猪蹄，顺着猪蹄看下去，墙体上嵌着一块石碑，这里原来是陪都时期中央银行旧址。

满街黄桷树，似乎不大理会季节，同一株树，这枝已粗枝大叶，那枝才新芽初萌。新芽很有趣，一层嫩叶一层膜，竹笋一样层层围裹。随着新叶舒展，叶膜脱落，满地如落花。我和尔羊随手捡拾，

剥得不亦乐乎。

湖广会馆是沿江一处大建筑群，当年湖广填四川，移民追怀旧乡，立此为念。中心建筑为禹王宫，奉祀大禹。楹联曰“行九德开九州遍地洪流归九派，建重楼兴重庆朝天巨舰驶重洋”、“永系乡情江汉湖湘同禹甸，重修会馆楼台歌舞灿九州”。真是很佩服能拟这种气魄极大之联语的人，不仅需要读书治学，更得经人事有历练，涉山水养胸怀，真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才行。殿内联则为“从导则安从堙则患治水治邦皆一体，视民为重视己为轻修身修政鉴千秋”，看毕一叹，道理大家或许都明白，行事却不免想当然，从堙取蔽，欺世无英雄。

中午就近吃江湖菜，点鳝段、蒜苗腊肉、韭菜小河鲜、泡椒胡豆、口水鸡，一水儿的川菜。主菜算是鳝段，端上来一看，鳝段十有一二，各种规格的辣椒十有八九，披沙拣金吃完鳝段，整盘菜外观没什么太大变化，跟吃日料恰是两极对立。胡豆即蚕豆，平时吃惯了水煮的或葱油炒的，都是清鲜淡口，这次浓油重辣，口味一新。一时感念，少时十年茹素，换来如今的世界胃，其实很值得。

午后走山城步道，潮热曝晒，大汗淋漓。步道一侧，有旧日城墙遗址，有战时军官私宅，有教会医院废基，其余高树浓荫、竹林藤蔓而已。另一侧则是长江，水势亦平缓，无滔滔奔逐之状。

黄昏时分赶到朝天门码头，正对着长江嘉陵江交汇处，扼要据险，恢弘开阔，不愧“朝天”之名。站立远视，心情激荡，久不忍去。

带尔羊下到江边，挖两手江泥，便登船了。此次拟沿江顺流而下，所乘长江黄金二号邮轮，规模颇大，号称万吨，装饰亦奢华，不免有泰坦尼克之忧。

客舱五层，选了四层近船头一间，开船尚早，坐阳台翻读江绍原《民俗与迷信》，不少章节似可从身边这片土地上找到一些印证。

入夜两岸高楼华灯初上，月亮也高悬天际，月色灯火同映于江面，真真是春江花月夜了。

三

4月29日晚发重庆朝天门码头，5月1日抵宜昌，沿江顺流而下，在船上过了三日夜。

29日晨泊丰都，丰都有名山，以鬼城名世。

下船时导游煞有介事：“大家一定要跟好我，因为这里都是人文景观，你自己看是看不懂的。”一笑。

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了中国传统中关于阴曹地府的所有名目，试图打造出真实可触的地狱场景，举凡鬼门关、奈何桥、黄泉路之类应有尽有。大约又担心这样太不讨喜，便很整脚地添设了弥勒佛、观音堂、药王殿等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神仙品类，或许出发点是鬼神一家，却也大大降低了地府的可怖性，而在事实上鼓励了人间恶行。

最恶趣味的莫过于沿途树林草丛中不时可见的血肉模糊的仿真手脚，左一只手、右一只脚，我看得直皱眉头，重口味尔羊却大喜过望，一路寻寻觅觅，仿佛猴子见了桃。

最引人莞尔者则是栏杆础柱上的无常头塑，戴高帽伸长舌，笑容可掬，帽子上大书四字“你也来啦”，亲切戏谑，如对故人。其实，想想也是，即人寿百年，也将及半，知交故旧，前赴后继，慢慢地就变成现世熟人少、鬼域熟人多了，“访旧半为鬼”也不过是杜甫47岁时的感慨，信夫？

是日为旧历三月十四，夜泊忠县，甲板散步时，月亮升起来，正在东侧山巅，恰合东坡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之说，苏轼所见为十六日之月，也与此日仿佛，又同是泛舟于江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滔滔江水，皎皎圆月，当此千古不变的场景，当真动容，当真有诗意。以前看许鞍华执导的《男人四十》，张学友饰演的语文老师用带有南粤口音的普通话读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时，我是被触动了的。

夜深不忍就睡，披衣立阳台，船行柔缓，四围极静，听得到轻微而有节奏的江水与船舷接触时发出的哗哗声，月光如水，正正好照进房间，岸上黑黢黢的山峡耸立，随着船行不断地向后退去，觉得这时指间燃支烟会很好。

夜半醒来，深山有鹧鸪声。

四

侵晨被鸟鸣声惊醒，推测当为鹧鸪一类。

船泊奉节，游白帝城。奉节盛产脐橙，又有不少诗人在此留下诗章，故山上高悬大幅标语：“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远方”，很会撩拨。白帝城当年孤城独峙，高耸山巅，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和杜甫“白帝城高急暮砧”的诗句都可验证，如今水位上升百米，白帝城进城台阶被淹大半，高耸入云之状只能带上想象悬揣。但水面当比古时开阔许多，站立城边远眺，有澄江静如练的画面。看夔门，这里仍是绝佳据点，拿出十元人民币，让尔羊对着背面图案看眼前实景，刀劈斧凿般垂直落下的山体委实少见。过了夔门，就是瞿塘峡，三峡之旅才算真正开始了。

白帝庙中供奉的不是白帝，而是蜀汉人物，刘关张诸葛亮和阿斗都在列，塑像并不高明。沿外墙有诗碑，分刻各代各路诗人于此地的吟咏，竹枝词居多，也算巴蜀特产。其中有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之一：“新城果园连灩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颇近眼前场景：杏子不大见，枇杷正是黄多青少的成熟季节，满山枇杷树，树树绿叶黄实，灿然可观。下山路上，边随手捡拾树下落果，边教尔羊读戴复古诗“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果实糖分多，所以树下的路面走起来很黏腻，嗤啦嗤啦的鞋底与地面接触又撕扯开的声音让人微微不自在。

午后船继续行驶，人们都聚集在甲板上，看瞿塘峡沿途风光。峭壁上有石刻字句，山崖间是旧年开凿的栈道，接近山巅处的天然洞窟中，据说刘备曾藏黄金万两，这大概是数千年来此地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了，而事实上对整个山川而言，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么比较，会觉得所谓三峡大坝工程的设计者真是想落天外，让整个长江中上游水位上升百米，此举近乎开天辟地。这一工程的修建，端底阻止了多少水患，又如何破坏生态，地震频发到底是不是江水浸泡山体所致，其间利弊得失自然不是我能搞清楚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大动作，虽然胆气可嘉，到底还是让人不安。舟行瞿塘峡及后来的小三峡间时，都感到人力的微渺：山峦起伏连绵，

陡峭高峻，山与山之间又是这样大的一条江，普通人生在这里，很难有出格的想法吧，大概只有在自然缝隙间求点温饱的小小努力，卑微而苍白。

小三峡是换乘当地小型游船进去游览的，一路好山好水，水是长江支流大宁河，峡名龙门、巴雾和滴翠，颇合实际，龙门峡是疏阔开口，巴雾峡有云烟缭绕，滴翠峡山水都翠色欲滴，地属巫山县。处处风景佳胜，反倒没有太多拍照的欲望了，只是贪看不尽。在我不多不少的看天下风景的经历中，称得上惊艳的时候有限，此行绝对算一个。随导游指点看路边山峰，这个像美女倒卧，那个像猪八戒拜观音之类，我一概看不出来，什么什么嘛都是。悬棺有点意思，不太能想象远古时代的人怎么把棺材塞进那接近山顶的洞穴中的，这是表达死后对天堂的渴盼么，所以要把尸身放到距离天最近的地方？

船近小三峡腹地，两岸山坳处开始有“猴粮投放”的标牌，定睛细看，果然有猴，似乎称猿更合适，在山崖间奔逐嬉戏，乍看成群结队，细寻却又只看得清三五只。问当地船夫怎么听不见它们的叫声，船夫答曰人和船太多，要等晚上游人散去、山水安静下来后，它们才会从容呼喝，声音清越可闻。若是按照我想法，是夜必定弃游船登岸，待夜深人静时买小舟拎枇杷来听猿啼。人生在世不称意，继续坐船往前走。

小游船上当地导游，最初只在二楼音箱里听到她声音，“熠熠生辉”说成“折折生辉”，便觉兴趣索然。下楼见到其人，不免多看了两眼，我向来以貌取人，眼前这位导游女士就外形来讲，绝对是此行最佳，容貌清秀，身形修颀，衣饰大方得体，看上去应该压得住不少场合，不是简单的导游身份可以局限的。于是选了离她最近的位置，想听听她到底要说些什么。

在介绍完沿途风景后，她拿起一包茶叶，这样开口了：“接下来我要向大家推荐我们巫山的土特产了，这件事让我又惭愧又纠结。”——这俩词说得让人顿生好感。恍惚间她已经开始回顾往昔：“二十年前，三峡对游客开放时，游轮上只有外宾，基本都是欧美国家的，那时每张船票都要一千美金。

我作为导游，每天只需要向外宾们做好讲解，因为客人们自身的消费习惯，我的收入也非常可观，那时我们巫山县旅游局的大楼是全县最好的房子，我的工作也被公认是全巫山县最好的、收入最高的工作……现在，我因为也要养家糊口……”——完美的《琵琶行》的故事。因她的确言辞恳切、遣词造句不落流俗、带有情感也很真挚，所以明知自己也是被她鄙视的不给小费也不大礼貌周到地听她讲解的国内游客，我还是任由自己陷入了“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的千古惆怅中，她为推销当地茶叶和尖嘴鲠，讲了自己和身边朋友家人的漫长而动人的故事，听完二话不说，每样买几包回来。心甘情愿购买推销的物品，在我还是第一次。这位女士的风度与身世，也委实大大增加了我对这里的好感。

旧历三月十五，夜阴无月，搬圈椅坐顶楼甲板正前，看船经巫峡，江风猎猎，神女诸峰依约可辨。

2018年5月1日至6日，断续写就

2022年2月21日修订

（作者简介：常丽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那时的爱情』

□ 李瑞华

正月十四，姥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陪伴她73年的姥爷。92岁的姥姥，直到咽气的那一刻，都没松开姥爷的手。

关于姥姥，想说的很多，可最想说的，却是她和姥爷的故事。

姥姥和姥爷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媒妁之言，家庭包办，一对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直到结



婚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模样。也许，在现代人的眼里，这样的婚姻足以让人扼腕叹息，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却看不到封建习俗带来的痛苦和羁绊，反而让人感觉到是上天格外恩赐，竟然让这对原本陌生的人从此恩爱终生。

姥姥和姥爷一生共养育六个儿女，三男三女均学有所成，吃上了“皇粮”。这一切，恐怕都要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姥爷言语不多却极有主见不怒自威，虽多才多艺却对“文盲”姥姥始终尊重有加；姥姥娇小瘦弱，却柔韧坚强，虽一字不识却通情达理，他们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未红过脸拌过嘴。

以往每逢寒暑假，爸妈都会去接他们来我家小住一段，印象中，他们每次启程之前，姥姥都会在电话里预先告知妈妈姥爷最想吃点什么最想做什么，却从未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姥爷曾是乡政府基层干部，博学多才且独具匠心，业余最大的爱好是做木工活，无论到哪个儿女家小住，姥爷都要随身携带他那套盛满木工工具的百宝箱。不管多复杂的家具，他只要看上几眼，就能照样子做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擅长旧物改造，样式陈旧的木箱子方桌子等老物件，经他的妙手翻新皆可化腐朽为神奇。每天吃过早饭，姥姥就会照例帮姥爷把木料和工具在院子里摆放停当，而一旁的我，常常雀跃着捡拾四处纷飞的刨花和大大小小的零碎木块，凭借想象搭建成各式奇奇怪怪的形状，那些木材散发出的特有清香和曲折变幻的纹理，弥漫于儿时的记忆空间。及至他们离开，我家总会多出几样新东西，如今，爸妈屋里摆放的书架、电视柜和高低不等的桌椅，都是姥爷当年的杰作，而这其中，又倾注着姥姥多少无言陪伴。

姥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家教极严，清规戒律很多，就连吃饭和作息，都有一套严格程序，而且能够坚持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比如吃饭，他向来是先喝汤后吃馍，姥姥从不问为什么，只管照着去做就是，因为在她眼里，姥爷的言行就是行动指南。不仅如此，姥爷对姥姥的“监督”也是一刻不肯“放松”，还记得每到吃饭的时候，姥爷总爱盯着姥姥的饭碗，“逼迫”姥姥把她碗里的饭吃完，否则他就瞬间变成了倔强的小孩，把自己的饭碗推到一边，“绝食罢工”，每次，姥姥都会在姥爷的

执拗和霸道面前乖乖就范，快速把饭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自然是皆大欢喜。

姥姥性情温顺，善良柔弱，生活中却从不曾受过谁的气，因为她身边有棵大树，时刻在为她挡风遮雨。姥爷平日待人宽厚，对细微小事极少在意，可当身边有人稍微对姥姥表现出不恭敬的态度或流露出一不尊重的言辞，他就会马上做出反应，一阵犀利言辞便把他们训斥得哑口无言，而一旁的姥姥，总是笑而不语，好像有了姥爷在身边，这世间的风雨永远都不会降临到她身上。在我眼里，他们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

姥姥一生行善积德，活到92岁高龄无病无灾，直到去世前的两天，食量骤减。姥爷说，他有预感，姥姥快要走了，从那时起，他就日夜守在姥姥床前，紧握姥姥双手，一刻也不肯松开，全然忘记自己已是年逾九十的老人。两天后，姥姥喝完最后一口水，在姥爷的凝望中，安详离世。

正月十六，是姥姥出殡的日子，前来送葬的亲朋好友挤满了小小的院落，亲人们担心姥爷的状况，纷纷围着他嘘寒问暖，姥爷始终保持着各种礼节，依然是少言寡语，表情也如平日般淡定。临近出殡时辰，姥爷却执意要求为姥姥送葬，家人自然不肯遵照他的意思，一是传统习俗中没有丈夫为妻子送葬的规矩，二是老人年事已高腿脚不好，加之天寒路远，身体经不起如此折腾。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故作轻松地微笑着摆手：“你们都去忙吧，别担心，我好着呢！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就不去送她了，只愿她一路走好！”随后，转身走进里屋。姥姥姥爷住的房间正对院子中央，房门上挂着厚厚的棉布帘子，大家看到姥爷进屋，放下心来，忙着去准备出殡事宜，但是，就在亲友们抬棺启程离开小院儿的那一刻，门帘儿被偷偷地掀开了一条缝，一双混浊、无助却又无比专注的眼睛，正目送着灵柩渐行渐远，那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伤感、爱恋、不舍、失落……原来，姥爷心里始终都不曾放下，不曾释然，压在淡然表情下的，又有多少沉重的悲痛！这个鲐背之年的老人，已经没有能力亲自为爱入操持后事，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悄悄地向老伴儿做着最后的无言的告别……

姥姥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美

好，姥爷则以他宽厚博大的胸襟给予这个小脚女人无尽的关爱和信念，他们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更没有浪漫传奇，可是，从青春年少走到白发苍苍，七十多年的形影相伴相濡以沫，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和浪漫！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也许他们从来都不曾听说过“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美丽诗句，但却用一生无言的陪伴写下了最美好的诗篇；虽不曾发出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的动人誓言，却以对彼此一生的呵护奉献体现了磐石和蒲苇的经典爱情隐喻。

姥姥走后，姥爷一直沉默寡言，虽有子孙满堂承欢膝下，却始终悒悒不乐，一年后，姥爷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2岁。

（作者简介：李瑞华，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闲话苏辛

□ 瑞果

小时候读诗，不喜欢苏轼，总觉得纸背后有种怪味道。现在懂了，那是禅味。（就像小时候吃菜吃到豆制品的味道，无论豆腐豆芽豆筋，怎么变花样，味蕾总能感觉到。不讨厌，但是怪。）

小孩子怎么会喜欢禅味呢？！那少年时喜欢谁呢？喜欢辛弃疾。辛弃疾带着一股热血劲儿，“醉里挑灯看剑”，即使老了写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让人觉得热血未凉，一辈子“归来仍是少年”！

辛弃疾和苏轼晚年的词虽都有壮志未酬的调调，但又是不同的。辛弃疾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始终带着“还能抢救一下”的“执迷不悔”。苏轼则是一个儒释道融合实践家，他的许多诗词的立意



在于俯仰天地之间，他的旷达根基不在于人间的志酬或温情，是一种哲学的超然，他在宇宙时空里和自己对话，因为视角无限大，所以境遇的悲欢离合变得很小，愈到晚年，这种“空”的境界愈加明显。竟至于到了最后，苏轼为逝去的爱妾朝云建的墓取名“六如亭”，题词“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虽然被归为豪放派，苏辛两个人都十分的浪漫温柔。流传千古的许多浪漫诗词都出自他俩。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辛弃疾“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十分地美好。即使白描，也都别有一番风味“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两个人都非常热爱生活。虽然坎坎坷坷曲曲折折，都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辛弃疾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词，一读就莫名喜悦。苏东坡就更不用说了，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妥妥的吃货一枚，在吃上充满了创新创造精神，乐此不疲，孜孜不倦。翻翻历史，最早全国范围给荔枝打广告的一定是苏轼，放到今日，一定是美食博主，妥妥的带货达人。能吃说明了什么呢？热爱生活呗！

苏轼与辛弃疾虽然浪漫温情，虽然也都豪放旷达，但旷达的底色不同，可能跟亲情的遭遇不同也有关系。辛弃疾的子嗣众多，人丁兴旺，这对壮志未酬的辛弃疾来说，莫不是人间的巨大慰藉，天伦之乐削减了伤春悲秋，晚年还能对孙子们吹牛讲故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算吹牛哈！实情！辛弃疾打仗确实厉害！50人小分队就能深入敌营擒贼擒王）……而苏轼，一生先后经历的三个妻子都与他伉俪情深、琴瑟和鸣，却都早逝，孩子们也多夭折，这种至亲离去的悲伤，

大约用人间之词很难安慰，唯有用超越时空的胸襟才能稍许安慰。千百年来，苏轼是豪放达观的典范，是热爱生活的典范，但真正喜欢苏轼的人，可能是非常安静的人。苏轼无论怎么热闹，底色中都有一丝寂静，你看他的画，石头与樵木，没有叶子。“旷达”，这个词形容他再适宜不过了。“旷达”和“豁达”是微妙不同的啊！旷达是俯仰天地，望着遥远的星空，尘世变得微小，全情投入、享受趣味，可是内心里知道“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豁达则是，哈哈一笑，继续吃瓜。

说完苏辛，想起陆游。陆游也是童年记忆里一个神奇的存在：无论多年轻，他在我的印象里都是一个老人。一个人总年轻过吧！但是为什么他在人的心里永远是老人？！

辛弃疾是永远的少年！

陆游是永恒的长者！

致敬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历史天空的星辰们，闪闪发光，让我们有好故事可读，有大美可以欣赏！感受他们的感受，就好像有了跨越时空的各种好朋友，让生活充满丰富趣味！

（作者简介：瑞果，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思政专业2004级学生，现在郑州某机关工作。）

「北漂一年」

□ 肖雯

二十六岁那年夏天，我也成了北漂一族。毕业后在北京辗转了两次住处，终于决定在一年之后搬离了热闹的城区，住进了通州界边上的一栋高楼。离开三源里旧住处的最后一晚，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书已经打包送到了办公室，衣服、棉被和杂

物都被塞进了三个大箱子。所有毕业之后的生活痕迹都被清理一空，所有的刚毕业时沉甸甸的回忆都会被打包装载，快乐或不快乐的过去在搬迁过程中被随意丢弃。再看一眼房间，这间朝西的卧室正在经历入夜前的黄昏，没有鸽子和云，也更没有



飞机或是流星，平淡的一天要结束了，就像之前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一样。这个住了好几个月的房间，但以后也将再也不会回来看看了，北漂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合适的家。夜里，家里的猫在四处跑闹，扑打着纸箱上的封条，在相对沉默的夜里，只有她还不知道明天将跟我去往何方。

新住处是几天前确定的，定下的原因很简单：我想有一间朝南的卧室，再大一点当然不错，可是以我的能力，能够承担的房子都在朝阳之外的市郊。在手机上反复将地图软件按比例缩小，偌大的北京城区极速地变成了几个微缩后的宋体字，最终决定郊区就郊区，尽管距离上是远了点，但好在通勤方便、视野开阔，在温榆河边还能享受多余的安静和自然。新家距离首都机场的直线距离只有12公里，正是飞机破云而出开始下降高度的位置，刚住进来时我常常被夜半飞机掠空的轰鸣声惊醒，开始隔着窗户新奇地数着秒表看夜空中将同时会出现几处光亮。一架飞来，十秒后又将有一架冲出云层，小城市来的女孩频频感慨首都机场的吞吐量可真大。临近破晓的时候，一架飞机已经飞的很低了，可以看清它的月白色的机身、左右两侧着陆时分别打闪的红绿信号灯和尾端翘起处航司的标志，那几天里我和家猫都沉迷于盯着这些天上来的巨兽，一看便是小二十分钟。小区里这栋拔地而起的高楼使我比周围的大部分小区住户都要看的高远，不但可以看见附近运河广场上热闹的多彩霓虹，甚至可以看见西南方十七公里开外的那栋高大中国樽的顶端。这些看似邈远但又举目可望的城市地标，始终让我觉得我并没有逃离城市中心太远，地铁带着人群向无限

扩张的城市边际处奔跑，但大家总归还处于同一片属于北京的地理空间之中。

毕业之后的新生活开始的并不如意，但在搬到新家之后，的确开始舒心很多。房间的朝向变好了，朝南通透的房间和门外走廊上的窗户，都让我总算在工作的间隙中获得了一些新的喘息，因此也开发出了一些新的观察生活视角，比如向远处望山，又或是低头看着高楼下的人的聚会。北京的夏天天气很热，四五点钟仍然被暑气蒸腾，准点下班的时候总要抓紧时间坐上车，只为赶在日落之前到家，看那几分钟夕阳西下。这栋高层建筑物在走廊中间打开了一扇窗，站在窗前向更远处可以看见城市北端那些怀柔的山，六点的时候金黄的光会从北方山脉的脊梁朝我而来，站在窗户前短暂地沐浴在光里，直到它冷却、消退，直到城市亮起灯火。那扇窗在夜晚向我展示热闹的城市，也让我和身外世界多出一些温柔的牵连。我很平静地适应着工作之后的新身份。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门口的这扇窗户不止有我一个观众。那天我在家里休息，听着屋子外有人说话，推开门去看，是一个脸圆圆的保洁阿姨，皮肤略微发黄，眉毛处纹着前几年颇为流行的平眉，是平时偶尔也会在上上班之前和下班回来后遇到的人。她的脸上总是笼罩着一股水气，似乎是劳动后汗涔涔的样子。她上门打扫时背上背着一箱保洁工具，手里还提着一些零零散散的工具，这些打扫的东西看着不多，其实比想象中重得多，得有五六公斤的样子。在下电梯时寒暄几句，得知她是永顺镇附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每周来到这个小区做六休一，虽然辛苦但是就在家附近，也乐得忙碌。她每次来做保洁会先从楼顶开始，从三十一层的顶楼一直做到二十一层才会休息，10层下来喘气要喘很久，等气喘匀了再向下去继续打扫。这休息的间隙，她就会像今天那样站在窗户边，站一会向外看看山，在工作的间隙喘上一口气。平时我不在家，所以没有机会听到她在电梯外用塑料桶装着拖把的碰撞声，今天一打开大门就看到胖乎乎的她在楼梯间朴实地对我笑，似乎是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她也曾在二十一层出现过几次，但打电话的声音模糊，到终了也不知道她急促的对话中，在争论着哪些故事。后来的有一天，我也听到过她在躲在窗户旁边的楼

道间低声哭泣。从不断传来的哭腔中，似乎在质问男人一些问题，但又没有泼妇的呛声，提高声音起来多说几句便有点于心不忍，呜呜咽咽我始终未曾听清她说的什么，一阵收拾水桶与拖把的声响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无言无语。再后来，也不再见到这位保洁阿姨，也再也不曾见到过同我一样继续站在高层的窗户边眺望远山的人。

新家位置较搬家之前偏远的多，因此也需要承受更久地通勤时间。从早到晚，北京的地铁里总是这么多人，一天之内似乎能在六号线上看尽人的一生，他们在这里上班、上学、恋爱、结婚、离婚……小区附近还有星点般散落的其他社区，年轻人也相对城中多出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总是忙的，七八点开始就要像流水线上的珍珠被倒进巨大的水盆中反复揉搓冲刷，更要在前辈的指引下试图去硬生生地扎根在巨大的人流中。大都市会永远年轻，但更享受年轻的城市带来的便利的，显然不是这些步履匆忙，穿着合身却拘谨的西装的北漂青年。每天我下班回来，都更羡慕那几位从远处温榆河边背着渔具归来的大爷，身旁偶尔会跟着大孙子和小黄狗。他们跑前跑后、呜呜汪汪，快乐地跑来跑去，鱼桶里虽然可能没多少鱼，但从神态上看来却很快乐。楼底下空处一群大爷大妈更会享受聚会的快乐，他们占据着一楼外平地乘凉，背后的那片空地是小区里的配电室，四四方方的建筑里面时不时地发出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和外面飞驰而过的外卖配送的电动车响、时不时钻出来嚷几声的流浪狗团伙们，共同构成了本地人幸福的生活场景。

入夏之后夜变很长，聚在一起聊天的大爷大妈也并不总会在一个位置上聊很久，四处溜达转转之外，碰见新的伙伴加入进来也会热情地上前问候。我常常在锻炼之余，坐在聚会地的附近偷听他们在聊什么，除了大妈们会议论过往的行人谁是住在哪一户的住处，谁家的孩子最近考了满分之外，大爷们更热衷于讨论家国大事，比如特斯拉爆炸和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息息相关，说到兴奋处更是连手带脚地比划起来。尽管人来人往，闲聊的小团体中偶尔能跟我多说几句的，是一位被叫做“袁老师”的阿姨，她看起来是刚退休的年龄，因为总抱着一只不大的可爱小比熊，人看起来热情又和蔼。每次出

现在人群中，我便主动上前多说几句，或是聊聊养狗的吃食或者是团购买菜的优惠，久而久之便相当熟络了。认识之后，有时候离老远看见她们说话，袁老师还会对我眼神示意，给我一个眼神的肯定，招呼我过来看看小狗。“袁老师”是天生的主角，典型的热心北京人，嗓门大聊得多，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她这只喂得白白胖胖的比熊。我羡慕着对袁老师说小狗养真好，她笑着说“我没有老伴了，平日里也就这点退休金，女儿太忙也不住这里，养个动物，就是个伴了，每天梳梳毛遛遛狗，才不会浑浑噩噩地过。”夏天的晚上的七八点，空气也渐渐凉下来，有一阵凉风吹过，袁阿姨从包里掏出拴狗绳，往小比熊的脖子上系好，再摸摸它的鼻子喂几口水，风吹动了我的几根头发，似乎心里也被这个场景触动到，夏天的夜晚真美，只是不知道小狗明不明白一个长辈对它无微不至的爱意。后来，因为有一阵工作很忙，下班回家再吃完饭快要到八九点。没有时间去楼下坐坐，旁听“聚会”，再等到快要秋天的时候，重新下楼，发现袁老师她们的小团体早已不见了踪迹，或许也是要带着小比熊去找新的玩伴玩耍，或许是去西城的女儿家去带孩子，总归是享受一些新的不那么混沌的生活。我多少是羡慕的，“袁阿姨”她们，在城市里有个家，即使聚会结束了，也并不会孤单。

毕业之后，从学校的集体宿舍中迁出，开始进入流动的现实之中。今年夏天似乎变得特别漫长，久到傍晚在温榆河边散步，有小朋友拍着篮球跑过来的时候，连皮球拍地的砰砰声都仿佛被拉长了。北漂的生活中，工作场所从中关村转移到了十里堡，往来的交通路线和居住环境更是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但生活却很难继续保持持续深入的交际，进入了一个人来人往，却人潮散去的阶段。那些曾经短暂进入并分享着彼此重要的生活空间的人，也会一转眼间便会随着人潮消失。就像是站在红绿灯前的一次驻足，红灯亮了，停下来看一眼对方；绿灯亮了，人群涌动，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我开始接受生活的变化，它似乎恢复了应有的样子，短暂地飘过却不再有持久的停留。在这一年中，有一些朋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京，也有一些人坚持了下去。在饯别离去的朋友时，双方彼此都认为我们作为伙

伴都只是陪伴对方走了一段路，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就像那首歌中唱的那样：“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巷口，是永远的停留。”

（作者简介：肖雯，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现供职于鲁迅文学院，主要从事作家培训工作。）

* 故里寻乡 *

□ 高学梅

告别，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告别无处不在，却也无声无息。我们会在每日的清晨告别美梦，在路过的乡野告别蒲公英，在久日不居的院子告别枯柳，在温润的傍晚告别夕阳。但，我们可以一直追寻，追寻那些逝去的梦，追寻那些儿时记忆中的剪影，追寻正在慢慢消失的故乡风景。

当肚子的叫声和晨起的喧哗相遇时，路边的油条倒比门前不知名的花要香得多。即使不知，但它在我脑子里是有名姓的，“木棉”最为适宜。这个时节，远不比乍暖还寒时，早早的街道上堆满了早早的人们，再早的姑娘也会有了注视的目光。不知道这村子还能活多久，但很显然，我不舍了。

按辈分该叫“老奶奶”的人，却不是很老。那个别扭的“老”字每次都会被姑娘的唾沫噎回去，这倒无伤大雅，那个被叫“奶奶”的人仍然会笑着问你去干嘛。伸完懒腰的她笑咪咪地顺着你跑去的方向，自此，就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乡村社交，至于下次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说上话，就是天知道的事情了。



向西，背上驮着阳光。

没有房屋的交界处，有一个看起来还算清澈的池塘，我不知道村里的人有没有用它浇过地，更不知道有没有用它喷过药，但当我看见一大早就有人来钓鱼时，还是表现出了惊讶，并把这些忧虑告诉了做着早饭的妈妈。再继续的话，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块地，好像小时候在这掰过棒子，往大盆里扔，又好像浮现出我爸看见飞机，让我姐趴下的搞笑场景，但最重要的是，我奶奶的坟就在这块地，小时候经过，有点害怕，但长大后看见，格外安心。它也早就不是我们家的了。

再往西，就有狗听到了你的脚步声，是几家一起，我时常怀疑它们结了亲，才会这么惺惺相惜。倘若主人给它们过分的自由，那那些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大棚是会赔光的，所以自然不用害怕，它叫着，你走着。西的尽头时，便要拐弯儿了，若是向左，你可能会看见被杂草覆盖的石碑，碑上写的是村名。再往左，有了崭新的站牌，这，是以前没有的。但我不会往左，因为右边有西湖。

此西湖，非彼西湖，却远胜西湖。右边的朝阳已经升的很高了，左边的湖风暖暖地吹过来，又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鸟突然飞起，又是我从未见过的鱼跳出水花迎接，又是那日复一日的涟漪在保护着我的童年。湖的最北端，我会折回去，但今天，我想讲一讲左转了的故事。

又一次驮着阳光向西。这条路出现过在我姐结婚的录像带里，那时还小，说着我将来结婚也要走这条路，风景真的很好，当然，姐结婚是夏天，山湖繁茂。至于现在，我没有去过。终于到了那个铁栅门，它以前是开着的，我们一到周末就会进去爬山，那时不懂得这山到底是怎样的山，觉得它已经挺高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有要坐好久的车才能到的花果山山顶，还有半夜就需要出发看日出的泰山，但在我的心底里，总想起这两座假山。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它锁上了。但我们没有停止爬山，我们要么从铁栅空隙里穿过去，要么从门的左边跃过湖的一角迈过去，第二种方法极为凶险，但当时毫不畏惧，现在想起来，很是感谢上天的庇护。径直走进去，是一座桥，站在上边，迎着湖风，得劲得很，吆喝着左顾右盼的伙伴们，上了山。虽是假山，但有层层台阶，依稀记得第一次爬山的小姑娘晚上做

了噩梦，说是再也不来了，但这话是她第二次来的时候对我们说的。山上长满了树和草，绿葱葱的一片，到山顶时，还有一种孩子性的自豪感，但自从对面穿制服的叔叔说有蛇之后，再也没去爬过……

我们不妨绕着湖走一圈，到湖的西头，向南拐，不久就到了传说中的“皇老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反正是这个音儿。进门的左边是竹子做成的住房，我们无数次用破旧的瓦片在那过家家，青草为菜，水为茶。右边是个酒店，当时因为我们经常去，有幸可以随意进去玩，现在，不知道曾经那个哭着找我们的老板儿子去了哪。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酒店有阁楼，西边，还有一个狭长的走廊，之所以记得走廊尽头的门，是因为我爸曾经在这扇门里探出头寻我回家，玩疯了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份害怕。“皇老太”里有很多小房子，都空着，没有门，没有窗户，那时的男生们都拿着自制的枪，一间一间搜罗，说是确保安全后才让我们女孩子进，还记得那一下午，男生们“侦察”完了所有房间，我们女生则坐在草地上吃着拔来的“谷荻”（山东方言）。绕过半个环形，一直走，再穿过一片草地，就到了大人口中的“蒙古包”，门的右边有一口井，拿枪的男生说，里边有蛇，但是死的，我至今都没敢去看，我们依次进去，大声地喊几声“啊！啊啊啊！”，再跺几脚，最后有一个人总结说：“喊起来像机关枪，跺起来像地震。”我们大家都很认可，但后来，再也没有人敢穿过那片草地去喊几声、跺几脚。

从“皇老太”出来，往东，还有一座桥，桥上有几个马蹄印，桥下，我们自然也探索过。小时候是不知道脏净的，况且桥下能够下得去脚，抬头，有人说是毛泽东刻下的字，另几个人也跟着附和，我也信了，自此，觉得那座桥很神圣，但长大后细想起来，不免浅笑，我猜那可能是爷爷辈的人调皮留下的，也可能是修桥的人留个纪念。继续往东，好像没有什么了，只是湖水干涸时，我们走下湖去直奔山里，就不用再理会那铁栅门的阻挠了。山湖本该一体，湖底的脚印，是值得向大人炫耀的事情，但你要做好挨骂的准备。

20余年，见过因房打仗的亲兄弟，见过为了不让她们在自己房子上画画而哭的小姑娘，见过大街上扬起的麦子和铺地的棒子，见过想要挣破薄膜而出的棉花幼苗，见过大手握小手的乡间散步，见

过孩子们围成圈打着卡，见过已经忘了形状的跳房子……太多太多，如若真的写下去，是不会有尽头的。村里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我们长大了，上一代又老了，而现在在我家闲置的西园子里过家家的下一代，我顶多认识一个。将来，我也会走，但我从未想过会彻底失去它，它，会走在我的前边，让我回忆。我是自私的，我一直都想让它回忆我，不知道我们家里没人的时候，它是怎么自己度过一年四季的，我错过了太多次欣赏它的机会，这次因为疫情，我看到了属于它独一无二的美，没有一座城市可以比得上，这就是即将伴我一生的乡愁吧。

谨以此纪念我的故乡，致敬我的童年。

（作者简介：高学梅，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古城记游

□ 魏中华

江畔的绿柳
轻摇的芦苇
聚拢着的
裹挟着炎热气息的风
环抱的南湖边
古老的城墙
依然屹立不倒
而视野里却寻不到伟
岸的身影
天无云，蔚蓝
轻纱般拥抱着水面
寂寞的汀上
鲜血染就的睢阳城
早已不复存在
余下的，只有那一腔热血
伴着那不朽的忠魂
在江上的无声息的蔓延着
心情犹如飒飒秋风



载着无尽的庄重与肃穆
那应该是对历史的敬重吧
也许是对英雄壮举的敬佩
抑或是两者兼有吧
放眼周边
连那隐隐的一角张巡祠
也演绎着安史往事
说不尽古城里斑驳的过往
迎着一层薄薄的曦光
越过九省通衢的牌坊
踏进了商丘古城
翻开了历史的篇章
我在这古色古香的城中
嗅到了历史厚重的气息
遥想着张巡死守睢阳的豪气冲天
逝去的将士
你们是否看见了这气势恢弘的城
看到了记录你们辉煌的祠
听到了那策马奔腾的浩荡
我在这杨柳依依
掩映在青山碧水中的古城
看见了微波粼粼的南湖
忆起了英豪人杰的才情
朋友呵，
你可还记得晏殊儒雅的风度
可还记得张巡誓死不降的忠义
可还记得范仲淹谈笑风生的气概
古城墙，状元桥，陈家大院
八关斋，张巡祠，应天书院
……

历史的故事在这里重演
我将这城写在沉香墨色里
等三月莺时
云岫成诗，晕染故事
教我如何不爱这青黄深处恢弘的城

（作者简介：魏中华，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春的无奈※

□ 张梦璐

冬天缓缓地过去了，然而寒冷却留恋着这北国的城。太阳已经转换出了温暖的那一面，整个冬日的休养生息，已然使它精神焕发，重又恢复生机。尤其这两日出来的越发勤快了，总是破晓时分便已登上山峰，待人们开始忙碌，它早已斜照大地。



春天早已迫不及待，想要一览这北国之景。展示它盎然生机的一面。奈何冬日总也不肯离去，纵是将走之际，也仍是派雪来大闹了一场。将这大地上的一切皆用皑皑白雪遮盖，似是要给春天一个“下马威”。又像是临走时的叮嘱，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至地面，每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都像在诉说，诉说着：“莫要忘我，莫要忘却冬。”然而人们却不甚在意，除了瑞雪兆丰年的喜悦之外，也无其他。

春则更加无能为力，热不及夏，寒不胜冬，在四季之中地位可算得微乎其微，就连萧瑟的秋似也高它一筹，颇得人们的喜爱。

然而，人们其实也并不厌恶春天。可能爱极成恨这个词语有些不太恰当，但或许确实有这么一种情感在其中。人们喜爱春的生机勃勃，万物复苏；喜爱春的百花绽放，争奇斗艳；更是喜爱那温柔多情的风姑娘，当它飘过时，不似狂风那般张狂，不如秋风那样萧瑟。总是轻轻柔柔的，像是抚摸，像是问候。可是，春总是姗姗来迟，却又匆匆离去。人们喜爱春，却又恨它的来去匆忙。

万事皆有因果，有果必定有因。春的作为为人们所不解，然而确实与它无甚相干，若要说来这北国之城游历一番，恐怕四季之中春要当属第一了。无奈冬总是停停留留，眼看已是离去，却仍旧会中途折返。春也无可奈何，该到自己登场却无法表演，待到演出未完夏又提前到来。颇有一番同台竞演的势头，低调的春天便悄然离去。

所以春天总是短暂的，却又美好而又温暖的。一如我们的青春，纵然短暂却又美好，表演的时间虽短，但只要还在台上，就用尽全力展示自我。

（作者简介：张梦璐，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学术动态●

王阳博士获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2021年9月下旬，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发布消息，公布了2021年度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拟资助名单。我院青年教师王阳博士申报的《元代契约文书辑校》获得立项支持。在此之前，王老师曾荣获2019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及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此次获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不仅是学界对其近年来从事学术工作的充分认可，与其个人勤力向学与学院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密切攸关。今后我院将继续增加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力争每年均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等高水平项目中标，俾助力学院一流学科及申硕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继周堂读《庄子》随笔之一：

叩问：庄子休先生，您家在哪里？

□ 庄桂森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子承父业，恪守父训，矢志写一部史书，一生为写史书而忙。受宫刑后大狱里蹲着、心里苦着、下身疼着，一切都忍受着。痛苦地等待着，痛苦地忙碌着，痛苦地渴望着。终于，理想变成了现实，写成了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史记》是伟大的、司马迁是了不起的！

哲人庄子休先生的生平与老子、韩非子、申子合在一起，成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虽然只二百九十多字，却是有关哲人庄子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司马迁说庄子蒙人，没有说蒙是封国还是宋国属地，更没有说蒙地的准确位置。以至于前天、昨天、今天的学者们为此大动脑筋、大伤脑筋，翻古书、找实物、搞调查，不计劳心、劳身之苦，考证蒙在哪儿，真心地想弄明白是什么样的水土孕育、成就了庄子这个光照千秋德泽万代的思想家；真心地想搞清楚庄子这个名贯古今学誉中外的哲学家他他他在哪生活、课徒、终老？在前天、昨天可有不少人为这事而彪炳学术史，在今天也有不少人为这事而称誉学术界、当上了教授，过上了衣食无忧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不少的县、市为提升知名度，地方政府主动作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邀请些读书人参与其事，于是名人故里之争此起彼伏，甚者聚众挥拳撕扯推搡。争相做名人故里成为一时风气，坊间有传言，潘金莲也被一个地方标榜。庄子，名贯古今驰誉中外光照千秋德泽万代，他的故里在哪儿？更是喋喋不休、莫衷一是！

今天，大致有豫东、皖北、鲁西的五个地方争

相称为庄子故里。说二千两百多年前，庄子休先生他老人家，在那地方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他老人家在那地方垂钓、打鸟、粘蝉、卖草鞋；他老人家在那地方曝背搔虱；他老人家在那地方与惠施互掐、糟践



曹商。学术界称之为“三省五地说”。五个地方为自圆其说为胜出都组织了班底，把从唐宋到明清，正史的、野史的，国家的、地方的，官方的、民间的，凡是文献中有蒙庄两个字的、沾上濮字边的、再加上相关的传说都挖掘整理出来。然后，请客邀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精心研究认真研判，细致分析充分论证，尽最大努力争取用最充分的理由说明，“咱这地儿”，是庄子故里。

疑点来自《史记》，不知道伟大的、了不起的史学家司马迁他是一时疏忽？还是从实所记？“庄子者，蒙人也”。啥呀？“蒙”人也！蒙是一个方国吗？蒙不是周灭商后的封国。蒙是宋国属地？那司马迁你应该记为“庄子者，宋蒙人也”。当然，这样写，不合乎司马迁你写文章记事的习惯。如果说蒙是宋国属地，今天的豫东商丘周围、鲁西南聊城、菏泽一带春秋战国时期的宋领地，为什么没有一个以蒙为名的县镇？搞不懂弄不清楚，也没有人能搞懂弄清。如果说庄子休先生为宋之蒙人，为什么庄子休先生总拿宋人开涮？他挖苦宋国大商人曹商、讽刺宋国民营企业家资章甫。庄子休先生他他他难道不愿睦邻、不爱家乡、不爱国家？愿做一个不爱国、世人共愤的公知？如果说庄子休先生不是

宋之蒙人，为什么宋国君、宋国人、宋国在《庄子》一书频繁地出现呢？

看来，需要说司马迁几句，司马迁你的的确确读了不少书，你也确实确实翻阅过不少皇家档案；为验证书籍档案的真实性你还实实在在地作过实地考察。司马迁治学、写书相当严谨，不像今天的些许教授，读书坐不住冷板凳；做学问不用心又无才；说起话来不过脑；写文章或剪刀加胶水或在电脑上划拉，没立场、没品格，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司马迁你写《史记》是真的认真，用心、用才、用德、用见识，那那那那，周武王灭商后没有封个蒙，你会不知道？

庄子休先生，您老人家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濮水垂钓、借粮河监侯、与惠施濠梁吐口水、仙逝葬身的地方，那那那那，究竟在哪儿？我给您跪了！

庄子休先生，我把您写的内七篇和您的门人所写、署您名下外篇杂篇认真地检检翻翻，发现有几个问题，在此叩问，顺便说一句，我是认真的。

叩问，在《庄子·外物》一篇中讲到，您老人家的粮食囤见底了面袋子瘪了，不得不拖着饥瘦的身子、低下高昂的头去找河监侯借粮，被高高在上、毫无义字可言、满脑子刁钻的河监侯婉拒后，您老人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现在我们命名为“涸辙之鲋”。这事是真的吗？如果这事是真的，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您和河监侯不仅很熟而且相距不远，您家住在黄河边？地球人都知道，庄子休先生，您老人家是个“说段子”的高手，如果这事仅仅是个段子，因段子中拒贷的是河监侯，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您和河监侯是近邻，您家住在黄河边？

叩问，在《庄子·秋水》篇中也讲到，楚国国王派两个大夫作特使带重礼去找您，愿“以全境累矣”把国家交给您治。您不为权位所动、矢志作隐，拒绝了高官厚禄，这事是真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事应该是真的，两个大夫找到您时，您正在濮水钓鱼，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濮水流经您的村头亦或不远？庄子休先生，地球人都知道，您老是个“说段子”的高手，如果这事仅仅是个段子，因段子中您老人家会客在濮水岸、会谈垂钓中，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濮水流经您的村头亦或不远？

叩问，庄子休先生，您曾做过体制内的漆园吏，当然，您后来炒了领导，辞职不干了。这事是真的吗？如果这事是真的，您撻挑子炒领导，我想绝对不会是待遇问题，楚国相位您老还没看上呢！您撻挑子炒领导不会是因为异地为吏吧，如果不是异地为吏，您上班的地儿离家不会太远。有学者考证漆园得名于漆水。庄子休先生，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您老的家园在河、濮、漆水三者交汇地？这个地区是您老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垂钓、借粮、与惠施打嘴仗吐口水、仙逝葬身的地方？

叩问，庄子休先生，从您老著述看，您生前接地气的很，朋友多是些如杀牛的、做车轮子的、粉刷墙壁的、打石头的、相狗的、杀猪的，甚至斗鸡的、耍猴的等等。官场中、文化圈子里的好朋友只有一个，那位在魏国位高权重的宋国人惠施。您书中有二十余次对话记录，其中有一半是与惠施的。您二人是很好的朋友，“相见亦无事，不来又思君”。不见极想念，见了就是相掐、就是开涮、就是互嘲的好朋友。您老的妻子死后，惠子能去吊唁而且对您老敲着盆唱歌极为不满，大加批评，应该说他是您很交心的、对您的事很上心、很够意思的朋友。惠子先您驾鹤西遊，您打惠子墓前经过时，给随行人讲了一个段子，还流露着真情、充满遗憾地说，“自惠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今天的人们命名为“运斤成风”。庄子休先生，我可以不可以认为，您老与惠子邻村或相距不远？找到惠子的故里、墓地位置，就找到您老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垂钓、借粮、与惠施打嘴仗吐口水、仙逝葬身的地方？

叩问，庄子休先生，您老有家室有后人，您老羽化成仙驾鹤西遊忝列仙班设座瑶台后，您老后人应该以您为荣；您的后人是不是随着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而瓜瓞延绵开枝散叶？您老后人是不是都固守着家园？他们应该在唐玄宗李隆基诏封您老为“南

华真人”、《庄子》这部书为“南华真经”后因您自豪；他们应该自觉地在您的诞辰和忌日祭拜您追念您感恩您。您老在天之灵知道，咱中国人有一个文化传统，就是推本溯源慎终追远奉先思孝，有在农历十月一日、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节、生忌日祭奠先人的传统。您老东汉以后被道教奉为祖师，那粉丝而且是铁杆的多了去了，唐皇帝李隆基、宋真宗赵恒都金口吐玉言诏封您老为仙人，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全国人民尊崇您、信仰您、祭拜您。您老在天之灵知道，唐以后历代皇帝对圣人地望地和后代都减免赋税和徭役，以作祭奠所需。可以肯定地说，您老的后代坚定地、坚强地生活在您老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垂钓那地儿。您老在天之灵护佑着他们，他们也都时刻追念着祖德恪守着宗训、一代接着一代地守护着您老留下的家园和您老的墓地。庄子休先生，我依据堂号衍传、祭您诞辰、奠您忌日、守护您墓地的庄姓族群的居住地，是不是可以认定为那地方就是您老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垂钓、借粮、与惠施打嘴仗吐口水、仙逝葬身的地方？

庄子先生，您老在天之灵知道，唐朝天宝元年即公元770年，唐玄宗李隆基颁布诏书，御封您为“南华真人”，与冲虚真人列子、通玄真人文子、洞灵真人庚桑子并尊为四大真人。诏改您老的《庄子》为《南华真经》，与《冲虚真经》《通玄真经》《洞灵真经》合在一起为《道德经》之下的四大经书。想来唐玄宗李隆基颁布诏书那可是国家意志，不会是用屁股决定大脑或大头一发热想出来的，那是他身边的大官们、学者、高参的集体智慧。那我想问您，他为什么诏封您为“南华真人”？为什么诏改您老的《庄子》为《南华真经》？南华是什么意思？

您老仙逝后，学者考证。有的认为，是因您老生前村子附近有一山叫南华山，也有人说您老生前村子附近有一地叫南华。庄子先生，如果我找到历史上曾经以南华命名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认定为那地方就是您老生活、为吏、隐居、著书、授徒、终老、垂钓、借粮、与惠施打嘴仗吐口水、仙逝葬身的地方？

（作者简介：庄桂森，商丘师范学院学报原主编。）

●学术动态●

时国强教授、孙佳博士、郝鹏飞博士获2021年度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

2021年10月8日，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网公布了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立项名单。此次我校总计获批各类项目8项，我院获批3项，时国强教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演变中的民俗因素研究》、孙佳博士的《中原地区文化空间类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和郝鹏飞博士的《豫北晋语虚词及其语法化研究》获得立项资助。

上述成绩的取得，不但与三位老师的辛勤努力密切攸关，充分展现了醉心科研、持续不断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与我院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密不可分。今后，我院将继续加大对各位老师在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支持力度，助力他们再创佳绩，俾为日后学院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及硕士学位授予点申报奠定扎实的科研基础。

● 书院研究 ●

明清太丘书院考

□ 刘万华

明清时期是中国书院发展的高潮期，不仅书院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经过官绅的共同努力，书院教育进一步与儒学、科举相结合，在培养人才、发展学术、健全人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明珠。



豫东的太丘书院是明清时期一所县级书院，坐落于豫鲁苏皖交界处的永城县城内，规模较大，设施较完善，招生政策开放，办学历史悠久，影响较深远，在商丘乃至河南古代书院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但种种原因致使其湮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亟待系统深入挖掘，以突显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一、太丘书院创办时间

关于太丘书院的创建时间，最早见于明末清初李荫岩《重修太丘书院碑记》所载的“隆庆二年”，此文收入康熙三十六年侯良弼纂修的《永城县志》卷七，此书卷二“太丘书院”条，亦云创修于“隆庆二年”，此后乾隆《归德府志》、光绪《永城县志》及现代研究著作，如卢玺媛《明代中州书院文化研究》^[1]第52、117页、葛玉山《太丘书院》^[2]等，均沿袭这一说法。经过细致爬梳，我们认为“隆庆二年”说是错误的，太丘书院的创建在隆庆四年，落成于

当年的十一月。

太丘书院的创建与知县左思明密切相关。思明原名思聪，字季臣，号五河，陕西耀州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举人。隆庆二年（1558）三月二十九日除授永城令，六月十二日到任^[3]《二年考语》，万历元年（1573）离任^[4]卷三十三“职官四”。到任伊始便迅即带领百姓开渠排水，修路架桥，筑城固郭，救民于水火。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称赞他“事举而民不劳，庶几乎有为者”。^[5]卷六又奏请免除怀庆运粮，一年省银一千三百余两。同时，发动百姓开垦荒田两千余顷，请减少马厂地数百顷；倡捐俸银购买堤地，安置十余村水灾居民；改驿站于城外，立义仓以备赈济，建书院以兴学造士，置学田以作保障；严保甲以弭盗贼，兴利除弊。《永城县志》评价其“允为时之良吏”^[6]卷十一。因政绩卓越，晋升为河南通判，于是废除苛征乱派，推行“一条鞭法”，官民两便，国赋日丰，各省纷纷效仿。不久，又擢升赵州知州，惜未到任而卒。今流传有詹景凤所绘、沈鲤等题跋的《宰永迹图》长卷，详细记载了左思明治理永城的种种事迹。这是厘清太丘书院创建时间的关键文献。

据《宰永迹图》所收左思明撰《新建太丘驿碑记》：

戊辰春，予膺简命来宰是邑，凡政有不便者，即欲改行更化以图善治。……期年后，则庶乎事颇就绪，民迨小康……然犹恐其有不虞之患，而况城内置驿，以速流行，城门锁钥，轻率阖辟，此不待有智之士，自知其不可也。乃于西门外街北得隙地一段，高平广阔，可事改迁，遂具由以请，咸是其义。然后卜日抡材，鳩工动众，景方位，略基址，为官厅三楹，退寝三楹，前后左右厢房各六楹。重门高耸，

囚禁深严，围墙完固。右为驿丞宅一所，居处听事诸室咸备。其规模恢宏，足称皇华之馆；堂宇壮丽，堪为驻节之地；视彼旧驿，奚啻倍蓰。是役也，经始落成，未逾载月，随时役取，不烦里甲，改作而工易毕，动众而民不扰。自是使命往来无迟留之患，城门暮夜无传呼之警。其旧驿遗址，则因而为分司、为义学、为义仓、为太丘书院，一举而众务集焉，亦便政也。

此文一方面梳理了其“戊辰春”即隆庆二年（1598）宰永城以来的治行，另一方面记载了太丘驿的修建过程。左思明于隆庆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永城知县，其迁驿站当是在序文所言的“期年后”，也就是隆庆三年六七月以后。又，此文末署“隆庆庚午冬至日”，即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十五日，与《新建太丘书院碑记》的落款“隆庆庚午仲冬望日”为同一天。而太丘驿的修建“经始落成，未逾载月”，从开工到落成不满一年，而据碑记文末题署，其落成的时间在隆庆四年十一月，则太丘驿与太丘书院的开工当在隆庆三年底或隆庆四年初。



《宰永迹图》中的“兴学校以造士”图

二、太丘书院的历史沿革

太丘，为永城的古称。东汉时，陈寔曾任太丘长，清静修德，百姓以安。其清静训道之地位于永城县治的东面，后改建为太丘驿。驿站点处城内要冲，传舍者昼夜不停，因此，城门不时启闭，不利于管理。明隆庆四年（1560），左思明奏请上官，将驿站迁至西门外。在驿站原址建设分司衙舍，左设义学，右置义仓。东偏有一块开阔之地，于是在中间筑讲堂三楹，两旁建书舍十余楹，名曰太丘书院。书院的创建可看作是左思明执政永城最为得意之处，他不仅把“兴学校以造士”置于《宰永迹图》长卷的第一部分，而且还亲自撰写了《新建太丘书院碑记》，详细记载了修建缘由、过程以及期望达到的效果。

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书院落成后，选拔儒学诸生中锐意进取者进入书院深造，太丘书院成为永城的最高学府。其实，左思明之所以要把义学和书院建在一起，是有他的考虑的。在他看来：“学

校者，贤士之关也，书院者，诸生之肆也。……书院密迹学宫，诸生以儒学为关，以书院为肆，出此入彼，相与藏修息游，朝经暮史，追琢文章，砥砺廉隅，勿庇于怠，勿夺于外诱，勿欲速以徼近功，吾见日就月将，学必底于大成。”^[3]左思明《新建太丘书院碑记》

左思明把县学看作是基础教育的承担者，而书院则承担起高等教育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琢磨经史文学，砥砺道德意气，或者以科举进入仕途，或者以文章垂美后世，最终博学古今，穷理蕴奥，能够学有所成。

为保障书院的正常运转，左思明还做了多方面的保障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丰其廩给”，即拨付学田和经费以保证书院师生的生活；其次，“正其科条”，即书院学规建设；第三，“时其考课”，即书院讲会、课士（考试）制度建设。惜无相关资料留存，已无法窥见书院运行的具体情况。《宰永迹图》中“兴学校以造士”图的题跋云：“本县嘉靖三十七年间，黄水冲城，庙学仅存，两庑俱颓，崇祀无依。而诸生抱歉者久之。公初至，复新葺之。每朔望必讲书，量给纸笔。又立为二十一日会，每会时，供饷廩。以故士风稍振。”这里记载的是县学的讲会情况：讲学定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而会文之期则在每月的二十一日。太丘书院的讲会或许与此相近。左思明兴学造士的种种举措促进了永城教育的发展。此后的万历年间永城中举人、进士者大量涌现，与太丘书院的兴办是分不开的。但大约到明天启（1621-1627）年间，太丘书院便衰败以至废弃了。

崇祯元年（1628），贺鼎调任永城知县。鼎，字公调，丹阳（今属江苏镇江）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官尉氏、永城、武康知县、兵部郎中、分守口北道参政。崇祯元年至四年（1628-1631）任永城知县。“鼎为人磊落有志节，与人交坦坦不设畦径，至临大事，则抵掌慷慨，意气殊甚。崇祯朝，大臣皆一切苟且自便，鼎独奋然欲有所为，不幸为小人所陷，识者惜之。鼎没后数年，上谷屯田岁益登，山泉灌溉，遂成腴壤。”^[7]卷十七因大同知府刘永祚构陷下狱，病卒京中，年四十七。崇祯二年（1629），鉴于太丘书院“岁久而圯”，便与县里有识之士商议重修书院，为课士攻读提供便利。于是在书院旧址上“扩而大之，东西二十武，南北五十武。门以北，东西各建五楹，北则讲堂五楹，东西各有廊，堂之北亦有廊。东西又各五楹，北则又堂五楹，藏书楼五楹，并祀陈公、左公像于中。”^[8]卷七，李荫岩《重

修太丘书院记》书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仅修建了讲堂、号舍、藏书楼、廊庑等功能性建筑，而且应该还修建了祠堂等祭祀性建筑，并入祀陈寔及左思明。此次重修使书院建筑更完善，布局也较以前更加宏阔。

崇祯时期，太丘书院的招生政策相对开放，除了招收永城籍生徒，周边县区颖秀且通过考试者亦可入学。书院还建立了严格的讲会课士制度，即“月试而日省之”^{〔8〕}卷七，李荫岩《重修太丘书院记》，日有讲课诵读，月有会文考试。相对应的，书院所获得的科试名额较其他县更多一些。永城科试名额的增加，一者得益于此时的永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二者因为河南提学使潘曾纮颇器重知县贺鼎，故贺鼎所识拔之士多能高中。一时书院之盛况，进士李荫岩曾盛赞其与郑三俊所创办的文正书院后先辉映。明末，永城遭遇兵火，城中巨室之家焚毁殆尽，但书院巍然独存，也是一件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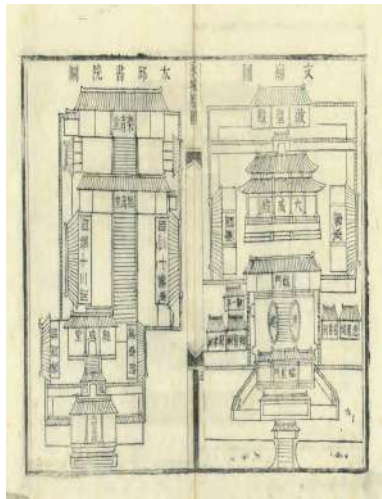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1744），永城新设县丞一职，太丘书院被借作县丞衙署，书院遂废。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县周梦龙将太丘书院移建于文庙和儒学之间，诸生才又有了学习场所。但重建后的书院规制狭隘，科试时，只能借用县衙大堂和吏胥之室入场接卷，而参加考试者则需自带桌凳才能进行考试。吏民皆感繁重累赘，苦不堪言。周梦龙，字文征，号云槎，直隶清苑（今河北清苑县）人，监生。乾隆十七年（1752）选授贵州石阡府经历，调任南笼，兼署册亨州同。乾隆二十六年（1761），升河南柘城知县，赈济水灾。未几，调兰阳县，兴修黄河险工。同年，调永城。乾隆三十一年（1766），复任永城知县。梦龙“政治明敏，以培植文教为己任”^{〔9〕}卷十一，不仅移建太丘书院于县学东，还在芒山脚下创办了芒山书院，对清代永城书院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太丘书院得到复建，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光绪元年（1875），知县汪赓才与永城学者吕永辉对书院进行了改扩建，重修讲堂三间，增建号舍十八间，达到三百四十二间。又修建了大门、二门各一座，两门间又建斋房三间，厨房一座。前令陈梦莲与邑绅吕履泰又捐资购置了桌凳，士子免除了负累之苦，书院因而焕然一新。汪赓才，字小瀛，浙江山阴人，监生。同治十三年（1874）来任永城知县，雅重文教，重修太丘书院

讲堂、名宦、乡贤、忠义、节孝等祠，始创永城考棚，虽未完备而离任，但筚路蓝缕之功常为人乐道。陈梦莲，字碧珊，湖北黄梅人，监生，同治四年（1865）、七年（1868）两任永城知县。当捻军乱后，豫东地区田地荒芜，梦莲设法赈济灾民，开辟荒田，招集流亡，百姓得以安居。他又筹资重修文庙，大兴文教。吕履泰（1820-1877）字调阳，一字君舒，晚号耐菴，永城人。咸丰初，首倡团练，荐举县丞，不应。捐资修补太丘书院及名宦乡贤祠，念士子考试辛苦，捐置桌凳。补葺家祠，经营族务，不遗余力。重刊吕坤《小儿语》《综约歌》等，以劝学者，以光家学。撰《怀清堂诗文集》，辑《性理辑要》《文庙从祀录》等。吕永辉（1840-1911），字伯光，号扉青，永城人，履泰子。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累官四川冕宁、奉节知县，以军功擢同知，再升知府，议叙道员，加二品衔、四品卿衔。擅诗文，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尤喜兴学造士。任冕宁，修学舍；在奉节，创修少陵书院；告归后，重修太丘书院、芒山书院；晚年，受聘开封，创修明道书院。又创设吕氏家塾，以训教族人。一生著述宏富，编纂《明道书院志》《永城县志》《中州学案》《国朝近思录》《三大统录》《名言汇鉴》《保甲团练章程》，著《志学录》《笃实堂文集》《四喜楼诗稿》《扉青诗钞》《吕氏家规》《迎銮集》等。

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永城每年参加童子试的人数不下一千二三百人，光绪初年扩建后的号舍已难以容纳。科试时只得借坐于县学大成殿以及两庑中，嘈杂秽溺，人满为患。鉴于此，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知县沈传义遂与教谕孔广阶、训导胡赞采、邑绅吕永辉等人商议，决定再次扩建书院。他率先捐俸助建，士绅亦争先恐后乐于捐赠。于是分工协作，各司其责——孔广阶、胡赞采、吕永辉任督修，署新郑教谕杨毓芳、候选训导刘敬斋、李伯海、岁贡黄永脉、监生蔡学泗、廪生张价、附生吕遐潏、举人蔡荫兰、丁其恂任监修，买材选料，很快便相地开工了。首先将训导宅移至明伦堂后，在原址上建后堂五间作为讲堂，匾曰乐青堂，东西各建斋房三间以作居舍，并建厨房、茶炉各一间。建中堂五间，匾曰延茂堂，其东西又建号舍各十三间，砌石为桌，斫木为凳，以作为校文课艺之场。前院一仍其旧，前堂三间，仍匾曰观成堂，东西仍为号舍。这样，书院的号舍达到了874间。又增建

龙门一座，作为点名之处。改建了大门三间、照壁一座，较前更加宽大壮阔。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整个书院建筑基本完工，从光绪《永城县志》收入太丘书院图来看，整个书院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前两进院主要作为考课之用，第三进院则主要用于讲学，整个书院布局严谨，规模宏大。



《[光绪]永城县志》中的太丘书院图

扩修书院还未完工，知县沈传义却调任祥符县，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亲撰《光绪年扩修太邱书院碑记》^[6]卷六一文，详细记载了这次扩建的情况，这篇碑记是了解清末太丘书院发展的重要文献。沈传义，字次端，大兴籍浙江会稽人，监生。光绪十八年及二十一年曾两任永城知县，兴学校，勤缉捕，清保甲，练民团，浚沟渠，兴利除弊。尤其是“大修书院，广置号舍，士民建生祠祀焉”^[6]卷十一，在太丘书院发展史上留下了最后辉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实行西方学堂教育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又下令废除科举制。唐宋以来形成的科举取士、书院育才为相互依托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就此结束，古代书院的使命也走向了终结。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永城县署在太丘书院原址上创办中学堂，学生2班共35名，校长为丁其恂，教职员共五人。至中华民国五年（1916），共毕业学生157人，因学生不足而停办。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在太丘书院中又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学生分一、三年级两班共26名，校长为李伯海，教员为杨士彦。^[9]⁶⁹至此，太丘书院完成了近代转型。

三、太丘书院的学田

学田是中国古代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书院学田往往以货币地租的形式补充到学校经费中，到了

清末也有些书院以银行利息作为书院经费。而书院学田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者官府划拨，一者私人捐赠。

太丘书院的学田在隆庆四年左丘明创办时或已设立，其《新建太丘书院碑记》云“丰其廩给”，《[乾隆]续耀州志》卷六亦云“（左思明）垦荒田二千余顷，申归厂地数百顷。……置学田，建书院”，表明太丘书院创建之初已有一定规模的学田。惜无详细资料，难以知其确切数字。

崇祯二年，贺鼎重修太丘书院，扩建了规模，完善了设施，官拨学田的传统应有延续，惜无记载保存下来。而私人捐赠方面则有记载，永城庠生李支奕得悉贺鼎重建书院以课士，而苦于供用不给，遂慨然捐出位于马牧集的四百五十亩田及庄园一处，以每年所收粟米及田租作为书院公费。为表扬其善举，知县赠其“义隆千古”牌匾一块。

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太丘书院的地亩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一者来源于士绅的捐赠，再者来源于官府拨付的罚没之地。如同治年间，吕履泰捐城西七里桥地100亩，租钱20000文。监生吕永熙捐城西七里桥地50亩，租钱8000文。同治七年（1868），窦金声捐双桥集北邢庄地100亩，租钱20000文。又查出刘兴店旧捐集宅一位，计15亩地，租钱14793文。同治八年（1869），知县陈梦莲捐买刘怀邦顺河村地30.7亩，租钱16938文。充入匪首赵浩然城北赵庄埠地198亩，租钱112000文。又充入匪首赵有志浚河南岸赵楼地67亩，租钱20265文。充入李广来隐粮地50亩，坐落于新桥集东北，租钱20000文。又赎入千佛阁僧人当出的庙地23亩，租钱16000文。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陈梦莲捐买王景禹地20亩，坐落于白庙集，租钱10000文。又捐买彭振林地16.6亩，位于白马桥，租钱6656文。同治年间士绅共捐地共355.3亩，租钱152265文。官府罚没拨付之地共315亩，租钱112387文。

附同治年间太丘书院地亩、租钱一览表：

时间	人物	位置	方式	数量 (顷)	租钱 (文)
同治初年	吕履泰	城西七里桥	捐赠	100	20000
同治初年	吕永熙	城西七里桥	捐赠	50	8000
同治七年	窦金声	双桥集北邢庄	捐赠	100	20000
同治七年	旧捐	刘兴店	查出旧捐集宅一位	15	14793
同治八年	陈梦莲	顺河村	捐买刘怀邦	30.7	16938

同治八年	赵浩然	城北赵庄埠	充公	198	112000
同治八年	赵有志	浚河南岸赵楼	充公	67	20265
同治八年	李广来	新桥集东北	隐粮地, 充公	50	20000
同治八年	僧人	千佛阁庙地	赎买	23	16000
同治十一年	陈梦莲	白庙集	捐买王景禹	20	10000
同治十一年	陈梦莲	马桥	捐买彭振林	16.6	6656
合计				670.3	264652

光绪元年(1875), 定兴村捐地 6.3 亩, 租钱 1443 文。乔振江捐地 1.5 亩, 坐落于东湖林店, 租钱 1250 文。光绪十年(1884), 查出武举赵象枢旧捐地 120 亩, 位于落马村桥南陈庄, 租钱 14400 文。光绪十六年(1890), 查出郝姓旧捐地 24 亩, 位于白马桥, 租钱 2300 文。光绪十九年(1893), 知县沈传义捐赎芒山均庆寺和尚楼僧空远当出地 250 亩, 租钱 125000 文。断罚监生刘继贤捐地 8 亩, 坐落于柘树集西, 租钱 4000 文。光绪二十年(1894), 学使批断虞山王庙拨充地 160 亩, 租钱 106000 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 充入回头寺窝贼庙地 148.3 亩, 租钱 50150 文。又充入白杨阁三官庙旧入回头寺地 24.44 亩, 租钱 14640 文。光绪二十五年(1899), 知县韩国钧捐赎窦长地 17 亩, 租钱 23800 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 洪福寺庙主胡华山捐地 122.2 亩。光绪年间, 永城士绅捐地共 541 亩, 租钱 168193 文。官府罚没充公之地共 340.74 亩, 租钱 228790 文。附光绪年间太丘书院地亩、租钱一览表:

时间	人物	位置	方式	数量(亩)	租钱(文)
光绪元年	定兴村	定兴村	捐赠	6.3	1443
光绪元年	乔振江	东湖林店	捐赠	1.5	1250
光绪十年	赵象枢	落马村桥南陈庄	查出旧捐	120	14400
光绪十六年	郝姓人	白马桥	查出旧捐	24	2300
光绪十九年	沈传义	芒山均庆寺和尚楼	捐赎僧空远当出	250	125000
光绪十九年	刘继贤	柘树集西	断罚旧捐	8	4000
光绪二十年	学使	虞山王庙	批断拨充	160	160000
光绪二十三年	回头寺	回头寺	充公拨给	148.3	50150

光绪二十三年	白杨阁三官庙	旧入回头寺	充公拨给	24.44	14640
光绪二十五年	韩国钧	窦长	捐赎	17	23800
光绪二十七年	胡华山	洪福寺	庙主捐赠	122.2	未载
合计				881.74	396983

地亩(即学田)所得租钱是太丘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 主要用于如山长和教职工的薪水, 生徒的膏火费、书院祭祀费用、购买图书费以及基础设施维修费和其他日常开支。这些支出可反映出书院管理者与就学者的经济待遇和教学活动在总体经费中的比例, 以此来了解书院运行状况。可惜太丘书院没有留下经费使用的记载, 今天已无法细致了解它的运行情况了。

三、太丘书院的藏书

藏书活动与书院发展密切相关, 藏书是书院的基本功能之一, 也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功能完备的教育机构的重要体现。书院以藏书为基础, 开展教书、读书与著述等一系列与书相关的活动, 从而促进书院教学的发展与学术的繁荣。太丘书院藏书丰富, 从李荫岩的记载可知, 至迟在崇祯二年贺鼎重修书院时, 太丘书院已建有藏书楼, 它大约与现代大学的图书馆相近。

据《[光绪]永城县志》卷二十六所载《太邱书院存书目录》, 太丘书院在清末藏书达 77 种数千册。作为一座县级书院, 这个藏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大量的藏书为书院的教学与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些藏书的来源并不广泛, 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书院购买。购书经费的来源一般有两种, 要么是书院自有经费, 主要是学田、捐赠所得; 要么是官府拨款。如“大板廿四史”有一百零二套, 是知县岳廷楷捐购, 花费银一百二十八两, 似即岳廷楷拨款所购买。廷楷, 字揆章, 山东利津人, 廩贡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 由延津知县调补永城。修县志, 整学校, 为清末永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购买的图书有 53 种, 花费 300.85 两银子, 约有 1400 册(轴)。另外还有几种未载册数的大部头, 如: “九通”、《大清会典》等。第二是私人捐赠。太丘书院是永城境内最高学府, 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其发展受到了永城各界的支持, 捐赠图书也是当地士绅支持书院发展的方式之一。为书院捐赠最多的是永城吕氏家族,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清末学者吕永辉。

吕永辉的读书堂号是“笃实堂”，《太邱书院存书目录》中所载“吕笃实堂捐”即指吕永辉捐赠。吕永辉一生用心儒学，热心书院教育，曾积极参与重修永城的书院，晚年又主持修建开封明道书院。他为太丘书院捐赠图书达二十种约在二百五十余册。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一年（1895）两任永城知县的沈传义曾主持扩建太丘书院，并捐赠了画图、对联三种。中国历史上书院的藏书来源还有皇帝赐书、书院自己刊刻书籍两种方式，可以确定太丘书院的藏书没有皇帝赐书，但是否有自己刊刻的书籍尚难确定。从清末《太邱书院存书目录》来看，并未记载有自刻书籍。

从藏书的内容看，太丘书院的藏书具有两个特点：首先，藏书与教学、学术研究紧密相关。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宗旨大多以“传道”“明道”为主，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创办书院的目的，一则用儒家文化改造自身、完善道德，即修身齐家；一则用儒家文化理想改造社会，即治国平天下。太丘书院的藏书多儒家经典、理学著作，即与这种办学宗旨相关。而这些书籍多由吕永辉捐赠。永辉一生“以敬修己，以仁持家，以义莅政，以道卫天下”，^[10]卷七《自撰墓志铭》，面对清末世风日下、丧权辱国的形势，力图以儒学挽世风、卫天下，书院教育成为其改良社会的重要方式，而儒家经典、理学著作正是书院教学、士子诵读的主要凭借。其次，藏书内容与社会变迁联系紧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书籍不仅成为书院藏书内容的新成分，同时也体现了“西学东渐”及其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太丘书院虽然地处内陆，但也收藏了不少“新学”书籍，如《中外政治策论汇编》《各国政治艺学全书》以及《绫边地球图》《五大洲全图》等，这也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

为了解太丘书院藏书数量和种类，根据《太邱书院存书目录》载，将藏书书目及来源附录如下：

序号	书名	数量	来源	价格	备注
1	钦定周易折中	十六本	吕永辉捐		注：七经皆吕笃实堂捐
2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	十六本	吕永辉捐		
3	钦定诗经传说	二十四本	吕永辉捐		

4	钦定礼记义疏	五十六本	吕永辉捐		
5	钦定春秋传说	二十四本	吕永辉捐		
6	钦定周官义疏		吕永辉捐		上海图书馆藏同治本 24 册
7	钦定仪礼义疏		吕永辉捐		上海图书馆藏同治本 28 册
8	大板廿四史	一百零二套	岳廷楷捐赠	银一百二十八两	知县
9	御批通鑑辑览大板	六十本	购买	银十六两	
10	先正事略	十二本	购买	银一两二钱	
11	三通考辑要	三十本	购买	银九两二钱	
12	九通	全部	购买	银三十六两四钱	
13	中外政治策论汇编	二十四本	购买	银四两六钱	
14	各国政治艺学全书	三十二本	购买	银六两	
15	皇朝輿地略	二本	吕永辉捐		
16	天下郡国利病书	六十四本	购买	银八两	八函
17	皇朝经世文编	二十四本	吕永辉捐		
18	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新编	六十二本	购买	银六两四钱	
19	万国易知录	六本	购买	银九钱	
20	历代史论	七本	购买	银九钱	
21	历代史略	六本	购买	银九钱	
22	十一朝东华录	八十八本	购买	银九两二钱	
23	正宜堂全书	一百六十本	购买	银二十九两	
24	石印大学衍义	一部	购买	银一两三钱	
25	历代名臣奏议	一部	购买	银一两五钱	
26	圣武记	一部	购买	银一两四钱	
27	东莱博议	四本	购买	银三钱	
28	大清会典	六函	购买	银一两三钱	
29	名臣言行录	十二本	购买	银一两五钱	
30	大板康熙字典	四十本	购买	银一两二钱	
31	大板百子全书	全部	购买	银二十两	国家图书馆藏本 80 册
32	说文	十六本	购买	银二两五钱	
33	汉魏丛书	八十本	购买	银六两四钱	
34	数理精蕴	二函	购买	银二两八钱	国家图书馆藏本 40 册

35	中西算学大成	四套	购买	银四两五钱	上海图书馆藏本每套10册
36	梅氏丛书	二十四本	购买	银八两二钱	
37	算学启蒙	四本	购买	银一两	
38	笔算	三本		二钱	
39	谈天	六本	购买	银一两五钱	
40	吾学录	六本	购买	银一两五钱	
41	古文渊鉴	三十二本	购买	银九两	
42	唐宋文醅	二十四本	购买	银二十四两	
43	古文辞类纂	十二本	购买	银一两二钱	
44	昭明文选	十六本	购买	银一两二钱	
45	国朝文录	一部	购买	银十八两	国家图书馆藏本30册
46	四种遗规	六本	购买	银三钱五分	
47	文心雕龙	四本	购买	银二钱	
48	武侯全集	十本	购买	银一两二钱	
49	胡文忠公集		购买	银五两	
50	汤子遗书	三十二本	购买	银三两五钱	
51	陆宣公奏议	一部	购买	银一两五钱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4册
52	欧阳文忠公集	三十二本	购买	银四两二钱	
53	朱子全书	四十本	购买	银八两四钱	
54	孙夏峰全书	二十套	购买	银七两二钱	上海图书馆藏康熙本6册
55	曾文正全集	一百二十本	购买	银十二两	
56	明儒学案	一部	购买	银一两二钱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16册
57	性理精蕴	一部	购买	银二两	
58	理学宗传	四函	购买	银四两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12册
59	石印海国图志	一部	购买	银三两四钱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16册
60	农政全书	一部	购买	银一两三钱	上海图书馆藏光绪本16册
61	经纬地球图	一轴	购买	银三两八钱	
62	五大洲全图	一轴	购买	银一两八钱	
63	幼菴兰花	一轴	购买	银一两五钱	
63	松鹤图	一轴	沈传义捐存		知县

65	硃红对	一付	沈传义捐存		
66	印扇面屏	四张	沈传义捐存		
67	圣谕广训直解	二本	吕永辉捐		
68	近思录	四本	吕永辉捐		
69	广近思录	二本	吕永辉捐		
70	国朝先正学规	二本	吕永辉捐		
71	小学集解	四本	吕永辉捐		
72	吕司寇公实政录	六本	吕永辉捐		
73	吕司寇公去伪斋集	十本	吕永辉捐		
74	呻吟语	六本	吕永辉捐		
75	明道书院志	二本	吕永辉捐		
76	杞县节孝录	一本	吕永辉捐		
77	名言汇鉴	二本	吕永辉捐		

参考文献:

- [1] 卢玺媛. 明代中州书院文化研究 [D]. 郑州大学, 2019.
- [2] 葛玉山. 太丘书院 [N]. 今日永城. 2015年10月01日 (A4).
- [3] 溪翁. 詹景凤绘宰永迹图 [M].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3.
- [4] [清] 田文镜等修; [清] 孙灏等纂. [雍正] 河南通志. 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据清乾隆间 (1736-1795) 刻版重修刻本.
- [5] [清] 汪灏修; [清] 钟研斋纂. [乾隆] 续耀州志. 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刊本.
- [6] [清] 岳廷恺修; [清] 胡赞采, 吕永辉纂. [光绪] 永城县志. 光绪二十七-二十九年 (1901-1903) 年刻本.
- [7] [清] 刘诰修; [清] 徐锡麟纂. [光绪] 重修丹阳县志. 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刻本.
- [8] [清] 周正纪纂; [清] 侯良弼修. [康熙] 永城县志. 清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刻本.
- [9] 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 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清代部分) [M]. 河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 1983. 10.
- [10] [清] 吕永辉. 笃实堂文集.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大梁明道书院刻本.

(作者简介: 刘万华, 男,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 学术论坛 ●

佛教在宋代的发展与儒佛会通的宗教实践

——以禅宗和天台宗为例

□ 高建立



两宋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以禅宗独领风骚。正如魏道儒先生所说：“当佛教义学诸派趋于衰落的时候，当有些派别已经湮没无闻的时候，唯有禅宗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甚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宗的价值，就在这种强烈的反差现象中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示出来了。这种发人深思的反差现象，在唐末五代初露端倪，在宋代就十分突出了，并且基本成为定局。”对禅宗在宋代的发展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天台宗是中国典型的大乘佛教宗派，在宋代影响亦大。故以禅宗和天台二宗派为代表，讨论宋代佛教发展之大略。

一、禅宗在宋代的发展

中唐以后，禅宗在佛教各宗派中发展最快，晚唐五代时期发展为“五家”，入宋以后又发展出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两个支派。尽管这两个支派在禅宗教义上并没有大的突破性发展，但由于这两个支派形成于宋代，所以，他们可以作为禅宗在宋代发展的代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那就是中唐到五代时期，禅宗形成“五家”，到宋代，“五家”之一的临济宗成为禅宗的代表，以至于到元明时期有“天下七分临济，三分曹洞”之说。

脉出临济宗的杨岐一派，其代表人物是方会（992—1049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因为他首住杨岐，所以禅宗史上就称他为“杨岐方会”。《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八记载，说他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移住潭州云盖山”，而未载明他的生卒年。《古尊宿语录》卷十九收入的僧人文政作于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的《潭州云盖山会和尚语录序》里，说方会卒于云盖山，“俗龄五十四”。但未说明卒于何年。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记载方会卒于宋仁宗“丙戌”年，即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却又未说明他岁数多大。把文政和念常两家的记载合起来看，方会的生卒年当为宋太宗淳化三年至宋仁宗庆历六年，即公元992年至1046年。

方会主张“心”学，认为“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认为“心”是世界的“最灵物”，它既是成佛的根基，又是世界的本原。主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世界上的一切皆由那颗最灵的“心”派生，都以那颗“最灵”的心为它们的最高实体。所以，举“一尘”就“大地全收”，这就是佛经里说的“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之意。“一微尘”，“一毫端”，算是事物的最小者了，但是，就在这至小的“微尘”、“毫端”里，却可以“收”尽“大地”，“现”出“佛国”（“宝王刹”，即佛国），原因就在于“大地”、“佛国”，与“微尘”、“毫端”同是“最灵”的心的派生物，同是以这颗“最灵”的心为本体。所以，它们可以大小相即，一即一切！

方会非常看重世俗权利，主张佛家弟子不但要出世，而且还要学会入世，只有与世俗权力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弘扬佛法。从他升座拈香的祷语可以看出他积极入世的心态，他说：“此一瓣香，祝

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此一瓣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显然可见，在方会心中，世俗社会的官阶禄位是多么的重要！

杨歧一派，除方会外，较有影响的是方会的再传弟子法演，法演的弟子克勤，以及克勤的弟子宗杲。

法演，俗姓邓，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人。因他较长时间在蕲州（今湖北蕲春）五祖山“开堂”说法，所以禅宗史上就称他为“五祖法演”。法演“绍先圣之遗踪，称提祖令，为后学之模范，建立宗风”，深受后人称赞。法演的生年不详，死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活了80多岁。

在世界观上，法演认为：“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雕。”“万象主”是指世界万物的本原，同时又是先天地生的“无形”、“寂寥”的精神实体，也就是佛家的真如、佛性之类的东西。

法演虽然认为天地万物源于真如、佛性，但他更关心的还是世俗的现实社会。和他的先师一样，他的政治态度也明显表现出对世俗王权的拥护，如他“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先为今上皇帝，伏愿常居凤宸，永镇龙楼。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州县官僚，伏愿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长为外护纪纲”。法演“升座拈香”，第一祝愿“今上皇帝”永坐龙廷，第二祝愿“州县官僚”“永作生民父母”。在端午节升座时，他也要祷告一番说：“一要今上皇帝、太皇太后，圣躬万岁，二要合朝卿相、文武百官，州县采察，常居禄位，三要万民乐业，雨顺风调”。过端午节上堂闭口不谈“佛法”，而是祈祷皇帝、太后、合朝卿相，其入世样态刻画得可谓淋漓尽致。更有甚者，把封建皇帝当做头戴冠冕的“诸佛”，封建官吏当作身着官服的“祖师”。而高居佛国的“诸佛”，自然就是身披袈裟的皇帝，历代“祖师”，自然也是身着僧装的封建官吏。皇帝与“诸佛”，“祖师”与官吏，真可说是互为表里。

克勤（1063—1153年），字无著，俗姓骆，彭州崇宁（今属四川）人。出家后，先于成都等地学经、问法，不久离川东下，拜于法演门下。宋徽宗崇宁初，回蜀，住持昭觉寺。后又谢职去荆州，见丞相张商英，谈论《华严》教义，被张誉为“僧中管仲”。宣和中诏住京都天宁寺，徽宗赐号“圆悟禅师”。后又返蜀，仍住昭觉寺。绍兴五年（公

元1135年）八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著有《碧岩录》（十卷）、《击节录》（二卷）。

由于《碧岩录》问世，遂使克勤成为影响较大的一代名僧。

《碧岩录》结构非常独特，它是以一百则“公案”为骨架，每则“公案”分三段：先举“公案”，并加叙述，这可称之为“前言”或“序论”，再引重显颂文，这就是重显的“颂古”，然后便是克勤的释文。克勤在认识上主张“世谛、佛法……平等一如，湛然真纯”。所谓“世谛”，就是指的现象世界，而“佛法”则是指彼岸世界即本体。由于大千世界是以真如为本体，因而宇宙万有都是真如妙境，都是真如派生的，真如是世界的本原。

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宣州宁国（今安徽宣城）人。十三岁时入乡校读书，不久弃学，十七岁出家，当年受具足戒。丞相张商英曾题其所居庵为“妙喜”，因而自称妙喜。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克勤奉旨住持京都天宁寺，宗杲便进京从克勤学禅。后宗杲赴吴，暂住虎丘。这时，克勤已迁住江西云居，宗杲又到云居，充任“首座”。此后，辗转“湖湘”，历游“七闽”，终于在临安径山“开法”，极力倡导克勤禅法。孝宗即位，赐号“大慧禅师”。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八月十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宗杲是一位禅僧，他认为他的老师克勤的《碧岩录》，有悖于禅宗的“直指”精神，所以就毫不留情地“火其书”，另一方面却又编集《正法眼藏》六卷以补救禅宗弊病。

宗杲除编撰了《正法眼藏》之外，在宗教实践上，他大力倡导“看话禅”。所谓“看话禅”，就是要拿一个问题作为话头来进行内省式的参究。这种话头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对话头作解释；二是看话头是长期的实践过程，要贯彻在禅僧生活的全过程；三是看话头的目的是获得“大悟”。宗杲看话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求把话头作为“活句”而非“死句”来看待。宗杲认为，只有活句才具有启悟的功能。也正因此，“看话禅”使得禅宗距离六祖慧能禅宗的本义越来越远。

黄龙派是临济宗的一个支派，和杨歧并称，但影响不及杨歧派。该派的创始人是慧南。慧南（1002—1069年），俗姓章，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人，“生而神异，童稚不群，道蕴夙机，

发言骇众”，十七岁出家，十九岁落发受具足戒，“遍历丛林，皆推上首”。世称“黄龙慧南禅师”。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慧南坐化。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赐谥普觉，故后人亦称其为普觉禅师。慧南的言论后被收入《黄龙慧南禅师语录》和《黄龙慧南禅师语录续补》。

在宇宙观上，慧南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由神妙的“真如”派生的，本身即是“真如”。慧南的禅法也引入了体用关系，讲究“触事而真”，如说：“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这话原来出自僧肇，在此有“立处皆真”之意，与临济宗相沟通。慧南还认为，众生皆有佛性，要求“行脚人当自开眼，勿使后悔”。所谓“自开眼”，意思是指关照内心，勿需外求，众生应该自证自度，求得自我解脱。慧南的佛性论远承马祖道一，也讲所谓的“自家宝藏”，如说：“汝等诸人，各有自家宝藏，为什么不得其用？只为不回头”。这个自家宝藏就是众生心中的本有佛性，“人人尽握灵蛇之珠，各个自抱荆山之璞。不自回光返照，怀宝迷邦”。慧南还批评当时禅风日下，说：“古人求道求内心，求得心空道自亲。今人求道外求声，寻声逐色转劳神。劳神复劳神，颠倒何纷纷？”针对当时兴起的文字禅提出了批评。

在修行方法上，慧南讲无修，主张以无修为修，说：“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心息，故心心无虑；不修，故步步道场。”不修就是指内心不起修行之念，不执著于任何一种对象，以无念之心看万物，这样处处即可为道场。

克文（1025—1102年），俗姓郑，陕府阌乡（今属河南灵宝）人。由于不堪继母虐待而出走，游学四方，出家为僧，“即游京洛，翱翔讲肆，贤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经论，咸造其微”。后又弃教、习禅，终得法于黄龙慧南。元丰（公元1078—1085年）末，克文东游，到钟山（今属江苏南京）拜谒宰相王安石，与当时知名士大夫交往密切。王安石以为克文“独受正传，力排戏论”，便舍第宅为报宁寺，延请克文为住持，还为克文“岁度僧，买庄土，以供学者”。朝廷也曾颁赐紫方袍，并赐“真净大师”之号。绍圣（公元1094—1099年）初，御史黄庆基为南康太守，迎克文住持归宗寺。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张商英出镇洪州（今江西南昌），谒克文于归宗净名庵。次年，又迎居石门。徽宗崇

宁元年（公元1102年）圆寂，享年七十八岁。

与慧南相比，克文的思想资料比较多。收入《古尊宿语录》（卷四二—一四五）里的克文《语录》主要有《宝峰云庵真净禅师住筠州圣寿语录一》《住洞山语录》《宝峰云庵真净禅师住金陵报宁寺语录二》《住庐山归宗语录》《住宝峰禅院语录》等。

在世界观上，克文主张“真如缘起”。他说：“目前森罗万象……同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指“真如”、“法性”、“佛性”等，由于“一真法界”是宇宙的本原，宇宙万有都是由它派生的，所以“森罗万象”本身就是“一真法界”。

克文还主张“人人有个真天佛”：“僧俗男女平等心，一一皆同证法界。”；“法界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也”。在克文看来，“无情”世界的“森罗万象”都是由“一真法界”派生的，“有情”世界的“僧俗男女”、“一切众生”，也都是由“一真法界”派生的，因此说：“法法本然，心心本佛，官也私也，僧也俗也，智也愚也，凡也圣也，天也地也，悟则事同一家，迷乃万别千差。”无论官私、僧俗、智愚、圣凡，一切皆以“一真法界”为“本体”。由于“一真法界”充塞宇宙，遍于一切，所以“举足下足，无非道场。”还说：“一切法即诸佛法，一切心即诸佛心。”无论“此土他界，天堂地狱，六凡四圣，情与无情，同一无异。”由于一切皆以“一真法界”为本体，所以就能“事事无碍，如意自在”。

虽然杨歧与黄龙两支，与禅宗“五家”并称为禅家两宗——“五家七宗”，但是，他们远不象“五家”那样，有各自的思想特点和风格，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承继前人余绪，陈陈相因。尽管宋代禅宗编订大量的《灯录》、《语录》，但都没有比较新的内容，更没有可以自成体系的思想，然而它却给世俗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深刻影响了两宋士林和世俗社会生活风气。

二、宋代天台宗的发展

天台宗在宋代也有一定发展，虽然不及禅宗影响深远，但宗派中有一些僧人在宋代却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晤恩、知礼、遵式及“山外”智圆等。

宋代天台宗的重要传人是晤恩（公元911—986年），字修己，姑苏（今江苏苏州）常熟人。生于五代十国时后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俗姓路。十三岁出家。后唐长兴年间受具足戒，住昆

山（今江苏江都）慧聚寺学《南山律》。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从释皓端学经论。后到钱塘（今浙江杭川）慈光院从释志因受学，“讲贯弥年，通达《法华》，《光明》经，《止观》论，咸洞玄微”。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圆寂，享年75岁。著有《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等，特别是他的《金光明玄义发挥记》引起了天台宗的所谓“山家”、“山外”之争，对天台宗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也正因此书，使得悟恩成为天台史上标新立异、影响独特的人物，对天台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悟恩学行并重，一生弘扬天台教观，“寻绎十妙之始终，研核五重之旨趣”，讲《大玄义》《文句》《止观庐》20余遍。他“剖析幽旨，时称义虎”。宋《高僧传》卷七说：“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由此可见其对弘传天台教观所起的重要作用。

悟恩既是理论家，也是宗教实践者。他严持戒律，规范行为，过午不食，衣钵不离，“不蓄财宝，卧必右肋，坐必加趺……立制严峻，日别亲视明相，方许净入施粥”。他交游严谨，不好谈论俗事，俨然大德之象。

知礼（公元960—1028年），字约言，是宋代天台宗的义学高僧，俗姓金，四明（今浙江鄞县）人，七岁时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专研律部。二十岁跟随义通学天台教观。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义通圆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受请住四明祥符寺，在那里开坛讲经，学徒云集。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以后，专门从事讲经、修忏。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创设念佛施戒会，汇集僧俗男女一万人，同修念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圆寂，享年六十九岁。

知礼是天台宗的“继往开来”者，天台宗人尊其为第十七祖，一般称为四明尊者。知礼的著作有《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金光明经文句记》十二卷、《观音经玄义记》、《观音经义疏记》各四卷及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四明宗晓所编《四明尊者教行录》七卷等。

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即起于知礼时代。知礼一派自认为是天台一宗的正统，以“山家”自称；而把和他们见解不同的悟恩、洪敏、源清、天昭、

智圆一派称为“山外”。知礼极力发挥智顛、湛然的宗义，其要点是“别理随缘”说，认为真如缘起的涵义，别、圆二教所说不同。别教所说的真如，超然在差别的事相之外，就是和事相隔别的理体，所以称为“别理”；圆教则认为真如理中本来就具有差别的事相，事理相即熔融。其随缘而作一切诸法，乃是举体随缘，举体不变，即不变而随缘，即随缘而不变，所以称为“理具随缘”，如《指要钞》说：“他宗明一理随缘作差别法，差别是无明之相，淳一是真如之相，随缘时则有差别，不随缘时则无差别；故知一性与无明和合方有差别，正是合义，非体不二，以除无明无差别故……应知不谈理具，单说真如随缘，仍是离义”。

知礼还认为，“无情说法之言，其来尚矣。的论其要，难得其旨。汝问以清净法性、草木瓦砾立二法也。当知法性之外，无别瓦木，瓦木之外，无别法性，二非二也。故《华严》曰：‘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山河及国土，三世悉在无有余，亦无形相而可得。’此道若论有相，充塞太虚，包含法界，若论无相，一法不留，见闻不住，卷舒自在，体露堂堂。昔南阳（慧）忠国师答学者，以墙壁瓦砾为古佛心，不异此旨”。由于宇宙万有本身都是真如、法性，所以“法性之外，无别瓦木；瓦木之外，无别法性”，法性就是瓦木，瓦木即是法性。可见知礼完全承继了湛然的“无情有性”论观点。

遵式（964—1032年），亦为山家派中心人物，其“五世法孙”慧观曾将他的若干篇杂著分别编辑为《金园集》和《天竺别集》各三卷。

遵式在世界观上是一个“真如缘起”论者，他说“法性清净，权实虚融……‘权’谓诸法，即是百界、三千；实即诸法咸中，无非实相”，“天台谈十界，生、佛互融，若实若权，同居一念。一念无念，即‘了因佛性’；具一切法，即‘缘因佛性’；非空非有，即‘真因佛性’。是即一念生发，即空、假、中”。《法华经》里所谓的“权”、“实”，也就是“权便”的意思，“实”指“一乘”，表示彻底、究竟，也就是最真“实”的意思。遵式以诸法来解释“权”，以中道、实相来解释“实”，则“权”指缘起诸法，“实”指“清净”的“法性”，也就是真如、佛性。“诸法咸中，无非实相”，也就是“言理性，则一念性体，万法顿圆，百界色心，无毫厘而不具”，表明宇宙万有都是“清净法性”的派生物。正因为包括主客

体在内的“诸法”都是由“法性”、“理性”派生的，“一念性体，万法顿圆”，所以“诸法”本身都是“中道”、“实相”。

在“佛性”论上，遵式主张“圆谈十界，生佛互融”，因为“十界”、“生佛”之所以能够“互融”，正是因为他们同具一“佛性”，由“佛性”而有“十界”、“生佛”。

在解脱论上，遵式强调“究心”、“了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凡有“心”者，都有“性”。既有心、性，就可“究心”、“了性”；而一旦能够“究心”、“了性”，也就可以“成佛”了。

遵式在忏法思想方面继承发扬了天台忏法的传统，将天台忏法的“五悔”与“顺逆十心”贯通于所有的忏法中，并将忏悔导入往生净土，这点是遵式对天台宗的创新和发展。

遵式死后，契嵩亲自撰写了《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师慈云式公行业曲记》称颂说：“慈云聪哲，志识坚明……虽古高名僧，不过也。”并说：“天台之风教，益盛于吴越者，盖亦资夫慈云之德也。”给予遵式以很高的评价。

在佛教史上，遵式虽与知礼齐名，但他的地位还是次于知礼的。由于他更多地属意于各种“忏法”，经常“拜忏”，并且写了几部“忏仪”之类的书，为后世的寺院僧人拜忏作出了规定，提供了“经典”，所以他就被尊为“慈云忏主”，或“天竺忏主”，对后世产生了比较广泛影响。

三、儒佛汇通的宗教实践

在宋代僧侣中，智圆和契嵩可以说是宋初融合儒佛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宋代思想界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影响很大。

（一）智圆对儒佛的调和、融汇

智圆（公元976—1022年），字无外，自号中庸子，俗姓徐，浙江钱塘人。自幼出家，“毁其发，坏其服，而为浮屠徒也”。二十一岁，从奉源清受学天台教义，三年后，源清病故，遂往西湖孤山，“离群索居，衣或殫，粮或罄，因之以疾病，而孳孳然研考经论，探索义观”，“尝叹天台宗教，自荆溪师没，其微言奥旨坠地而不振”。在孤山期间，他除了继续宣扬天台思想外，好读周孔扬孟之书，对儒家中庸思想非常欣赏。后来，因与知礼等人意见不合，遂被排斥在天台正统派之外，而被列入“山

外”。吴遵路在《闲居编序》里称道智圆“神宇清明，道韵凝粹，德贯幽显，学该内外……道风所偃，学者如归”。

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智圆圆寂，年仅四十七岁，临逝前曾自作祭文并嘱咐门人：“无厚葬以罪我，无建塔以污我，无谒有位求铭以虚美我。”

智圆勤奋多著，自称所撰“科、记、章、钞，凡得三十部，七十一卷”，是“山”派中著述最丰富的一个，主要有《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金刚鐔显性录》四卷、《请观音经阐义钞》四卷等，另外还有《闲居编》五十一卷。

从总体上来说，智圆主张儒佛合一、三教同源。

智圆少时就“颇好周孔书，将欲研几极深，从有道者受学，而为落发之师拘束之，不获从志，由是杜门阒然，独学无友，往往得五经之书而自览焉”。他本想找个老师从学儒书，但为剃度师所阻止，只好闭门自学，而且学得很勤苦。由于他精通儒学，所以“晚年所作”，便以“宗儒为本”。

智圆调和儒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儒学修身，佛教治心。他认为，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佛教主要是探性灵真奥，明三世因果，但也“实有毗于治本”。因此，智圆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所以“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怠，犹恐不至于道也”。认为佛教治心，儒学修身，二者互为表里，都有益于政治。二是儒释二教都能迁善远罪，有益教化。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三纲五常、人伦物理。佛教的教义也具有这一功能，如智圆说：“何耶？导之以慈悲，所以广其好生恶杀；敦之以喜舍，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指神明不灭，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谈三世报应，所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使乎黎元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

智圆认为儒、释、道三教外表虽异，其心则同，明确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他在《三笑图赞并序》中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虽异，厥心惟同”。

对慧远送晋帝、桓玄“以虎溪为界，而送道士陆修静、儒者陶渊明则过之矣”大为赞叹。慧远、陆修静、陶渊明等分属佛、道、儒，“虎溪三笑”可谓三教融合的形象写照。

智圆不但在行动上以儒修身，而且思想上还以儒为本，主张儒佛调和，他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对于促进两宋的儒佛融会，焕发传统儒家思想学说的生机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儒家学说在宋代的复兴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二）契嵩及其儒佛汇通思想

契嵩（1007—1072年），俗姓李，藤州（今广西藤县）谭津人。既是一位（属云门系）禅僧，又是一代文僧。作为禅僧，他撰写了《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记》九卷和《传法正宗论》二卷。作为文僧，他著有《嘉祐集》《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有余万言”。现存有《谭津文集》十九卷。《谭津文集》南宋初单独刊传于世，历代对此书评价很高。明洪武年间《谭津集重刊疏》曰：“古今僧中之为人者多，而未尝有出其右者，所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清道光年间举人、藤县籍广西著名诗人苏时学作诗云：“峤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

契嵩逝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享年六十六岁。

契嵩佛学思想的特点可以用其话进行概括：“既治吾道，复探儒术，两有所得，则窃用文词发之”，即强调儒佛融合。

首先，契嵩提倡孝道，认为其提倡的孝道思想与儒家孝道思想是相契合的。

契嵩生活的北宋时期，参禅礼佛之风正在盛行，这就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但作为儒家思想代言人的士林知识分子，对于佛教的心态又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佛教思想的深刻思辨性深深吸引了士人阶层，同时儒家的铁肩道义，又不能不引起他们对佛教思想的警觉。特别是理学家，一方面在构建自己的理学思想中援佛入儒，同时又对佛教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因此，北宋时期的佛学思想不免处于尴尬地位。契嵩就是在此背景下，多次发声，表达了其佛儒并重的思想，如其所言：“今天下翕然，而与儒并劝，是不惟内有益于圣贤之道德，亦将外有助于国家之教化。”他还力图把佛教的“实性”、“真性”与“法界”等概念，与儒

家性理之说等同起来，如说：“若《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是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又曰：‘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与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其又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矣。’岂不与佛所谓‘法界常住，不增不减’者似乎？”他认为“如此数说者，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岂圣人自以冥数潜通不使人而辄识乎？不尔何其道理之相贯如此也。”契嵩努力附会佛儒的目的，就是要泯灭佛儒界限，进而实现佛儒合一。他说：“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弃本。泥也者，过也；罔也者，不及也。过与不及，其为患一也。”进而强调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入之，其事善，事之。”“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所以，契嵩认为“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在契嵩看来，不必明分僧儒，不必区分彼此，佛儒无二，实为一家。

此外，契嵩还专门著《孝论》十二章，详细阐述其孝道思想。契嵩认为，不仅仅是儒家重视孝道，佛教亦是如此。他在所著《孝论》开篇即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还说：“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显然，契嵩认为行孝是做人的根本。不但如此，契嵩还认为，佛家主张的孝与儒家提倡的孝是相通的。他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佛家的“五戒”是相通的，本质上是“异号而一体”，指出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与佛家的慈悲、布施、恭敬、无慢我、智慧、不妄言绮语等，虽然名目不同，但都是用于立诚修行、善世救人，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还说五常即是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契嵩将五常与五戒等同的结论是：“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既然如此，那么“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很显然这是将佛家思想儒学化的努力尝试。

契嵩还批判了所谓佛教无孝的观点，认为这是“见儒而未见佛也”。在契嵩看来，佛家不但讲孝，而且所提倡之孝甚至高于儒家所讲之孝。如说：“善天下，道为大；显其亲，德为优”；“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他还以释迦牟尼出家修成正果以扬父母之名的故事，来说明佛家所谓的“孝”高于世俗之“孝”。

由以上讨论可知，契嵩以“孝”为基点，对于佛儒孝道观进行了积极融会，进一步使佛儒思想相契合，不但使佛教的孝道观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而且大大提升了佛教孝道观在中国佛教思想中的地位，为佛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契嵩的心、性、情思想也体现着明显的儒学化特色。他说：“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心乎大哉至也矣”。“万物同灵之谓心……心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夫心动有逆顺，故善恶之情生焉。善恶之情已发，故祸福之应至焉”。关于“性”的问题，契嵩认为“性”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它是禀之于自然的，如说：“性也者，原道德思虑之谓也”。同时他又认为，“性”也是人人本具的道德理念，应勤修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以达到“穷理尽性”。契嵩这里所言的“性”已经了无佛教的痕迹，而成为儒家性论的代言。

关于情的问题，契嵩指出：“天下之动生于情，万物之惑正于性。”“万物有性情，古今有生死。”契嵩把“情”看作“有”之初始，认为事物始生之际，因有“有”而生“爱”，由“爱”而生“欲”，由“欲”而有男女之结合，乃至天地万物的生成，莫不由于“情”。所谓“万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则善恶以类变，始之终之，循死生而未始休”。在佛学思想中，关于“情”的论述为数极少，契嵩以“情”为万有之“初”、天地之“原”，很显然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总之，契嵩的心、性、情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宋代佛教关于心、性的认识和观念，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思想认识的儒学烙印。他的心、性、情思想，对于两宋的心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两宋时期佛教心性说与儒家心性思想相互推荡，从而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性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契嵩不但在孝道和心性情等方面主张儒佛融会，还十分推崇儒家的中庸思想和礼乐制度，认为“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有为也。亡国、灭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书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此之谓乎”；还说：“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契嵩把中庸看做世界的本原，给予儒家的中庸思想以极高的评价。

另外，契嵩还对儒家的五经以及礼乐制度等盛赞不已，如说：“夫五经之始，犹五行之成阴阳也，苟一失，则乾坤之道谬矣。”至于儒家的礼乐，契嵩看得更为重要，如说：“夫礼，所以振王道也；乐，所以完王德也”，字里行间，活脱脱一个儒学夫子形象。

契嵩一生既治佛学，又习儒学，在他身上体现了鲜明的佛儒兼综的特点。契嵩为儒佛结合所付出的努力，不但大大缓解了佛儒之间的矛盾，而且加速了儒佛融合的步伐，为理学的形成、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契嵩的这些努力，为佛教在宋代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余英时先生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评价北宋时期的佛教大师多是“儒学复兴的功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契嵩的评价。

此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佛道与宋代儒学内部结构调整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建立，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浅谈《高梅亭读书丛钞》的文献价值

□ 李卫军

《高梅亭读书丛钞》为清高嵇所辑。高嵇，字梅亭，和阳（即今河北南和县）人，乾隆庚辰（1760）年举人，曾委任山西沁源、沁邑，后由江津知县提升酉阳知州。著有《高梅亭稿》二册，乾隆51年双桐书屋刊朱墨套印本，又和吴士淳等合修有《临汾县志》。

《高梅亭读书丛钞》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收藏，以华师大所藏最全。此书收录甚广，所选以文为主，并辑录名家评语，附以己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全书首录《左传钞》六卷，依次有《公羊传钞》一卷，《穀梁传钞》一卷，《国语钞》二卷，《国策钞》二卷，《史记钞》四卷，《前汉书钞》四卷，《后汉书钞》二卷附《蜀汉文钞》一卷，《唐宋八家钞》八卷，《归余钞》四卷（按：所选皆为《庄子》、《楚辞》及历代散文名篇），《嘉懿集初钞》四卷（按：辑嘉言懿行可为世人效法者，分为“读书”、“伦理”等十二类。），《嘉懿集续钞》四卷（按：为仕宦者说教之用，分“统论”、“操行”、“政治”等十二类），《论文集钞》二卷（按：辑前人谈论文法之“文话”。）又有《明文钞》六编、《国朝文钞》五编，数量尤巨，所收均为以《四书》语句命题之八股文。

《丛钞》的编纂目的本是为初学者举业之助，与其他选家或选古文、或选时文不同，是编之选颇费心思。全书首选从先秦至唐宋名家的古文，这是明中后期开始的“以古文为时文”风潮之体现；次选嘉言懿行可为世法者，此重对士子人格之培养；又选古今学者论文之语，为士子提供文法之助；最后择明清八股文精华，为士子揣摩之范本。因其择文严谨，搜罗宏富，具有补遗、校勘等重要价值，兹为分疏如下。

一、补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陈子龙全集》，由王英杰先生编纂而成。王先生是国学大师钱仲联钱老高足，于陈子龙作品精加校勘，勤为补辑。其“诗词曲文”补辑部分收录有四书文11篇，尤称有识。刘存南先生以“全”、“当”、“细”



三字誉此书，确非过誉。但古人全集整理非易，因各种原因，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高嵇《高梅亭读书丛钞·明文钞》第六编中就有陈子龙《孟子之平陆》一篇，为此书所未收，姑为标点如下：

孟子之平陆（全章）

观大贤之责齐君臣，而知救荒之弊政矣。夫君臣之间，一推诿，一往覆，而民已死矣。故孟子并责之与！且夫与人主共此民者，良郡邑吏耳，而人主每以疏贱视之。既多闾冗之夫，复鲜事权之寄。我民一旦有急，告之于君，君曰：“问吾有司。”告之于臣，臣曰：“是有君命。”于是遂无一人任其责，而民愈穷矣。昔者孟子以失伍之罚例平陆大夫，议者以为太重，非也。夫失伍者诛，岂非以一人乱行，致多杀人哉！而何以行军则网密，课吏则法宽？夫亦不较其杀人之多寡而按之也。夫水旱之时，饥馑载道，流移满山。此时为长吏者，苟非大贪恶，亦当蒿目而叹，以为可伤；扼腕而思，以为无策。然此非大夫之职也。又以为我主藏之臣，筦钥之吏，岂能涣德音而大丰泽，使国人嗃嗃，归怨于上，又不忠之大者也。不能自主矣，何以不入告？告而不听矣，何以不去官？嗟乎！立而视其死，牧牛羊尚不可，况牧民乎？人之无良，何至于此！此皆人主好自佚乐，不恤民隐，言丰穰则喜，言灾伤则厌。巧催科则有庆，勤抚字则多罚。以故有司承旨，上下相蒙。人民涂炭而君不觉，盗贼攻劫而君不知。岁月益深，势成瓦解，此固人主之罪也。然吾以为其本在于不能择良吏与假事权也。夫饥困之民迟食一日，则立致枯槁。而灾祲之章，非至不堪，则孰

敢先报？无论吏不上闻，君不省察。即朝上夕发，而使者冠盖，岂得遽行？县官仓庾，非可时启。及至其境，而死者十二三矣。又况郊甸之广，尽遍为难；渔蠹之奸，澄清非易。及散之民，而死者过半矣。故賑恤者，救灾之末策也。惟人主于平时慎选循良，而又精计于贵贱盈缩以制其变。虽遇凶岁，可无饥民矣，何必远恃人主之帑哉！然则孟子何以不言也？夫齐之君臣方将牲牢其民而不顾，何暇与之计长久哉！失伍之卒难与论兵，害羊之吏难与言治，数其罪而责之可也。

此文元气淋漓，几于直斥明末朝政各种弊端。曹声喈说：“是一则名臣奏议，莫作文字观。”^[1]俞宁世认为：“洗发末世苟且弊政，真足痛心疾首。”^[2]足见此文感染人心之力量，非陈子龙这样具有爱国热忱之士写不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之《汪琬全集笺校》亦有失收，此书由李圣华先生整理，评者谓“收集汪琬佚文最全，体例完善，校勘、笺释准确，考证精审，正文编年有据，附录资料丰富”，^[3]极为允当。其未收之文在高塘《国朝文集》二编，标点如下：

始可与言《诗》已矣，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许贤者以言《诗》，而深有怀于夏礼焉，盖《诗》、礼一也。岂商能言《诗》，而夫子独不能言礼乎？则姑自夏始。且圣贤考古证今，非言不为功。然而言之寔难，泥章句之文，而不复旁通于他说者，非善言者也。考典章之制，而不先寓意于古初者，亦非善言者也。昔子夏因《诗》言礼，而夫子慨然以“起予”许之。则是语仪文而贱其末，称制作而邇其源。商真能言之士哉！而未尽也。触类而通者，固可取今人之意，以证古人之说。使言之而失于拘牵，则不可与。旁引而悟者，并可取古人之说，以会今人之意，使言之而流于凝滞，则不可与。而商也然乎哉！然后知《诗》与礼之相通也。言《诗》与言礼者之更相通也：宴飨，小礼也，而为之赠答以示情；聘问，大礼也，而为之咏歌以见志；《騶虞》本射猎之诗也，而用之以为射节；《鹊巢》本女子之诗也，而用之以为乡饮酒礼。颖悟如商，可与言《诗》，吾以为即可与言礼。夫礼所由来久矣，自有虞氏以命伯夷，而夏后氏仍之，于是乎以夏礼著。盖《涂山》之诗一作，而夏始发祥，此夏礼之所以盛也。《五子之诗》再作，而夏始失德。《破斧》之诗三作，而夏遂陵夷，以至于亡，此夏礼之所以衰也。迄于今，观河洛之长流，则明德虽远，其轨物不犹

堪称述乎！考王府之遗址，则关石虽非，其典则不犹堪诵说乎！能言之矣，吾不知夫子又将谁与也！厥后夫子删《诗》，首命子夏序之，其于时代略备，而夏独阙如，则夏诗之亡久矣，犹幸而有礼。然而礼也，玉步三改，鼎物再迁，旧服无恙耶！遗规无恙耶！果足使能言之夫子与及门诸儒，娓娓言之不倦耶！是可慨也。

此文为截搭题，最忌过、挽之后，上下正讲，仍各自敷衍题面。汪琬此文：“言诗先揽入礼，言礼复缩入诗，上下融成一片。”^[4]足见其文章功底。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汤显祖全集》，由徐朔方先生笺校，是研究汤显祖者必读之本。高塘《明文钞》初编亦有一篇为其所未录，标点如下：

女有余布，一句

有无售之女功者，弊与农等也。夫女不通功，布无复用之矣，与农固交困哉！且物之不可独有馀也，有馀之弊，自一端而起，必不自一端而止。如子言，特农有馀粟耳。农之有馀，农之患也。而农既有馀，农之外尽不足矣，农亦无如此女何矣。粟之有馀，粟之患也。而有馀在粟，粟之外亦各有馀矣，女更无如此布何矣。所谓女之用，不过一丝一缕，可以卒岁，而卒岁之外，竟不得而交通之也，遂将为长物乎？所谓布之用，不过一裘一葛，以备裳服，而裳服之外，不可裂而贸易之也，得毋有虚积乎！蚕而缫之，苧而织之，女非少怠也，而用不加广，沉积而莫贷，徒以其物填笥筐耳。寸而累之，尺而成之，布且日多也，而货不益贵，壅滞而难售，卒亦朽疵而不可用耳。夫耕问农而织问女，各有司也。一人织而数人衣，互相济也。女馀于布，于女得矣，如不织布而衣者何？必有因而受其寒者，是无布者病也。布自有馀，于布足矣，奈出于布之外者何？且有因而怠若事者，是有布者亦病也。况天下之功，不止一女，而无用之积，尽如此布，然后知通功易事之不可已也夫！

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沈德潜诗文集》，由潘务正先生整理，其佚文部分未收沈德潜之制艺文，高塘《国朝文编》初编收有2篇，五编收有8篇。又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版《王鏊集》，由吴建华先生整理，未收其制艺文，高塘《明文钞》初编收有5篇，三编收有8篇。王鏊以八股文名扬天下，今人整理其文集，若不收其制艺文，实有缺憾。

其他明清文人总集可以据补者尚多，不备举。总之，若有意欲整理清乾隆以前明清文人别集者，高塘此书具有重要之参考价值。

二、校勘

高塘《高梅亭读书丛钞》网罗甚富，别择精审，还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如其古文诸选所择各家评语、《嘉懿集》二编所录前人之说，均可与他本相参证。而明清之八股文当时已不为人所重，故流布不广，版本较少，其校勘价值更高。以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为例，高塘《明文钞》所收汤显祖制艺文13篇，除一篇为徐本所未收外，其余12篇与徐本颇有异同。据笔者比勘，不同者约有83处，且以徐本错误者为多，足证徐先生所据之本质量稍差。姑举数篇，以见其概。

徐本1596页《昔者太王……居焉》篇：“其上于斯也非一世矣”句。按：高塘本“上”作“土”，合上下文，此句本言周之先民世代居于邠地，作“上”其意不可解，作“土”则名词动用，有居住之意。同页“故上可乐也”句，高塘本“故上”二字作“自土”，结合上下文，此处言自己之土地虽然可乐，但因戎狄侵迫，有亡族的威胁，不可长处，迁居乃明智之举，作“故上”则不可解，当以“自土”为是。

徐本1675页《我未见好，全章》篇：“圣人慨成德者之难，因立德者之众焉”句。按：“立德”者众不会出现“成德之难”的结果，故其意义难通，而高塘本“立”作“言弃”二字，盖弃德者众，才会导致“成德之难”，故作“言弃”者是。

徐本1678页《孔子有见，三句》篇：“大贤立圣人不一其仕”句。按：高塘本“立”作“言”。此篇以孟子与万章谈论孔子出仕之道为说，大贤指孟子，圣人为孔子，故“大贤立圣人”殊不可解。合上下文，此处乃孟子对孔子出仕途径的评价，认为孔子为实现其道，出仕途径不一，各有其原因，故作“言”字，文意始豁然。同页“是故仕鲁之道明矣”句，高塘本“之”作“为”，合上下文，此句言孔子为官于鲁合乎道，当以作“为”者是。

徐本1680页《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篇：“计以邠可立，岐可徙，而先君后稷之祀，必不可自我斩也”句。按：高塘本“立”作“亡”，此处言后稷之祭祀最重要，邠与岐都不过是土地，皆可抛弃，故“立”字不可解，作“亡”为是。同页“吾岂隐忍而俟未定之天也”句，高塘本“岂”作“宁”，合上下文，此处意谓与其冒险与戎狄决战，招致灭族之祸，宁可忍让迁徙，等待时机，故作“宁”义长。

由上述可知，徐先生所据之本颇有漫漶处，如上与土、立与言、立与亡等，似皆因形近不清而致误。而其所据之本或亦稍劣，如岂与宁、之与为等，皆《明文钞》本义长。

除补遗、校勘外，高塘《丛钞》还具有辑佚价值。

所谓补遗是指其人有关文集传世，不过所收不全，可据此补阙；辑佚则是其人作品已经失传，经此补辑尚能窥其一斑。如俞长城有《可仪堂左传选》，颇为其时选古文者所重。冯李骅认为其评“意新笔隽”，为“读《左》快书”。^[5]于光华则说：“《左传》一书不独史氏之宗，即历代大家名家古今文法，无不由此而出，非全读不可。选家因学者资性高下悬殊，而节录便诵，未免支离割裂，有乖文法。俞宁世先生惩其弊，故所选独备。”^[6]正由于此，高塘《丛钞》、张昆崖《左传评林》、庞佑清集评《春秋左传杜注》、俞光华《古文分编集评》等都大量引用俞宁世评语，将各书评语辑出，可以略见其书面貌。俞宁世还有《战国策》、《国语》等古文选本，高塘《丛钞》也多有引用，可据以辑补。而高塘《明文钞》、《国朝文钞》共收文1939篇，涉及400余位作家，多为明清科举三甲之士，其中有不少人并未有文集传世，得此尚可一窥其人文章之风采。

参考文献：

1. 高塘：《明文钞》，乾隆53年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本。
2. 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3. 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4. 陈子龙著，王英杰编纂：《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本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课题《左传彙评及研究》（批号：13YJC751023）、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文学演变与文化转型研究》（2014-CXTD-08），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课题《明代左传学研究》（批号：2013-GGJS-16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高塘：《高梅亭读书丛钞·明文钞》六编《孟子之平陆》篇，章末评语。
- [2] 同上。
- [3] 《文学遗产》网络版，编辑推荐。
- [4] 高塘：《高梅亭读书丛钞·国朝文钞》二编《始可与言言之》篇，章末评语。
- [5] 冯李骅：《左绣》，康熙59年大文堂刊本，卷首《读左厄言》。
- [6] 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乾隆52年友于堂刊本，卷首读法。

（作者简介：李卫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焦延寿及其《易林》刍议

□ 陈功文

西汉经学昌明，涌现出一批经学名家，仅武帝一朝，“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1]武帝之后，经学家不断涌现。在众多的经学名家中，梁（今河南商丘）人焦延寿的《易》学研究是较有特色的。焦氏《易》学研究著作有《易林》、《易林变占》等。《易林变占》已失传，今仅存《易林》一书。《易林》亦称《焦氏易林》，依据《周易》而作。此书与《周易》之关系，“诚如左右手不可或缺，有《易林》更能显《易经》之变化。有《易经》方能寻《易林》之本体”^[2]，在《周易》研究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身世与学术渊源

焦延寿的生卒年月，史无记载。唐王俞曾为《易林》作序，称之为西汉元帝、成帝之间人，其云：“延寿传经于孟喜，固是同时，当西汉元、成之间，凌夷厥政，先生乃或出或处，外比包蒙，辄以《易》道上干梁王，遂为郡察举，诏补小黄令，而邑中隐伏之事，皆预知其情。”^[3]现代学者陈良运依据延寿是京房的老师，推定其生年或在公元前95年。陈氏又依据相关史实及《易林》本书的创作情况，认为延寿的卒年或在公元前10左右。^[4]陈氏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本文从之。

关于焦延寿的身世，《汉书》未曾为其专门立传，而是在介绍其学生京房时附带介绍的：“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5]3160}由此可知，焦延寿字赣。颜师古《汉书注》曰：“赣音贡。”^{[5]3160}也有史料称之为焦贡。如《太平御览》卷286引《陈留风



俗传》云：“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由上述王序及相关史料可知，焦氏由于好学曾得幸于梁王。此梁王，据张文智考证为梁敬王刘定国（公元前85年～前46年在位）。^[6]焦氏后任小黄令积极作为，深得一方百姓拥戴。焦氏《易》学长于灾变，更直日用事，长于占验，“邑中隐伏之事皆预知其情”。后来，延寿将其所学传于京房。

关于焦氏《易》学之源，《汉书·儒林传》曾作介绍，其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5]3601—3602}由此可知，延寿先从孟喜问《易》，后又将孟氏《易》学传给京房，京房又传给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等人，由是形成京氏《易》学。

关于孟喜，《汉书》说他“从田王孙受《易》”^{[5]3599}，而田王孙的老师即梁国人丁宽，即梁孝王时期的丁将军。《汉书》还说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郤，独传喜，

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菱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白‘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繇是有翟、孟、白之学。”^{[5]3599}如此，则延寿的《易》学源流亦甚清晰：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王孙传于孟喜，孟喜传于延寿，延寿又传于京房。另据《汉书》的史料记载，孟喜、焦延寿、京房三人均好阴阳灾变之术。可见此三位师徒在《易》学传承方面恪守了自己的家法，自成一派。此派《易》学主要发展了《易》的卦气说，形成了《易》学中的“象数”学派。该学派主要特点有三：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7]

二、《易林》的主要内容

由上述所引《汉书》史料可知，班固在《汉书》中曾先后提及孟氏之学与京氏之学，但未曾言及焦氏之学，在《汉书·艺文志》中亦未列焦氏《易》。而孟、京氏《易》学还先后被汉宣帝、汉元帝立于学官，被官方正式认可，可焦氏《易》学却没有如此幸运。既然焦氏上承孟喜，下启京房，且京房承焦氏之学并“用之尤精”，那么班固也应承认有焦氏之学才是，官方也应立焦氏《易》学为官学才是。遗憾的是，此两点均未发生在焦氏身上。连锁标先生认为，班固不著录焦氏易的最根本原因是焦氏“离经叛道”，其学不能入易家。他进而解释说：“众所周知，班固不仅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而且也是个正统的儒家。他生活在东汉，与焦氏活动的西汉时代相隔不远，对焦氏的生平及其著述情况，应该说是相当了解的；可是他在《汉书·京房传》里只提及焦氏的生平活动并予以褒美之辞，在《儒林传》里也只是把焦氏易说的渊源作为一段公案载册而已，却只字不提焦氏的著述情况。这并非班固的一时疏忽，可是从儒家的眼光看来，焦氏学说不同于正统易学，无异于离经叛道（西汉刘向考易说也持这种观点），其著作自然不能列入《艺文志》的易学类。”^[8]连氏将焦氏易学归为“离经叛道”是很有道理的。南宋叶适《习学记言》曰：“吾家有焦贛《易林》、京房《易传》二书，大抵皆卜筮、阴阳、气候之言，不复更及《易》道。”^[9]正是由于焦氏易学“不复更及《易》道”，从而被传统《易》学视为异类。如此，则官方不立其为官学亦是理所

当然的。

说焦氏易学的“离经叛道”，其实就是承认其标新立异。焦氏易学源于孟喜，“孟喜创立孟氏学，开辟了以阴阳灾变说解易的新蹊径”^[8]。孟喜的卦气说主要内容是以四正卦主四时，直二十四气，以四正卦之外的六十卦配月、直候、直日。孟氏的卦气说仅限于理论上的创新，真正落实于实践的才是焦延寿。焦氏撰《易林》，继承并发展了孟氏的卦气说，“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焦氏的“分卦直日”法，《汉书》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5]3160}这种“分卦直日”法，具体是把六十四卦分别置于从立春到大寒的二十四节气之中，每两节气凡三十日配五卦，其中《震》、《离》、《兑》、《坎》各直一日（二至二分），余六十卦各直六日。

焦氏的六十四卦分配与排列完全同于孟喜。但他同时又创造出六十四卦变占的方式，即在确定了六十四卦所直之日后，便以直日之卦为本卦，以本卦所直之日内行占所筮遇的卦为之卦。而之卦又有六十四种，这样以六十四个直日之卦为本卦就会形成4096种变卦。焦氏又在每种变卦下面另作卦辞（林辞），这样就有了4096条卦辞，每条卦辞乃为四言韵语（极少数为三言）。由于焦氏在卦象下面未作分爻，因此每卦只有卦辞而无爻辞。

焦氏在易与象数之中，别为占候一派，独创一家之说。焦氏《易林》创造了4096种变卦与卦辞，主要是将由孟喜创造的象数学运用于筮占上。占著时，查阅直日之内的本卦所统摄下的之卦卦辞，就可以推论出吉、凶、祸、福的结论了。如此，则4096条卦辞即成为他筮占、占候的解说辞。黄伯思对焦氏的占著之法曾作这样的概括：“世人谓延寿之法，凡筮得某卦，则观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动，则但观本卦林辞爻本影”^[10]。黄氏提及的卦林，就是该卦的卦辞。由于焦氏“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往往“各有占验”。唐人王俞曾为此书作序，对利用此书占卜一事做过总结，其云：“大凡在变化象数之中者，莫逃乎《易》。唯人之情伪，最曰难知，系称卜筮尚占，忧患兴虑，……自三古以降，杂说歧分，矧卜筮多门，亡羊殆尽，……夫自知知人，乃曰明哲，则隗照易数于龚

使，焦贲发诫于明君。照既歿，不显其占；贲明且哲，乃留其术。……所著《大易通变》，其卦总四千九十六题，事本弥纶，同归简易。其辞假出于经史，其意雅合于神祇。但率洁精专，事无不中，而言近意远，易识难详，不可读蒙，以为辞费。”^[3]而利用《易林》之法进行卜筮，往往灵验，《易林纪验》载有两条占验的实例，便能证明之。

三、《易林》林辞的文学性

《易林》林辞用韵语写成，模仿《诗经》而作。作者也是有意识地将其当作诗来写的，其《大有》之《贲》云：“楚鸟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味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作者在作诗的过程中工于拟象，语言质朴自然，不尚文饰，继承并发扬了先秦以来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但由于林辞广泛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使韵语达到诗的审美标准，富有文学价值。

林辞仿照《诗经》而作，在表现手法上也惯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增添了诗句的文学性。如赋，林辞语言虽简，但善于铺陈其事。大多数林辞基本上通篇敷陈，如：“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坤》之《大畜》），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典籍藏于兰台，虽经战乱亦不会遭劫的事实。也有部分林辞在叙事时增添了想象与夸张的成分，如：“金牙铁齿，西王母子。无有患殃。扶舍徙道，到来不久”（《小畜》之《大有》）将西王母之子想象成金牙铁齿，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再如比，林辞善用比喻的手法，如：“季去我东，发栲如蓬。展转空床，内怀忧伤”（《比》之《复》），句中“发栲如蓬”写出了女子在丈夫远去后无心梳洗打扮的情形。“敏捷劲疾，如猿升木。彤弓虽调，终不能获”（《泰》之《蛊》），将拉弓者的敏捷身手比作猿猴攀木，形象生动。再如兴，如：“凤凰在左，麒麟处右。仁圣相遇，伊吕集聚。时无殃咎，福为我母”（《讼》之《咸》），以“凤凰在左，麒麟处右”起兴，从而引出仁圣相遇时的非凡场面。当然，林辞中的比兴手法常常是联合在一起的，形成比兴的体式，如：“豕生鱼鲂，鼠舞庭堂。奸佞施毒，上下昏荒。君失其国”（《蒙》之《比》），作者用“豕生鱼鲂，鼠舞庭堂”起兴，引出“奸佞施毒”，同时又将奸佞比作豕、鼠，做到了比兴合一，增强了批判与讽刺效果。

《易林》的文学价值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宋陈振孙说它“皆韵语古雅，颇类左氏”^[11]。明钟惺、谭元春认为：“焦延寿用韵语作易占，盖仿古谣辞，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之类也。其语

似讖似谣，似浑似隐，似愚似脱，异想幽情，深文急响，取其灵警奇奥、可纯乎四言者，以存汉诗一派。”^[12]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关注到《易林》的文学价值的学者是闻一多，他曾打算将其写进中国文学史，并对《易林》的文学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其云：“如果说汉代文学不在赋而在乐府与古诗，想来是不会有几个人反对的。如果我又说除乐府古诗外，汉代还有着两部分非文学杰作，一部分在《史记》里，另一部分在《易林》里；关于《史记》你当然同意，听到《易林》这个名目，你定愕然了。《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这意见在我心里远十年以前就已确定了。”^[13]

晚于闻一多的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易林》的文学价值，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14]同时，钱先生还以独到的眼光在《管锥篇》中另立《焦氏易林》专题，对《易林》的文学价值进行大力挖掘，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论述了自《乾》、《坤》至《未济》等三十林林辞的文学价值。现代学者陈良运先生认为：“钱先生称赞《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确非虚语，他的阐述和慧眼独具的评点之作，给我们认识《易林》的文学价值大有启发。”^[15]

四、《易林》林辞的思想内涵

《易林》林辞常为四句韵语，偶有三句、五句、六句不等。每句四言，偶有三言。林辞原为焦氏解读卦象的解说辞，但内涵丰富，包含了从上古至汉代的神话传说、历史评判、社会现实、生命意识、人生哲理、男女爱情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神话传说。受汉代宗教文化及民间神仙观念的影响，林辞糅合了很多神话人物、仙草丹药等内容，指出了神能助人间摆脱愁苦与暴乱，恢复人世的平安：“众神集聚，相与议语。南国虐乱，百姓愁苦。兴师征讨，更立贤主”（《屯》之《节》）；“十鸟俱飞，弈射九雌。雄得独全，虽惊不危”（《履》之《履》）。林辞中所写到的神话内容，无疑与当时社会滋生并得以发展的养生文化观念分不开的。汉初，养生文化就得到了较大发展，并形成一股养生热潮。人们在狂热追求养生的同时，也开始热衷于求仙。武帝时期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5]1260}受社会上盛行的养生文化的影响，林辞描写大量的神话传说也

就不足为怪。

(二) 生命意识。受养生文化的影响,林辞除了描写大陆的神话传说内容外,还涉及到对生命意识的关注。林辞对生命的来源进行了探索,认识到阴阳的结合才能产生生命:“阴阳精液,膏熟脱拆。胎卵成魄,肇生头目,日有大喜。”(《夬》之《小畜》)“鸞鸣岐山,鳖应山渊。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文王以成,为开周庭。”(《乾》之《井》)这些思想显然是对《周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思想的继承。当然,林辞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作者认为若使子孙后代旺盛,或能封侯晋爵,必须男女婚姻合配才行:“婚姻合配,同枕共牢。以降休嘉,子孙封侯”(《需》之《大壮》);“良夫淑女,配合相保。多孙众子,欢乐长久”(《旅》之《艮》)。

此外,林辞中还描写了人们对长生的追求。既写到了人们想延长生命的办法:“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长生和气,王以为宝。公尸侑食,福禄来处”(《同人》之《剥》)。同时也写到了延长个体生命,在于能更多地繁衍后代:“长生无极,子孙千亿。柏柱栽青,坚固不倾”(《比》之《泰》)。还写到了在饮食方面延寿的技巧:“白茅醴酒,灵巫拜祷。神嗜饮食,使君寿考”(《临》之《蒙》)。

(三) 社会现实。林辞多层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一方面写出了朝廷的政治现实,刻画了盛世之后朝廷的昏暗与腐败,表现政治的危机:“君子失意,小人得志。乱扰并作,奸邪充塞。虽有百尧,期不可救”(《家人》之《履》);“郁悒不明,为阴所伤。众雾集聚,共夺日月”(《巽》之《噬嗑》)。同时,林辞对穷兵黠武、战争的惨状以及战后的惨相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两虎争斗,血流漂杵。城郭空虚,蒿藜塞道”(《同人》之《鼎》);“文巧俗弊,将反大质。僵死如麻,流血濡槽。皆知其母,不识其父,干戈乃止”(《讼》之《讼》)。林辞对下层人民艰难的生活也予以揭示:“国乱不安,兵革为患。掠我妻子,家中饥寒”(《师》之《旅》);“蝗啮我稻,驱不可去。实穗无有,但见空藁”(《豫》之《师》)。

另一方面,林辞对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有所展现:“范公陶朱,巧贾货资。东之营邱,易字子皮。抱珠载金,多得利归”(《兑》之《恒》);“逾江求橘,并得大栗。烹羊食肉,饮酒歌笑”(《履》之《大过》)。由于作者官微职卑,却“爱养吏民,化行县中”,有大量时间接触底层生活的民众,记载了大量的平民生活实例。

林辞对社会现实的多层次刻画,为我们展示了汉代社会从上层到地方的社会真实面貌,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四) 历史评判。林辞时而还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为“象”,对其进行评判,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如:“兵征大宛,北出玉门。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需》之《履》)。此韵语的内容出自汉武帝征讨大宛之事。汉武帝为了获取大宛的汗血宝马,在太初年间曾两次出兵大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而且过度的穷兵黠武导致了民生凋弊、骨肉分离的人间惨象。该林辞对征讨大宛的战争虽未加以褒贬,但末句“身几不全”既警示了统治者,也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厌恶与反感,对战争造成的悲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五) 人生哲理。《易林》作者善于透过万物之象来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张文江先生云:“《易林》本占筮书,如变象破执以读之,乃得哲理之用。”^[16]是得作者旨趣的。书中的哲理思想是丰富的,特别是在祸福相依相存方面,给了我们诸多的哲理启示,如:“鸱鸢破斧,邦人危殆。赖其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复立”(《坤》之《遁》);“方船备水,傍河燃火。积善有征,终身无祸。田福吉昌,永得安康”(《泰》之《履》)。《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是矛盾的对立面,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可以互相依存,也可以互相转化。《易林》认为,常积善德,可以“转祸为福,倾危复立”,从而“永得安康”。

(六) 男女爱情。《易林》林辞涉及到较多的男女爱情的描写,写出了少女对爱人迎娶的期盼,已婚女性对外出丈夫的思念,以及遭遇恋爱婚姻不幸后女子的悲惨境遇等。

首先,写少女对爱人迎娶的期盼,主要写她们焦急地等待爱人来迎娶,在等待不到时又长吁短叹,泣涕涟涟。如:“三女求夫,不见复关。伺候山隅,长思忧叹”(《乾》之《家人》);“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见复关,泣涕涟洳”(《坤》之《井》)。有时还写出了在嫁娶之日,少女没有等来迎娶的车船,但仍在痴痴地等待,以及在等待过程中的失望之情。如:“夹河为婚,期至无船。淫心失望,不见所欢”(《坤》之《小畜》)。

其次,写已婚女性对外出丈夫的思念,主要写出了她们对无休止的役使的谴责,表达出对外出服役丈夫的思念与担忧。如:“东山家辞,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服羸户。叹我君子,役曰未已”(《家

人》之《颐》)。有时还写出了思妇因丈夫的外出而愁肠百结的情态,白天不梳洗,发乱如蓬;夜晚辗转发侧,难以入眠。如:“伯去我东,发扰如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催我肝肠”(《姤》之《遁》)。

再次,写遭遇恋爱婚姻不幸后女子的悲惨境遇,主要写出她们嫁不出去或是去家庭后的悲惨、孤独的生活。如:“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困》之《艮》);“冬生不华,老女无家。霜冷蓬室,竟为枯株”(《蒙》之《兑》)。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118.
- [2] 徐芹庭. 焦氏易林新注 [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0:2.
- [3] 王俞. 汉焦小黄周易卦筮叙 [A]// 焦延寿. 易林. 清毛氏汲古阁影元钞本.
- [4] 陈良运. 汉代《易》学与《焦氏易林》 [J]. 中州学刊, 1998 (4): 63-69.
- [5]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张文智. 孟、焦、京易学新探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223.
- [7]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上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108.
- [8] 连镇标. 焦延寿易学渊源考 [J]. 周易研究, 1996 (1): 3-9.
- [9] 中国历代经籍典 [M]. 台湾: 中华书局, 1985:557.
- [10] 黄伯思. 校定焦贛《易林》序 [A]. 焦延寿. 焦氏易林. 清嘉庆张海鹏《学津讨原》刊本.
- [11]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361.
- [12] 钟惺. 谭元春. 古诗归 [M].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闵振业三色套印本
- [13] 孔党伯. 袁睿正. 主编. 闻一多全集 (10)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61.
- [14] 钱钟书. 管锥编 (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221.
- [15] 陈良运.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J]. 周易研究, 2002 (5): 64-71.
- [16] 张文江. 管锥编读解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23.

(作者简介: 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学术动态●

陈功文博士、刘万华博士著作获河南省社科 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日,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 2020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 我院陈功文博士申报的《文化商丘·汉梁文化》(著作) 获得二等奖。该著作由陈功文与刘万华两位博士合著, 2020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学术界引起较好的学术反响。本书作为研究商丘地域文化的代表作, 受到原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的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 并亲为作序。

汉梁文化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代乃至中国文化历史上, 都占有重要地位, 汉梁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宏大的气象,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以汉梁文化历史研究为切入点, 参照汉梁文化遗存、考古发现及学界研究成果, 第一次开创性地针对西汉梁国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艺术、墓葬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 多视角阐释了汉梁文化独特的内涵建构与发展成就, 深入发掘了汉梁文化之精义。本书体例清晰, 资料翔实, 图文并茂, 研究细致深入, 不但大大拓宽了汉梁文化的宏阔视野, 而且为唐宋文化、中原历史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河南省最高的社会科学科研奖励。本次获奖, 充分显示了我院教师的研究特色与科研实力。

《哈姆莱特》中天命思想的多重文化根基

□ 张松林

莎士比亚戏剧中有浓重的“命运观”，或隐或现于剧本的针锋粟粒之间。古典思想的宇宙观、基督教的神学观、人文主义的命运观、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均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命运观”产生了实质影响。剧本《哈姆莱特》中的“命运观”是诸多观念影响的产物，莎士比亚融多家思想，形成了合于当世、积极向上的“命运观”。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推崇《哈姆莱特》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无论是教材、辞典等都持该观点。而论述“命运观”的著作也时有发声，1986年高万隆发表了《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1]一文，论述了哈姆莱特面对命运的懦弱、消极和偏激，特别提出了他思想中封建伦理意识。而后，李赋宁《欧洲文学史》中认为他“是一个因失掉父亲和王位继承权之后悲愤交加而又无可奈何、处于进退两难的封建王子……他身上有厌世情绪、宿命感、封建等级观念等”。^[2]对哈姆莱特的命运观有了明显有别于人文主义的论断。从先后发表了《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3]和《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4]，系统反驳了王子是人文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是历代处于现实与理想困境中人的共同感受，指出了“命运”困境的永恒性。以上学者的论述，对哈姆莱特的“命运观”做了点评，为本文研究其复杂“命运观”渊源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封建“命运观”制约

文化信仰是带有终极意义的信念支撑，也是个体生命和群体关联的文化脐带，更是决定特定社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强大力量。欧洲封建“命运观”是在文化信仰基础上的延展，在封建文化取得欧洲主流思想位置之后，天命便成了欧洲人生活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和情感认知。

受基督教制约，宗教思想成为欧洲封建社会传统思想文化渊藪之一，也是《哈姆莱特》“命运”思想的主要来源，当时基督教掌握着文化解释权，



对“命运”有严格的认知限制，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受上帝意志控制。中世纪时，基督教“命运观”已经形成，并作为意识形态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它要求按既定规则做事，用《创世纪》中的话就是

“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规则在《创世纪》中出现18次，严格划分了万物的属种和秩序。人类生活中所谓“善”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自由意志选择下“过正当生活”。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人们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对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则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如此。”^[5]在基督教哲学视野下，历史是上帝创造的，历史又是人类活动的实践，人需要按照上帝旨意的活动是基督教历史观的核心。伊甸园的故事中，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乐园，从此，人类历史开始以宗教期许的生活为中心波动，人们在自由意志支配下选择爱永恒、爱神圣，亦或选择欲望的满足，人的价值实现呈现出以上帝为核心的多样化状态。

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伦理观中，人按照自身条件信奉上帝方为正当生活。当人的行为偏离正当生活时，就需要矫正。偏离与矫正的过程呈现出受难—悔改—清除—蒙恩等阶段性特征，加拿大学者弗莱称之为“U型结构”。哈姆莱特恰好就处在受难阶段，国家政变、家庭解体、信仰坍塌，软弱的丹麦人在奸王克劳迪斯的淫威下为虎作伥，形成一个强大的私欲利益共同体。他们对哈姆莱特威逼利诱，诱惑不成便要将其置于死地。哈姆莱特不仅是为父报仇这一私事，同时还关注让生活正常化的大

事——扭转乾坤，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

报仇是封建社会中人必须承担的“天命”责任：“复仇的义务首先是由受到伤害的人来承当；复仇是他必须履行的最神圣的职责，甚至是延续到死后的职责。”^[6] 受害人用财产继承权的分配权来保证复仇行为得以实践，“任何道德义务都难比族间复仇更为神圣”^[7]，个人无法完成复仇时，家族要联合起来，这一“自然义务的原则是从一种契约论的观点脱胎而来，对它们的应用也并不以人们的明确的或默契的同意行为或自愿行为作为先决条件”^[8]。人类社会步入父系阶段后，儿子成了父亲的私有财产，要对父亲尽义务，儿子替父报仇成了神圣责任。

《哈姆莱特》中三个青年哈姆莱特、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都有为父报仇的责任。复仇涉及正义，也涉及人物情感及社会伦理，三个儿子都有血亲复仇性质，采取“以血还血”的方式维护个人荣誉，匡扶正义与恢复伦理秩序。其间还夹杂着个人与宗族关系问题，在宗族命运共同体思维下，子辈只有替父报仇方能得到同族人的接纳，进而其身份合法性得到认可，继承权得以保障。问题是哈姆莱特在复仇的同时，还想以一己之力匡正秩序，因此，他必然面临情感与伦理的困境，复仇行为又因宗教因素而延宕，连累诸如奥菲利娅等无辜之人遭到毁灭，情感正义与伦理正义均难实现。学界对哈姆莱特的惶惑与挣扎展开了充分而深入地论述，留下了“性格缺陷说”、“恋母情结”说等影响深远的观点，却忽略了王子的延宕同“命运观”的联系。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认为血亲复仇“是部族内部各社区之间的一种敌对状态，并为风俗习惯所证明，其合理性在于，杀的罪责和实施复仇的责任虽然直接落在杀人者及被杀者的父系亲属上，但双方所属的社区却以各种方式卷入敌对行动中，甚至演化为各类械斗。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制度”。^[9] 现代文明法律建立之前，血亲复仇规则在民间长久沿袭，也是朴素的情感正义的表现。文学中早就有了以雄浑悲壮的基调描述的血亲复仇故事——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虽然雅典娜开始引导社会依照法律和程序考察复仇行为，但是其维护父权的目的还是为封建时代血亲复仇做了榜样。王子说：“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像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紧进行我的蹉跎未就的复仇大愿！”^[10]（四幕四场）

雷欧提斯阐释得更为明白：“我的感情是激动我复仇的主要力量，现在从感情上说，我自然是满意了，但是还有事关荣誉这一条；除非有什么为众人所敬仰的长者，告诉我可以跟你捐除宿怨，指出这样的事是有前例可援的，不至于损害我的名誉，那时我才可以跟你言归于好。”^[11]（五幕二场）哈姆莱特等人作为儿子，天然地要履行为父报仇的义务，这是命运的内涵之一。

封建天命责任支配下的报仇是非理性思想，哈姆莱特也知道报仇具有天然的意识形态正义，清楚儿子应该做的一切事情。但是，作为受过人文教育的理性王子同样追求报仇行为在理性范畴内的正义，必然经历传统天命与理性的精神博弈。哈姆莱特通过戏中戏证实了鬼魂的话，而后遇到了一个绝佳复仇机会，面对奸王独自祈祷，王子却犹豫了：“他现在正在祷告，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得考虑一下……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纵欲的时候，在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12]（三幕三场）这是哈姆莱特的选择，体现出了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天命”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基督教理解，天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是为了激活人“向善”的能力：“人获得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过正当的生活，在全心追随上帝的同时趋善避恶，因为上帝即真理和善；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恶的存在，恶即‘善的缺乏或背弃’”^[13]，遗憾的是选择的诱惑实在太强大，当一个人逾越既定生活规则就能带来的巨大现实利益时，人就会铤而走险，背弃善的选择。克劳迪斯为了当上国王毒杀王兄，他选择了“恶”，给哈姆莱特带来了灾难，也给所有丹麦人带来了精神地震。当一个“坏”选择能带来俗世生活满足时，脆弱的人往往会抛弃崎岖的修行向善之路。当众多臣民向奸王臣服时，哈姆莱特的复仇就具有了惩恶扬善的象征意义——倡导人们过正当生活。

在基督教伦理中，临终忏悔能洗涤生前罪愆。所以王子才产生了祈祷时复仇反而把坏人送到地狱的想法，“天命”责任让哈姆莱特报父仇、整乾坤，“天命”信仰又让他不能不择手段去复仇，他必须选择一个既具备惩罚性，又具备伦理性的方式杀了克劳迪斯。王子此时的立场显然是基督教伦理，复

仇的“天命”悄然被宗教赋予的责任“规则”取代了。

正国风是封建王朝继位者的“天命”职责。克劳迪斯的阴谋让伦理蒙羞，兄弟暴力相残的行为是上帝深恶痛绝之恶，人类文明却是在该隐兄弟的血泊中颠簸前行。哈姆莱特的“王储”身份赋予他让伦理回归到正常的使命，尽管他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4]（一幕五场）哈姆莱特的任务不再是创造“幸福生活”，而是宣扬与维护伦理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哈姆莱特在选择当英雄的时刻是无奈的，好比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知道自己为人类受苦时的偶然喟叹：“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15]情感眷恋和责任承担的矛盾在哈姆莱特身上重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16]（三幕一场）

基督教伦理中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哈姆莱特这种态度是通过自由意志确立的，有人自由选择了违背诫命，就要承担违背的代价，自由和责任是对等关系，责任在这里就是“正当生活”的同义语。在神学家奥古斯丁眼里，违背责任是犯罪，但人类历史也是在自由意志中颠簸前行，那么这与上帝意志的永恒正义有什么关系呢？在基督教语境中，人的自由是上帝赋予的，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实施自由，而无法超越永恒上帝，因此歪曲使用自由意志造成的恶果必定会被清除。上帝预定了人类历史发展蓝图，却不直接干预历史发展，而是选择一个代表来执行上帝的意志。这个永恒力量的代表人物必须信仰纯正、意志坚定，上天赋予他拯救者的使命和责任。哈姆莱特是生于基督教文化浸润中的青年，必然要为宗教伦理添砖加瓦。他在复仇面前表现出了极强的理性精神，即便是周遭臣民都在奸王面前奴颜婢膝，他还是默默坚持为正义昭雪。他要在一片混沌中重整乾坤：“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17]（五幕二场）

综上所述，从时代主流文化上看，封建文化赋予王子哈姆莱特复仇的“天命”义务，这是他作为儿子和王储的天然职责。该层面的“天命”观受基督教文化支配颇深，促使他按宗教“正当生活”要

求去复仇、重整乾坤，封建义务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他行为的延宕。

二、神秘“命运观”影响

莎士比亚戏剧“既有传统的运用，又有新的创造……在自己的作品里继续唱那首古老的歌曲，就是民间世代相传的神怪故事。”^[18]经典文学作品再现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普遍思想，在基督教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统摄下，人与自然、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对应有规范的解释，却并未摒弃原始神秘思想，它时时出现在剧本《哈姆莱特》中。

王子哈姆莱特的复仇“天命”有神秘思想痕迹。正如加林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中所说：“事物的可塑性，人可以统治事物、改造事物的思想，用语言来劝说和教育上天和其他因素的妖术们，在无数的著作中蜿蜒曲折地表现着。”^[19]因为人类对大地生活的固守，日月潜行、季节交替、物种繁衍、人类活动等背后的神秘规则被抬高，人凭着与天地万物的隐秘互动而确立凝固力，保护着个人和团队的阶层属性。莎士比亚生活时代的哲学继承了中世纪井然有序的宇宙观，天命、星宿、自然、女神、动物、植物、人类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链条，人类在这个巨大的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个人、政治、宇宙之间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中，人最害怕变动，人处于政治和自然的中间，二者中任何一个变动都会给人带来恶劣影响，甚至危及生命。

“在想象老哈姆莱特王被害的情况时，莎士比亚使用了各种不同的与原始人心理有关的象征，它们意味着死人与社会之间的某种神秘的结合。”^[20]老王的非自然死亡打破了人间的平衡，剧中罗森格兰兹称：“君主的薨逝不仅是个人的死亡，它象一个漩涡一样，凡是在它近旁的东西，都要被它卷去同归于尽，又象一个矗立在最高山峰上的巨轮，它的轮辐上连附着无数的小物件，当巨轮轰然崩裂的时候，那些小物件也跟着它一齐粉碎。”^[21]（三幕三场）于是乎，同自然界异象频出相对应，丹麦政坛发生巨变、丹麦民众思想陷入混乱。非正常的政权交替、王后改嫁、群臣变节、外交危机，一切都因老国王的死随之变乱，王子哈姆莱特经历肉身和精神的放逐后，变成了历史和神话间替天行道的传奇英雄：“使我一方面自己受到天谴，一方面又成为代天行刑的使者。”^[22]（三幕四场）

原始社会里，国王被推为群体幸福的祈祷者，拥有无上的权力，同时也要承担维护人类生活和自然秩序之间的和谐之责。这种被称为“王室巫术”的非理性思维虽然不被基督教承认，却在西方文化中被暗中接纳，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常把国王视为“神的代表”，《哈姆莱特》中王子称自己的父亲是：“相貌是多么高雅优美：太阳神的鬃发，天神的前额，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像降落在高吻穹苍的山巅的神使一样矫健的姿态；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23]（三幕四场）王子的话里有私人情感成分，但处处言说着国王与神灵之间的关联。国王以神灵为模板，成为人间与神界的中介，哈姆莱特身为王子，是老国王的血脉，承载着继承大统、沟通天地之任。国王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先是被原始社会居民接受，继而被封建君主利用，逐渐形成“君权神授”学说。因此有些知识分子阐释君权的神圣性时，会不自觉地利用神秘主义思想增强君主权威。

很显然，王子心中与老王并驾齐驱的神灵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他甚至用太阳神这个极具希腊神系中神的名称来形容父亲。这段哈姆莱特在激愤支配下面对母亲赞扬父王的话，与其忧郁沉思的性格抵触，更与他放过祈祷的奸王克劳迪斯时想到的基督教诫命不符。或者说，清醒沉思时的王子自认属于基督教文化系统，而冲动高亢时的哈姆莱特却不自觉地用了异教神话隐喻。哈姆莱特的情绪就这样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波动，神秘主义命运观在其情绪波动间隙趁虚而入，使他暂时忘却基督教体系而是用神秘天命观解决问题。

《哈姆莱特》的开场是巡夜将士发现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丧命的老王的鬼魂在城外游荡：“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从街道上啾啾鬼语，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也已屡次出现了。”^[24]（一幕一场）原始人的世界观里没有想象与现实两套思维逻辑，而是在无意识中混合二者来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奥维德《变形记》里记载着人、神、动植物相互转化变形的传说，说明了欧洲先民把异常当作普通生活现象。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神话淡出人们生活，神、人之间的界限明晰，超自然现象与

人类之间的关系愈加微妙。《圣经》叙事遵照的是“人敬神—神赐福—人离神—神降祸”的模式，人的遭遇与神灵活动有关联：“缪斯女神们的队长巴库斯，将通过他的奥秘，即通过自然的可见象征，向我们中那些追求哲学的人展示上帝的不可见之事。”^[25]哈姆莱特无奈地卷入这场自然与政治的纷扰，父亲死了、母亲嫁了、王位丢了，生活极不正常。正在他疑惑难解之际，守夜的好友向他报告了老王鬼魂的事。王子想设法查明真相，心中的父子情立即成为情绪的主导，神秘思想被激活，成为与基督教信仰交锋的内在力量。这股力量同封建父子义务纠缠在一起，貌似父亲的鬼魂要求在世的儿子为自己报仇。神秘的事物总是借助于世俗还魂，它要蛊惑人心亦或启迪心智时，无法像学院哲学那样去做高深莫测的论证，而需要借助人类世俗情感的缺口做支离破碎的暗示，这些暗示又都是人们愿意相信的象征符码。作为儿子，哈姆莱特无法接受失去父亲的现实，更无法接受父亲鬼魂飘荡不定的暗示。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哈姆莱特是在神秘景象暗示下鼓起勇气去揭开父亲死亡真相的。哈姆莱特感知到了神秘的鬼魂等景象与理性生活不符时，他叮嘱守夜官兵保守秘密。

异常的自然现象与异常的政治生活同构，此时，挪威的小福丁布拉斯正在招兵买马，他想趁着丹麦王的驾崩攻城略地，浩大的声势震动了新王克劳迪斯。宇宙异常、政治巨变必然带来个人创伤，王子哈姆莱特就成为承受痛苦的人类代表。至此，自然、政治、个人的互动宣告完成。莎士比亚在三者互动中蕴藏了亘古难测的神秘思想——天人感应。欧吉尼奥·加林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中指出：“巫术和占星术的立场上设想整个宇宙都是团结和统一的，最遥远的星星的闪光也会达到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反之亦然，任何灵魂活动的颤动也会辐射到无穷的空间中去；在星星和灵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在整个生命流动的长河中，存在这相互沟通的频道。”^[26]在占星术方士看来，星象与人类灵魂的关系非常亲密，星云的变化必然带来人命运的变化甚至社会结构变革。赫勒在《脱节的时代》中也说：“不常见的恶性事件、自然灾害或诸如暴风雨等天灾和种种人祸，在莎剧中的角色看来，常常是当下政治罪恶的象征，或是即将到来的历史变革的征兆。”^[27]星象与命运对中世纪

人影响巨大，奥古斯丁还在《上帝之城》第五卷中专门批驳了星相与命运之间的关系^[28]，在基督教哲学体系视野中，天体是受造物，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和神秘（超自然）没有本质区别，神秘事情中隐藏的奥秘在神学家眼中依然是上帝意志，可以被认识。在基督教哲学家看来，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都被认为是上帝惩罚“特定民族”的手段。

文艺复兴时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期，人们冲破基督教思想的掌控，人的欲望不断升腾，再生、光明及黑暗的传说泛起。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地球形状的认知，进而怀疑托勒密体系，冲击基督教神学。星象、占卜、巫术和鬼魂都是宿命思想的表征，《李尔王》《裘里斯凯撒》等剧中多涉星象问题，在《麦克白》中更是把女巫的神秘性烘托到了极致。哈姆莱特自领“天命”为父报仇的同时要重整乾坤，这是他无法推卸的责任，他不能选择做个普通人继续返校读书，也不能继承王位施展抱负。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同时要捍卫自己的名字却必须隐藏自己的本心。“我是谁”的困惑时刻折磨着他，他既是老王的儿子，有为父报仇的义务；他又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观——良心。因此，王子陷入了罪与义的纠结：“我很骄傲、使气、不安分，还有那么多的罪恶，连我的思想里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相，甚至于我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们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29]（三幕一场）这是王子对自己灵魂失序的描述，处于两个自我的撕扯中。在莎士比亚看来“履行传统权利带来的职责，归根结底就是维护个人的荣誉。”^[30]鉴于这种荣誉观非常私密，不完成任务就无法摆脱鬼魂的纠缠，而周围的人似乎又对老王之死漠不关心，甚至认为哈姆莱特不应该那么固执地过度悲伤，否则就是逆天背理的愚行。哈姆莱特无法忍受众人的冷漠，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莠草，而整饬世界的第一要务就是除掉克劳迪斯这棵烂谷子。

莎士比亚时代，神秘思想作为一种亚文化从民间传到学者圈，马洛甚至还改编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来源庞杂，神秘思想作为重要的隐线引导着作者创作，对丰富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鬼魂等神秘景象的出现

其实是哈姆莱特自己情感矛盾的一个侧面，他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死母嫁的事实，又不能起身反抗新国王统治。封建文化体系中父子情感与义务借助天象异常和鬼魂来传达，更何况还有一个榜样小福丁布拉斯在大张旗鼓地宣称为父报仇。神秘思想影响下的哈姆莱特在对自己使命认知上更加深刻、清醒，如果说基督教伦理让他复仇更深沉、理智的话，那么神秘思想则让他复仇更坚决；两种思想混合后导致了王子的认知错乱，行为乖张。

三、人文主义“命运观”规训

莎士比亚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的“天命观”在古典与现代中含英咀华、兼收并蓄，突出人的力量和价值。封建“天命”和神秘“天命”双重文化也未能鼓动哈姆莱特不顾一切去复仇，他始终相信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由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理性”构成，它视“命运”与“德行”并行，形成了具有人间情怀的“人格化”命运观。如前所述，封建命运观影响式微，希腊命运观被改造，神秘命运观被怀疑，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命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它植根于人性，对命运的求索其实也是对人性的探寻。人文主义者通过审判自身，叩问无法企及的命运之神，既是古希腊命运观的回声，又远超出古希腊对命运的理解。

但丁在《神曲·炼狱篇》中借维吉尔之口说：“不要再期待我说话、示意了；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正直、健全，不照其所欲而行就是错误；因此我给你加王冠和法冠宣告你为你自己的主宰。”^[31]语言既有指示功能，又有遮蔽和误导的可能。哈姆莱特拒绝封建义务的宏大叙事的束缚，拒绝神秘启示的象征暗示，他赋予了奥古斯丁“自由意志”学说新的内涵，自由不是围绕上帝而选择善恶，而是围绕本意去决定，这样人就自我加冕为皇帝，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哈姆莱特以探求“我是谁”的方式去辨析命运，他在鬼魂话语启示之后便不再与鬼魂沟通，复仇还是忍受的选择需要“自我”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自我是智识和政治都能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只能从经院哲学家的口中听取只言片语就敬若神明的野蛮人。因此，王子对老王鬼魂的话半信半疑：“我所看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有这样一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

的力量：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想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凭着这一本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12]（二幕二场）命运启示面前，王子并不是盲目行动，文艺复兴时期是人全面觉醒时期，并不只是欲望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对人主体性的发掘。天命由一种支配人生活轨迹的异己力量，悄然演变为人的自主意志。由此，哈姆莱特“重整乾坤”的复仇变成了为普通人的理想生活而做的道德选择。德行、智慧通过“戏中戏”的设计在哈姆莱特身上得以彰显，王子复仇中的一系列言行都呈现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特征。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基督教和世俗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产物，认为人的灵性和基督教的教诲可以交融，人的尊严、自由、幸福也是基督教的核心主张。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否定了奥古斯丁认为人被自由意志支配便无法行善的说法，认为人类生存困境及其摆脱困境的欲望与上帝恩典之间有紧密关联。在哈姆莱特没有将宗教与人性统一之前，鬼魂的话和宗教教义交替在他心中交替萦绕，他时时思虑、事事延宕。他痛苦地背负着探索人性深度的重任，复仇、重建伦理的前提就是要重构自己。

莎士比亚天命思想也同宗教改革背景关联，宗教改革对人的解放起了巨大作用，思想解放冲破的不只是根深蒂固的陈腐习俗，运动的实际得益者也不仅限于贵族和文人，它还还为普通人解除一系列不堪负重的责任。“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神更是飘忽不定、神秘莫测。神在自然、人间之中，可自然却不告诉你任何东西，在人们的言行里也没有任何预示。神是一种‘天道’、‘命运’，甚至可以是一种‘鬼魂’。《哈姆莱特》里就有一个罩着‘永恒的神秘’鬼魂。”^[33]顺从自然成了新的信仰，违背自然就会犯错，自然意志没有上帝诫命明确，自然准则是什么却莫衷一是。教会说一切自然都是上帝创造，人的身体和灵魂同样来自上帝，完美的生活就是顺从上帝意志。信奉“自然权力”者则声称自己说是最优秀、最合适的权力继承者。莎剧浓墨重彩地描绘两种权力的冲突，没有哪一种得到一致认可。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在此背景下应用而生。

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兴起与古典主义复兴息息相关，当各种怀疑主义、神秘思想以文艺形式大行其

道之际，马丁·路德、伊拉斯谟等人默默地开启了思想革命。他们都饱受宗教教育，对遥远的彼岸世界十分虔诚，同时他们又被教会的浮华堕落刺激，渴望教会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的改革诉求截然不同，后者相信理性高于信仰，崇尚宽容和谐、反对暴力改革。这种温和方式显然无法在英雄气息浓厚的时代实现，因而它成了宗教乌托邦。伊拉斯谟相信人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统一：“人们可以这样解释自由意志……它把刺激灵魂的第一推动力完全归结为神的恩典，但又主张在不否认神赐的恩典时，仍给人们的意志留下特定的位置以阐明事实。”^[34]

路德认为传统神学的正义只有简单的奖罚，即便是内心福音渴求也是形而上的对人要挟，如此，上帝的威严变成了威胁，路德提出来“因信称义”的主张来安慰内心与外界的冲突。路德虽然承认上帝权威，也认为理性的人会推导出上帝，但是他认为上帝不一定就眷顾人。路德开始求助神秘主义思想，用灵性来引导人们去接近上帝。如此，路德把上帝观念从经院哲学中剥离：“上帝公义并不是指使上帝自己成为公义的公义，而是指他使我们成为公义（称义）的公义，但这只能在福音中通过信仰所发生的。”^[35]

伊拉斯谟和路德之间辩论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发展的两个方向，路德思想被广泛接受之后，人文主义者又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论战。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学家，他认为命运不仅对个体生命有强势统治，而且影响国家兴衰，无论是埃及法老还是罗马执政，都在命运的掌控下交接王冠，好运的国王必然带来民族繁荣，厄运的国王则面临政权危机。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仍然没有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36]他鼓吹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削弱天命对人事的影响力，他视自由意志和命运为成功的两翼，人不能去从命运；“当我们的力量没有做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37]因此，一个优秀的君王要学会观察时事，并充分利用时事、掌控时事。哈姆莱特显然受马基雅维利命运观影响，他对吉尔登斯吞说：“命运……她本来是个娼妓。”^[38]（二幕二场）马基雅维利还把命运比喻成“洪水”等自然现象，但他又明确说洪水泛滥并不等于人不能修筑堤坝，展

现出了他对命运的预判能力和掌控的信心。人如果不征服命运，那么命运会变本加厉地残暴，随心所欲地支配人。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39]（三幕一场）反抗和忍受两种荣誉观的冲突是命运观冲突的延伸，人的能力、德行和世界的斗争是王子理解危机和人类处境的基本视角。人文主义者把“好人受苦”的原因归结于命运捉弄这一古典信念，并附加上“勇者为王”的信条。命运常常在人力受限制的地方示威，命运成了基督教和古典哲学争夺的主要阵地。

莎士比亚是一位诗人哲学家，既能看清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政治问题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案，又能洞悉其时代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他根据英国现实问题而写作，却不限于为英国政治开出准确的良方。他对现实的观察并非乌托邦想象，而是以人类生存和人性为基础，有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和深切的宫廷政治感悟。他幼年在黑死病肆虐中幸存，多年混迹于伦敦底层，一步步成为剧团老板，深知人世冷暖、命运无常。后来，他同伯爵关系亲密，与伊丽莎白女王互动频繁，深知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对生活的影响不亚于神秘莫测的自然风暴。命运体悟和人类根本处境决定了莎剧“命运观”的双重处境：经验传达和哲学导向，该品格在《哈姆莱特》的政治伦理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同众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哈姆莱特特别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40]（二幕二场）此处王子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他冷峻地指出现实已腐朽到需要卓越英雄拯救的处境，该苦难处境比希伯莱人在埃及流亡更甚，因为现实中没有首领，好人受打击、平民遭掠夺，丹麦被命运抛弃了。哈姆莱特不仅呼吁巨人英雄，而且企图在绝境中为民众开出救世良方，这正是哈姆莱特理解命运与政治的思维逻辑，既与基督教政治蓝图有出入，也同古希腊政治理想有差异。

在希腊神话中，命运是由命运女神掌管，既支配人又支配神，具备不可抗力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把世界描述为一个缺乏永恒规则的存在。基督教的命运观有明确的预定性，善良的上帝会建设新

天新地，人只需要按照基督教伦理生活即可。然而人类历史进程却与希腊命运女神和基督教上帝的预设均有出入，或者说命运女神的狂暴与温顺同在，而上帝的缺席与关怀并存。命运在历史上具有不可预测性，人文主义者强调用德行和秩序去对抗命运的偶然。

其实对莎士比亚而言，他不希望从周遭的生活上升到循规蹈矩的基督教王国。他不相信命运会被征服，不相信国王会独立于命运，国家和个人都会面临难以预测的变化；同时，他又不乞求用基督教的天国信仰去安慰被无情命运支配的大众。他认为人美好生活的愿望实现与否取决于人的德行，智慧和强壮是对抗命运的重要助手，个人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命运的奖赏，而是超越命运的控制。由此，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必然转入内心沉思、追求行为高尚。

结语

《哈姆莱特》中的命运观有浓重古希腊罗马命运观痕迹，又带有神秘主义气息，在人类世界舞台上，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成败的往往不是对错，也不是真理，更不是价值的大小，而是时空条件限制。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时代，用超群的智慧容纳多元思想，创造了精彩绝伦的戏剧诗篇。哈姆莱特承认封建父子伦理中儿子的责任，一心一意要为父报仇，甚至把个人悲欢与全社会关联起来，但他拒绝被道德绑架，不愿稀里糊涂地成为异己力量的玩偶；他对鬼魂提供的信息半信半疑，注重理性分析，拒绝盲从神秘，在责任和命运面前始终保持人的尊严；他信奉基督宗教，却重新阐释自由意志，既不让自由成为私欲的帮凶，又赋予自由以智慧品格，将命运当作自由的勋章。王子在多重“命运”责任信息中左突右撞，他不是选择一种责任去践行，而是逐一进行形而上思辨，终于陷入人和“命运”关系的精神困境中而“延宕”。

参考文献：

- [1] 高万隆：《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 [2] 李赋宁：《欧洲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6页。
- [3] 丛丛：《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 [4] 丛丛:《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 [5]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2页。
- [6] [法]马克·布鲁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9页。
- [7] [法]马克·布鲁赫著,张绪山译:《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6页。
- [8] [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 [9] Evans — Pritchard Edw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60, p. 150.
- [10]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64页。
- [11]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96页。
- [12]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49页。
- [13] 张雪梅,罗益民:《自由意志的“哑谜”: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反加尔文主义”倾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第201页。
- [14]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03页。
- [15] 三自爱国委员会:《马太福音》26:39,中国基督教协会,第35页。
- [16]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30页。
- [17]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95页。
- [18] [奥]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8页。
- [19] [意]欧吉尼奥·加林著,李玉成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页。
- [20] [法]安德烈·洛朗著,戴侃译:《哈姆莱特与神秘思想》,《第欧根尼》,1988年第1期,第43页。
- [21]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47-348页。
- [22]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55页。
- [23]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52页。
- [24]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282页。
- [25] [意]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著,顾超一等译:《论人的尊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 [26] [意]欧吉尼奥·加林著,李玉成译:《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8页。
- [27] [匈]阿格尼斯·赫勒著,吴亚蓉译:《脱节的时代——作为历史哲人的莎士比亚》,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 [28]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吴飞译:《上帝之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7-179页。
- [29]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31页。
- [30] [匈]阿格尼斯·赫勒著,吴亚蓉译:《脱节的时代——作为历史哲人的莎士比亚》,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
- [32] [意]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炼狱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67页。
- [32]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327页。
- [33] 周春生:《文艺复兴时期人神对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 [34] 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宗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9页。
- [35] 刘友古:《论伊拉斯谟和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7页。
- [36]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页。
- [37]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8页。
- [38]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 [39]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30页。
- [40] [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作者简介:张松林,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 教学天地 ●

基于 OBE 理念的高校教育教学

综合改革研究与实践

——以商丘师范学院为例

□ 郭文佳

OBE 理念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反向组织、实施和评价教学活动，实现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基于 OBE 理念引领下的专业教育教学从理论设计到实施过程，都强调了人才培养过程是多种关系的互



相支撑。商丘师范学院从 2019 年开始基于 OBE 教育理念，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着力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生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不断深化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一、召开全校教学工作大会，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目标和思路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实施意见》要求，为适应新时期教育教学发展需要，商丘师范学院基于 OBE 理念，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全面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以专业认证为抓手，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着力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生态，调整优化现有专业结构，厘清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课堂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2017 年，学校召开第三次全校教学工作大会，确定了以完全学分制为核心的教学工作思路。在完全学分制实施的基础上，2019 年，学校召开了第四次全校教学工作大会，确定了学校基于“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狠抓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持续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此次会议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划了学校下一阶段的教学工作目标任务、改革路径和保障措施。

按照 OBE 理念，学校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按照以下三个原则开展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基于学生中心，全面发展，促使学生实现专业成才；要基于服务需求，成效导向，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和结果满意度；要基于完善机制，持续改进，形成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强化质量评价保障与反馈机制。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学校转型发展定位，按照对标建设、问题导向、集群发展、产教融合、继承创新五大原则，出台《关于制定 2020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内容，完善“产学研创相结合、教学做练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就业能称职、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修订最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人才培养需求，在人才供给侧进

行深化改革。按照学校六个应用型专业集群，要求集群、学院、专业三个层面召开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研讨会，明确了各个专业认证国家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并就集群内课程版块、学分互认、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具体问题开展研讨，设计从培养目标到毕业要求，从毕业要求到课程体系，从课程体系到课程目标，从课程目标到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的多层次关联矩阵。

二、多部门联动，将 OBE 理念落实到教育教学改革各环节

根据“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教育理念，商丘师范学院着重在重构课程教学体系、完善课程教学大纲、更新课程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设计，要求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要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并在各环节对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形成有力支撑，保证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各环节呼应。

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四个回归”和“两性一度”的金课要求，要提高本科人才培养标准，切实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必须在课程建设提高要求，将课程建设作为切入点。基于“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将课程体系重构、教学大纲修订与培养方案制定同步实施，明确指出课程大纲修订要坚持符合培养目标与整体优化原则、以学生为本与突出应用原则、反映学科、行业发展与改革创新原则、课程考核精细化科学化原则，要基于深度整合课程内容、提高课程效能，将批判性、创新性思维融入专业课程，深度整合课程内容，打破教材体系，让课程真正做到为实现毕业要求和培养目标而服务。

全面提升专业教师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认识。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层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大纲，开展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遴选系列工作，建设了一批省级、校级课程思政样板课程，选树了一批课程思政教学能手，衍生了一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全校课程思政建设，真正将课程思政落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确保课程思政教育落到实处。

持续推进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按照学生中心、教师主导，课前、课中、课后一体化设计的要求，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改变了原有老师作为课堂

主导的知识权威角色，在课堂创新、学习模式、评价模式、课程资源等方面更好的呼应“00后”为主体的当代大学生需求，逐步改变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制定了学生“跳一跳”才够得到的课程要求，让学生忙起来，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课程供给层面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提升学生学业挑战度，督促学生强化学习内在驱动力。把学生从孩子转变成年轻的成人、从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学习、盲目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从而释放师生的潜力和能量，实现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根本、以学习为中心、以兴趣为导向的校园环境。出台了《课程教学范式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对课程教学范式改革所涉及的理念基础、模式选择、内容途径、运行机制等提出具体的对策，同时发挥课程示范作用，营造全校教师参与课程教学改革的机制和氛围。共立项建设课程教学范式综合改革项目 318 门课程，完成结项 93 门课程，立项建设课程教师已完成全校公开课汇报 500 余次，形成课堂教学改革公开简报材料 30 余万字，大力夯实了以强化学生内在驱动力，提升学生学业挑战度，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课堂教学创新。

以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推进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平台建设，升级课程网络平台，鼓励教师采取“线上学生研学，线下教师导学”同步推进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打造校本在线“金课”。依托于学校智慧校园建设平台，强调“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前、课中、课后一体化”的教学思路。为学生提供了“课堂+微学习”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与实践能力，创设了沉浸式互动环境，切实提高课堂知识要点和信息技术运用相结合的“知行融合”，鼓励学生以“项目式”“小组式”“研讨式”等多形式学习，构建了形成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智能化学习新环境，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课堂学习、课程学习与学习环境的联动供给。

三、构建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教学质量监督、服务、保障体系

为使 OBE 理念下的教育教学改革落到实处，强化各分解环节有序运行，商丘师范学院强化条件保障建设，在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场景改造、教学监督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从而有效保证了教学改革的稳步实施。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要求, 商丘师范学院始终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与核心标准, 出台了《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 同时加强教师培训进修, 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出台《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等系列保障性文件, 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行动, 构建师德师风、理论学习、技能培训、素质拓展四位一体的教师教学发展体系, 构建新形势下常态化、制度化、系统化、长效性教师教学发展机制。基于 OBE 理念, 引导教师教学从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和学习效果为中心转变, 从以教师付出为中心向以学生收获为中心转变, 从以“注水式”教育为中心向“点火式”教育为中心转变。

强化教学监督管理, 完善质量监控体系,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引导教师潜心育人。完善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不断发现“优课名师”和“免检教师”。建立教师行为约束和退出机制, 逐步淘汰教学不投入、育人不负责的教师。借助智慧化教学管理平台实现教学质量监测。教师可通过智慧教学系统搜集学生学习过程的行为数据, 适当地进行干预和引导, 促进教师和学生行为向规范化发展, 保证智慧化教学管理系统顺利运行。通过智慧化管理平台变事后预警为实时预警。学生课上表现、知识掌握程度、学习成绩等方面将以数据形式进行采集、预测和评估, 实时为教学过程、行为优化和修正提供预警体系, 建立便捷高效的智慧教学技术支撑体系, 提供多渠道技术支持, 随时解决师生遇到问题。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质量保障“闭环”评价体系, 确定学生在教师评价中的中心地位。围绕学生学业获得感建立具体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 提高教学评价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真正做到“以评价促发展”“以督导促发展”“以培训促发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围绕学生学习效果, 培养学生自我评价能力, 真正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和成果, 通过学生评价为主、学校、学院、教研室互评, 形成全链条多维度的教学质量评价和反馈体系, 全面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改善教育教学场境, 服务教育教学改革。制定《教学新场景建设三年实施规划(2020-2022)》, 投入 3000 余万元建成了含 200 余间多类型教室、3000 余平方米互动式交流空间的智慧教学环境建设, 实现了教学与资源、信息技术、教学环境的融

合。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平台建设, 推动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创设沉浸式互动环境, 提高智慧软环境和智慧硬环境之间的“物-物”协作水平, 切实提高课堂知识要点和信息技术运用相结合的“知行融合”, 构建师生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智能化学习新环境。

改革评价机制, 完善教师管理。建立以师德师风、教学质量与教学服务为核心的教师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构建以毕业生调查为主, 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效果评价、过程评价等多维一体的教师评教系统。改革奖惩机制, 实施绩效管理。按照评聘分离、动态考核、多劳多得、高绩优酬原则, 改革人事分配制度。此外, 商丘师范学院还设立“教学奉献奖”“校长教学质量奖”“青年教师教学奖”三大教学奖励,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 推动教师教学更加投入, 让潜心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扬眉吐气, 真正落实教学优先, 教学神圣。同时, 出台了《教学成果奖励办法》, 重奖教学一线优秀教师和优质教学成果, 构建完善的教师教学激励机制, 引导教师潜心育人。

理顺学生后勤管理体制, 突出学校育人主体职能。完善学校基础设施设施,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环境氛围; 强化学生后勤服务队伍建设, 提高学生后勤管理效能; 创新学生后勤管理机制, 提高公共场所资源使用效益; 健全后勤管理考评机制, 提升学生管理服务水平; 搭建信息交流反馈平台, 促进后勤管理质的飞跃。以大学生需求为关注焦点, 加强“以学生者为中心”的管理与服务建设, 切实建立新型高校后勤管理与服务新体制、新机制, 确保大学生学分选择、学分修读及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全面成长成才需要。

商丘师范学院根据 OBE 理念, 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教学大纲、重构课程教学体系、更新课程教学内容, 优化课堂教学设计, 深化课程教学范式综合改革, 持续推进课堂革命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强调了教学实施的目标是通过完成高等学校教育, 培养学生毕业后能胜任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 以社会或行业需求为依据反向设计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使学生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现实需求相匹配, 对解决高校毕业生个人能力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棘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郭文佳, 史学博士, 商丘师范学院副院长、人文学院教授。)

初中**国学课程**的学理分析与教育策略

□ 张甲子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及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大致指明了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的理念。两者对国学课程的开发建设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但因两者并非课程标准，故不能以其作为国学课程实施及评价的准绳。初中国学课程如何建构，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学课程如何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非语文课程的附庸？二是如何通过国学课程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三是如何预设具有可行性的国学课堂？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并尝试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一、国学课程体系的确立

国学课程与语文课程有很深的近缘关系，两者都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学科建设角度看，语文是在教育的现代化演进中，界定了独立的学科性质、开拓了完整的内容框架；又在多次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构建符合时代的知识体系，不断定位学科标准。国学在高等教育中率先提出，目的是以现代去诠释传统，并试图扭转分科治学的弊端，不断争取学科的规范化。从基础教育出发的语文课程与从高等教育出发的国学课程，两者的学科建设路径具有背反性，语文课程强化了学科分类，国学课程弥合了学科差异。

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置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以7岁以上者入学，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中学堂学制5年。高等小学堂大致相当于现行的初中7-9年级的教学阶段，学习科目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地理等。中国文学即语文课程的雏形，“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主要教学任务是熟悉、探究各类文章及诗词歌赋的作法，有别



于以《诗经》《尚书》《仪礼》《周易》为必读书，兼授程朱注解，以“先明章指，次择文义”的读经讲经；亦有别于“以讲《四书》之要义”“就身心切近及日用实事讲之，令其实力风行”“兼令诵读有益风化之诗歌，以涵养其性情”的修身课。

1912年公布的《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将中国文学改为国文，保留了修身，但取消了读经讲经。“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文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智能。”其教材内容“就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及其他生活必需事项，择其富有趣味者用之”，要求围绕文选的讲授，培养学生的国文能力。

1932年颁行了专门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目标设为“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之能力；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大纲分精读、略读的阅读与文章作法、作文练习的习作两部分，以此确定了培养学生读解文章、创作文章的教学目的。

从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与《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到1962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到1978年、1980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6年《全日制中

学语文教学大纲》、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等，皆以纲要方式划定了语文课程的内容及范围，试验了多种知识体系的排列方法。语文课程历经了从简单到具体、从分散到整合的标准化进程。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肯定了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创见性的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更完整表述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最后都明确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将口语交际能力、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体系化，并复合为言语能力。人文性拓展了语文课程的范围，将举凡道德观念、思想精华、美感意蕴、文化传统等都涵盖其中。

目前已全面推行的“部编本”语文教材，将人文性定位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只是语文课程的任务，也不是语文课程能全部承担的。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阐明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推进方式、支撑体系和条件保障，^[1]具体要求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将其贯穿于教育始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共同任务，要在多学科的课程建设中强化，既包括语文、历史、政治、地理，也包括书法、绘画、音乐等，甚至在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中亦要有所渗透，同时需相应的社会实践，构建互为补充、相互协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格局。

在多学科之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一以贯之的学理体系。国学课程即可有效弥补因学科课程

差异而造成的不足。“国学”本就是为了强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精神、文化自信而产生的，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与学术方法的总结，^[2]特点在于整体性、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这样的双重定位下，国学课程跳出了现有学科体制的缺陷，旨在以几千年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在体系为准绳，在学科交叉间，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多元互补。

由此看国学课程体系的确立，要点有三：

一是从零散走向整合。在一门课程中，多个知识点通过课程讲授形成知识面，国学课程则将相关课程的知识面通贯起来，致力于形成立体的知识架构，如语文的文言文阅读与中国古代史结合，语文的现代科技类文章阅读与地理、生物知识的融合，不再局限于知识的细节划分，而是超越其上的融会贯通。

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任何课程都要跟随时代实现知识的更新。国学课程体系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接纳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渗透，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名胜古迹、民间技艺、民俗活动、节庆礼仪等，艺术创作的书画、音乐、舞蹈及戏剧等，日常生活的游戏等，唯有让文化活起来，才能持续传下去。

三是从当下走向长远。尽管国学课程体系要针对当下情况具体分析，但其课程精神内核是富有生命力的，是能够与时更迭的。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更要百年树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这必然使得国学课程的体系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众人的共同努力。

二、国学课程与核心素养的形成

核心素养是舶来品，是在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下，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层次的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美国、俄罗斯、日本等，都积极参与讨论了的多维度、多功能的教育理念。因视角有异、情况不同，目前对核心素养的表达方式是多元化的。

我国现行得到了绝大部分人认同的核心素养，

讨论的是教育培养人的目的和方法，总体聚焦于立德树人，具体细化为课程改革。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要求，即“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要求“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将“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和“修订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作为同样重要的工作。

2016年2月，中国教育学会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说明“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认为核心素养是所有人最关键、最必要的共同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表现。核心素养兼具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可通过教育形成并继续得到发展，具有阶段连续性与综合应用性。

对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强调整体性的核心素养体系，一种强调分学段的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体系是教育目的的体现，既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及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建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及推进教育问责的基础和依据。这种顶层设计，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大方面，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创新实践六项指标，再下设十八个基本要点。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在各学科、各学段的具体化。现已分出的学科有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分学段是强调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科核心素养的不同水平。

核心素养体系与学科核心素养不能分而论之，两者相互包含且互相促进，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首先是上位与下位、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核心素养体系是所有学科核心素养的提炼与总结。其次是目的、方向与手段、途径的关系，学科核心素养的讨论，必须以核心素养体系为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要通过跨学科、跨学段来整体实现。核心素养体系同时兼顾所有，是知识、

能力、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整合，各学科在体系内互融互补以达到横通；学科核心素养则是各学科在各学段内合理设计，以达到纵通。

国学课程要在核心素养的形成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就要兼顾横通和纵通。从横通的角度看，国学课程应是语文、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的有益补充；从纵通的角度看，国学课程虽没有形成严谨的学科概念，但并不代表没有学科属性与学科意义，其可以让学生在课程的经历与体验中，获得独特的视角、思维的策略与发展的方法等。

国学课程能在不同侧面和多重维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一是拓展文言思维。语文学科素养有语言建构与运用，要求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的言语经验，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能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这是针对现代语言体系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国学课程更强调的是文言思维。文言思维从考察古文字的变化、音韵的发展、词汇的变迁、语法的差异中得出，在对文言知识习得与巩固的基础上，达到简单的语用。这不仅能辅助语文学科，也是历史学科必需的。

二是养成道德心性。国学知识体系通过对学理命题的总结与历史经验的积累，向学生展示了个人如何发展、心性如何修炼、人格如何修为、境界如何提升的途径。核心素养所要求的，就是从知识到能力再到人生发展，通过道德心性的锤炼，由身心关系学会面对自我、由人伦关系学会人际交往、由社会关系学会思考人生价值、由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社会的建构，这些是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曾开设专门的修身课程，现行的语文、政治、历史都只能承担其中的一部分，北大国学课程能更好整合，以促进社会德育的培养。

三是加强审美素养。审美素养既有感性特征，也有理性成分；既表现为情感态度和精神气质，又表现为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审美素养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体系能够完全表达的。或者说，审美蕴含在各种层面，其是隐性的，美育是需要渗透的。国学知识体系具有包容性，国学课程可容纳的内容既细又多，有古代艺术的审美形式，如诗歌、书法、美术、音乐、建筑；还有古代生活的的情趣，如饮食、服饰、日常器物等。这些内容在别的学科或有提及，

但不成系统，国学课程恰好可将这些知识缝隙弥合起来。

四是传承文化精神。国学课程使学生受益的，不仅是知识的更多增长，更是文化的全面熏陶。国学课程的重点不在知识点，而是包括知识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课程不局限于让学生被动学习和掌握现有的知识体系，而是在选择与继承、包容与借鉴中，让学生主动关注、参与到文化中来，凝聚文化的情怀。国学课程对学生核心素养的积极促成，不是某一点单独试行，更不是一个一个目标分别实现的。国学课程对学生思维的拓展、心性的锤炼、美育的熏陶及文化的深层浸润，皆是从知识到能力、到方法，再到情感的综合推进。

三、国学课程的内容设计

国学课程离不开国学教材的精心设计。现有的适用于初中的国学教学在体例上有多种类型，以综合性教材最适合国学课程的建构方向。国学课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学教材的编写，需从庞大的材料中优中选优，在选材上敢于跳跃，在专题上敢于出新，并保证教学内容与模式的逻辑性、系统性与可行性，还要兼具独创性。

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国学读本》为例，首先关注学生的自我认知，借助历史故事，让学生知晓人何以能群、人何以能分、人何以能断、人何以能成。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长为真正优秀的人才。其次关注学生的心性修养，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向学生渐次讲授家国情怀、社会风尚、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人物、事迹、论述，以使学生修养成具有宽广格局、高远境界、开阔视野的君子。再次关注学生的理性思考，兼及多学科内容，让学生了解古人探求世界、理解社会、认同群体、思考人生的方法，以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些又如何成为了中华文明进步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

通过选取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特质的篇章，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道德理念与人文精神。在体例上延续“课文+注释+课后练习+单元训练”的传统教材模式。阅读提示提纲挈领，通过对文选的讲述，既能提升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更要注重人文性，涵养学生心性。其他更多内容在多个环节渗透，拓展学生的文

化视野，促进人格完善，最终凝聚为核心素养。这样的设计不仅能有效补充现语文课程的某些缺失，更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乃至音乐、美术课程的高墙壁垒，将不同课程的视野和方法融合起来。

国学课程的内容不是各学科相关课程的简单拼盘，其设计了整体的课程体系，每一课都有讲授的重点，围绕着设定的中心展开，教师要对课堂教学有内容的规划、过程的设计、效果的假设，然后以合理的过程、可行的评价保证质量。

如“孔子问礼”，礼通过有礼度的礼仪、礼器形成礼义，礼是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础，也是达到儒家提倡的“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但此课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老子对儒家之礼的评判，“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儒家站在人中看人，道家站在自然中看人，这是不同的。“孟母三迁”，孟母教子以境教，认识到了环境会影响到人的成长，这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的择友观，告诉学生要亲近益友，远离损友。故事链接中的“仁者无敌”，是孟子对孔子为人以仁的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发展。课程内容在交叉中渐进，不能完全以课时切割，应注意到知识逻辑的关联。“读书之法”，教给学生圣贤读书的经验。选文中讲了端正的读书态度和具体的背诵之法，加上知识拓展的朱子读书法，即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方面，这些是此课的重点。相关内容可灵活增减，再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学生对读书法有主动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再如“王祥事母”，主题设计以“孝”为中心。通过王祥的故事，引起对孝的讨论，再通过黄香的故事，拓展到孝的精神。首先要感恩父母，从身边小事做起，感谢父母的辛劳付出；其次是仁爱之心的延展；最后要成就事业，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这是到了初中阶段必须要渗透进学生品德中的内容。“王览友悌”，主题设计以“悌”为中心。无论是王祥、王览还是大苏、小苏的故事，展现的都是兄友弟恭的手足之情，向学生说明了家庭关系和睦的重要。在家为孝悌，出门善交友，四海之内皆兄弟，社会秩序的良好，有赖于群体认同的形成。这是让初中生的认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关键。“郗公含饭”，郗公在朝不保夕中尽力抚养侄儿外甥，本课的重点不在讲述如何齐家的故事，而是向学生说明社会关系的最高理想。从家庭、家族角度看是

天下为家的小康，从邻里、社会角度看是天下为公的大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初中生在修身之上，再有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再如“桓公东游”，通过管子、桓公的对话，提出对国君“以重行畏涂”的期望，说明“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的治国理念。君子出游非为玩乐，体察民情是治国之策；亲民爱民是治国之本。这样有较深历史背景的课程内容，可选择先以文化常识中的人物故事切入，更易于接受理解。“徙辕立信”，信用是成就事业的基础，需要一点点积累。做人如此，治国亦如此。这是法家大力提倡的，法家学说的核心，即在于建立一套公平的运行秩序。名言警句精选了多条法家典籍的相关内容，有时文选较短较浅显，可以设置多个课程环节，对内容进行有效补充及深化。“焚书之策”是对焚书坑儒的理性思考。历史课程亦有相关内容，但更重

陈述历史事实。这里强调的是法古与法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所有的事物都兼具两面性，究竟以什么标准评判是非，究竟以什么态度去接纳历史传统。这类问题有助于养成初中生应有的历史观，并形成相应的思维能力。

对国学课程内容的把握，要以提升学生文化认知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为要。在预设中切忌过深过高，要考虑到初中生的学力；在讲授中切忌封闭僵化，要努力引导学生的主动发问与思考；在评价中切忌流于形式，要渐渐能超脱在应试之外，形成有教学的创造性转化、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的课程体系。

（作者简介：张甲子，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学术动态●

杨金华的博士论文获第六届胡适研究一等奖

2021年8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官网发布消息，公布了第六届胡适研究奖学金得奖公告。我院青年教师杨金华的《现代中国“南港学派”的兴起与传衍（1955—1985）》荣获一等奖。“胡适奖学金”由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在中国大陆的版税提供，迄今已举办六届。此次获奖不惟是对其过去数年来学术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样体现了我院各级领导对青年教师的支持。今后我院将继续增加对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他们再创佳绩，在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中有上乘表现，共同推动人文学院科研工作及未来各项发展再上新台阶。

常丽洁博士、陈功文博士分别荣获2020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21年8月19日，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网发布“2020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拟奖励名单”。此次我校共获批各类研究成果奖五项，我院获批两项。常丽洁老师的《从手稿看朱自清拟古诗词的写作》摘得优秀研究论文二等奖，陈功文老师的《文化商丘·汉梁文化》荣获优秀研究著作三等奖。

上述优异成绩的取得，不仅充分展现了两位老师深厚的学术研究造诣及对学术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而且与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今后，我院将继续加大对学院中青年教师的的支持力度，为他们营造一个蒸蒸日上、乐于钻研学术的良好科研氛围，力争今后在每次国家及省部级各类研究项目申报、各种研究成果奖的评选中均有上乘表现，以冀为学校“十四五”规划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 学子文苑 ●

试论《呼兰河传》儿童视角下的诗化特性

□ 韩 灵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其后期的作品，许多评论家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很早以前张宇凌就对其儿童视角做过阐释，在《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一文中，张宇凌主要论述了儿童视角反映了萧红创作中一种或许无意识的技巧，更体现了一种支配性的创作精神。柴平的《论〈呼兰河传〉的儿童视角》一文则探讨了儿童视角的优点，她认为儿童视角是一种健康的文学处理方式，因为它纯洁了文学内容，使人获得清纯的审美感受。我的这篇论文是想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儿童视角的运用所产生的叙事特征、美学意义、及其缘由。我试图更深入地解读《呼兰河传》的诗化特性、诗意之美，解读儿童视角建构下的文本的叙事特征及其美学意义，探讨萧红采用儿童视角呈现诗化特性的主观因素。

《呼兰河传》是一篇回忆体的小说，是成年的萧红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生活在现代都市的萧红对乡村生活的回忆，是永远浸透着悲凉意韵的萧红对“温暖与爱”的“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作品采用儿童独具的视角，以一个单纯、天真、顽皮的小女孩“我”所特有的好奇的眼光打量陌生的外在世界，以一个幼稚、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作出情感评价。在此儿童承担了叙事者的职责，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叙事策略进入了叙事系统，作品呈现出一种“儿童式的鲜明”的诗化特征。

一、诗化特征

《呼兰河传》的这种鲜明的诗化特性的呈现，在文本中具体表现在儿童形象的介入，儿童色彩的覆盖，儿童口吻及儿童语言的运用。

一旦儿童视角建构了叙事文本，那么儿童就担当了叙事者、聚焦人物，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则是

以儿童的眼光、声音来叙事，而特定的儿童这一叙事者，常常是活泼天真、好奇顽皮的聪明小儿形象。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初长阶段，还保有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熏染的生命原初体验”，^{[1](p102)}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观察、感受是稚拙的，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无法也不会做出理性的判断。正是这种成人的理性的缺失而使得儿童这一形象单纯可爱，使得“儿童的本质是诗的，诗的本质是儿童的”。《呼兰河传》中的儿童形象正是这样一个诗味盎然的稚拙执拗、天真而又无赖的小儿形象。

“我”因“吃鸭子的印象非常之深”，还想再吃，“可等了好久，鸭子再不掉到井里”，于是“我拿了秫秆就往井里赶，可是鸭子不进去，围着井口转，而呱呱地叫着”天真幼稚的行为举止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正在吵吵叫叫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你在干什么？’我说：‘赶鸭子，鸭子掉井，捞出来好烧吃’。祖父说：‘不用赶了，爷爷抓个鸭子给你烧着。’我不听他的话，我还是追在鸭子的后边跑着。祖父上前来把我拦住了，抱在怀里，一面给我擦着汗一面说：‘跟爷爷回家，抓个鸭子烧上。’我想：不掉井的鸭子，抓都抓不住，可怎么能规规矩矩贴起黄泥来让烧呢？于是从祖父的身上往下挣扎着，喊着：‘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祖父几乎抱不住我了。”^{[2](p276)}“我”与祖父的对话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在“我”纯真简单的思维里只有“鸭子掉井”才能“捞出来好烧吃”，“抓都抓不住”的鸭子是不会“规规矩矩让烧的”，所以“我”一定偏执地“我要掉井的，我要掉井的”，这样一个顽皮甚至有点顽劣的儿童身上折射出诗性化的“纯净透明”，其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有诗一般的情趣。由此，儿童视角的选择所固着的儿童形象，具有诗意的美，溢散出鲜明的诗化特性。

儿童形象的塑造使得文本呈现出浓厚的儿童色

彩。高尔斯华绥说：“儿童的眼睛是玫瑰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的，《呼兰河传》中的“我”的世界是“金色的蜻蜓，绿色的蚂蚱，嗡嗡叫的蜂子满身绒毛”，“花园里面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红、绿鲜明的颜色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极符合孩子的视觉思维，一切在他们眼中都是鲜艳的、明亮的。而在文本表述内容的选择上，也凸显了儿童色彩。《呼兰河传》中的“我”表现了对储藏室的好奇及探险的快乐。“我常常趁着母亲不在屋时打开门进去。我觉得这储藏室很好玩，随便打开哪一只箱子，里边一定有一些好看的东西”，并且“里边是无穷无尽地什么都有，这里边所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于是“我翻遍了里面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陈旧的储藏室的积存物都被我翻了出来”。只有儿童眼中的储藏室才如此新奇有趣。在成人的视角下储藏室探险这样的叙事内容是被搁置的，只有在儿童视角下的特有叙述中这一内容才得以进入文本的叙事系统。

儿童看待生活人事的眼光是天真的、无邪的、陌生的、非理性的，他们把生活的厚厚尘埃擦拭掉，让诗性与神性的光辉放射出来，他们拥有“质朴无华的童心”，因此儿童“更善于忠于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而且当他们“用清澈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然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十分清明，充满温馨”^{[3] (p252)}于是儿童视角里的人生就有了更多的诗意、优美和快乐，因此“儿童视角里的成人世界是一个诗化了的成人世界，是被儿童的纯净眼光和心灵净化了的成人世界。”^{[1] (p105)}“我”在储藏室与有二伯共同偷盗的秘密及有二伯偷大澡盆的事件等在儿童视角的观照下都成了一次次有趣而富有诗意的冒险。“他的肚子前押着铜酒壶，我的肚子前抱着一罐黑枣，他偷，我也偷，所以两边害怕。有二伯一看见我，立刻头盖上就冒着很大的汗珠。他说：‘拿吧’。他一点没有阻挡我。我看他不阻挡我，我还在门旁的筐子里抓了四五个大馒头，就跑了。”两个人同时偷盗彼此发现，“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是在偷黑枣，若让母亲晓得了，母亲非打我不可，平常我偷着拿鸡蛋馒头之类，拿出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去吃，有二伯一看见就没有不告诉

母亲的，母亲一晓得就打我”。所以“我”趁机（毫无成人的机心）与也偷也害怕的有二伯作了一桩交易，在这里，没有成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与约束，偷盗没有可耻可恶的标示与冠名，似乎只是“我”与有二伯的一场游戏，只不过是两个人要共同遵守游戏的规则而已，彼此保守在心底。这与儿童的普通游戏并没有两样，有二伯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就是说“我”的意识里并没有把有二伯定位为一个“成人”，而是定位为一个“儿童式的成人”，我不说出去你，你也不能说出去我。非常的天真幼稚，这桩交易在“我”的眼里就是儿童间的一个相互信任并且真诚郑重的约定。整个的事件过程都是儿童化的，具有鲜明的儿童色彩。

不仅“我”与有二伯的偷盗秘密有趣、诗意，有二伯偷大澡盆事件更是一出冒险的喜剧。“那大澡盆是白洋铁的，在太阳下边闪光湛蓝，大澡盆有一人多长，一边走着还一边咣咣咣咣地响着。看起来，很害怕，好像瞎话上的白色大蛇。那澡盆太大了，扣在有二伯的头上，一时看不见有二伯，只看见了大澡盆。好像那澡盆自己走动了起来似的。再细一看，才知道是有二伯顶着它。有二伯走路，好像是没有眼睛似的，东倒一倒，西斜一斜，两边歪着”有二伯成了戏剧里的跳梁小丑，“东倒西斜”，而如“白色的大蛇的白洋铁澡盆”成了有二伯的道具，“我”一点也不憎恶有二伯的这种偷盗，而是把它看作一件趣事，一件发生在日常生活里的小小插曲。不管偷盗的喜剧还是偷盗的冒险在“我”——一个儿童天真无邪的善良的眼光洞彻审视下都呈现出一种诗化的明快。

《呼兰河传》中儿童视角的选择塑造了活泼纯真的儿童叙述者，建构了文本内容上的儿童色彩，而儿童心灵特有的质朴稚嫩及视角的晶莹纯净，则使文本的叙事口吻、叙事语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新鲜的诗化特性。

儿童由于缺乏知识的积累与储备及社会人生阅历打磨的不足，其感受认知的方式是非理性的，其思维完全是感性直觉的，完全不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的进行思想表达，从而呈现出生活本来的面目，生活本身的原生态情境，这就形成了《呼兰河传》中儿童特有的“奇特的虚拟语气”及儿童特有的语言。这种“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的孩子，充满

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4](p90)}小说一开始就以一系列景物描写突出了呼兰河小城的严寒，“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人的手被冻裂了。”“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思维天马行空，而接着笔锋一转，写十字街，写店铺，写学堂，写大泥坑，尤其是大泥坑，马陷进去了，猪淹死在里面了，小孩掉下去了……活化出一幅幅多彩的图画。这样忽东忽西，由此及彼，没有中心，漫无边际而又不厌其烦地絮絮而语，只有孩子才会这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同时，“我”的语气又是一个“口齿伶俐又有点饶舌的受宠爱娇的小姑娘”所特有的。“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带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每个句子都是短小而完整，活生生地一个小女孩在耳边不停地嘀嘀咕咕。正如赵园所说：“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我想，这种“意义之上的东西”也就是其诗化特性。这样嘀嘀咕咕的孩子气的语调、孩子气的语气呈现出一种单纯、纯净的美。祖父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的世界是自由、欢乐的，是封沉于时空的一个童话世界。

儿童的视野是单纯天真的，“思维具有很大成分的具体形象性”，他们眼中的世界是“非常别致的世界”。汪曾祺在评价《桥》中的《万寿宫》一节中说：“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具有天真的美”^[5]而《呼兰河传》中“我”的世界也同样具有天真的美，表现外在世界的语言也同样附着了儿童的特性。儿童以其特有的质朴的童心观照世界时，世界是诗意的。《呼兰河传》中儿童视角下的语言表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性质，不加雕饰，极其新鲜、生疏，同时又直率、自然。“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

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在“我”的眼里，只有园子里的太阳是特大特亮的，花、鸟、虫一切都是活的，一切都是愿意怎样就怎样。语言也同她眼中的世界，没有伪饰矫情，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简短朴素，直率坦诚，“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秀韵天成。这一“清纯稚拙，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而又“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清纯中内蕴着醇厚的意韵”^[6]的语言使文本中诗化的韵律弹奏着铮铮流音。

二、美学意义

如果说儿童自我形象，儿童色彩，儿童口吻与语言外在地呈现出了儿童视角下文本的“诗化特性”，那么最跟本地导致这种“诗化特性”的则是儿童的思维特征、思维模式。“儿童的思维是感性的、直觉的，没有理念的束缚，缺乏抽象判断推理的浓重理性”，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世界，总是以感性的态度去感知和了解世界，并对世俗生活做出直觉的把握。

“根据皮亚杰对儿童的研究‘儿童在没有达到一定年龄之前，不能不把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事物相混淆’，表现出意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智力的、道德的‘现实主义倾向’。因此‘儿童在看待自然界和其他人时，没有考虑到自己作为思考者的客观地位’，^{[7](p128)}他们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跟他们一样的存在物，分不清你和我的差别，甚至认为他知道的别人也同样一定知道。对于儿童来说，现实是生气勃勃和有生命的，他们将一切都看作是有生命生命在他们的思维中是一个泛的概念，一个朦胧的概念，他们对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区分是混沌的，在他们眼中整个世界的一切人和物都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也就是说“儿童最早的活动既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身中心化”。他们以自身为中心，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现实，他们都是“与人的活动相类比来解释外部现象的”。如《呼兰河传》中“我第一次看见河水，我不能晓得这河水是什么地方来的？走了几年了？”成年人的思维里河水是“流”，在“我”看来河水和人一样是“走”的，和人一样

是有血肉和感情的。这是儿童智力的现实主义。儿童这种意识的自我中心主义所导致的“万物有灵论”不同于成人的“泛神论”哲学观念，“后者对于世界的想像与认知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而前者则表现出原始性和自发性，其想像与认知不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形式，而是意识的原初形态，这与成人的从观念到观念，从观念的规约之下认识事物的思维定势是完全‘异构’的。”^{[7] (p129)}因此儿童关于世界的新鲜有趣的想像和结论对成人来说是新鲜陌生的，是饱含着诗情的。

《呼兰河传》采用儿童视角，回忆记录故乡童年，呈现出诗化特性。小说中的童年往事是在成年叙事者的追忆过程中显示的，其叙事是一种回溯性叙事，这导致了“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出与入。‘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在方式，激活（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及语言；‘出’既是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呈现）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1] (p109)}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认为：小说的本性是作家创造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于是文本中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事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8] (p209)}这样，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被并置，两者的世界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儿童世界的美丽、自由、无忧反衬了成人世界的落后、愚昧、残酷，在深层上揭示批判了成人世界林林总总的病痛和荒谬。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成人的自私、虚伪、贪婪、残暴、愚昧、荒谬……原汁原味地突显出来。国民灵魂的麻木得到了沉痛的拷问。儿童纯净诗意的目光下潜藏了成年的作者对民族、对人性、对人类生存的通达却又无可奈何的慨叹。

三、缘由

《呼兰河传》中的萧红之所以采用儿童视角，呈现一种诗化特性，我认为这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内心情感等主体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心灵深处情感的呈现与表达，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私人化的，是作家独特的个人体验，而萧红“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的创作”的情绪型、体验型作家。在作品中她“溶进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

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她一直不停地流浪，不断地离开，被家庭、爱情和社会不断地放逐。为了逃婚，毅然决然地离开家，自此“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永远不能停止舞蹈，除非生命终结。呼兰河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萧红的家，这样，她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4] (p95)}于是她不停地离开，不停地逃离，不断地“在路上”，北京、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光里，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萧红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一直在路上奔逃，奔逃……“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我走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萧红与王恩甲同居被骗，身怀六甲而身无分文，困于哈尔滨的旅馆险些被卖。与萧军偶遇相爱，可好景不长，两人之间出现了裂隙，最终劳燕分飞，与端木的结合也是一场支离破碎的梦，最后她孤身一人漂泊在香港，生活的不稳定及伤痛，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病痛、孤独、寂寞、无奈噬咬着她。她就“像一颗沙砾，从异乡又奔向异乡”，“沙砾随风移动，却永不可能与任何其他东西融合”。^{[4] (p96)}香港也是与她不相融的，它只是一个驿站，一个异乡，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在香港，她“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所以萧红只有在回忆中去靠近梦幻般的故乡、童年。从回忆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归宿，以此来弥补现实中的缺失和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正如普鲁斯特在写作中回忆，在回忆中写作进而把回忆当成个体生命的现实形态一样”，^{[4] (p97)}萧红用回忆温暖着凄凉寂寞的心境，对抗着现实生存的无奈与虚空。

“回忆的既是沉思的，把经验和事物推到一定的距离（时间的同时是空间的）之外，诗人围绕着它们思索而成诗”。^{[9] (p115)}若“与现实贴的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6]对于萧红来说，经历了生活的历练，经历了内心的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遥远的故乡、童年无论在时间意义上还是在空间意义上已经是一个“岁月的见证”，一个“异国”，“一切都已经过了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6]。故乡童年转化为了回忆的宝藏，呼兰河城、后花园成了她诗意的生命的乌托邦，她回到了生命“最初的幸福”。当以平静的心境遥望那横亘在时间长河

里的“最初的幸福”时，那幸福是极致的，是绝伦的，是梦一般的，是诗一般的。因此萧红的回眸是诗意的，她的故乡、童年是清新莹洁的，呈现出诗化特性。

汪曾祺说：“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入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萧红正是挣扎于“泥淖”与“青云”之间，在那远离尘嚣的梦境里她守望着现实生活的孤独、寂寞与凄清。同时又把人生的理想封寄于童年的无邪与纯真，在诗意的故乡、童年里留连徘徊，固守着生命之根。

“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如流星划破天空，光芒四射”的萧红诗意大胆地抒写了“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她以诗人的心性，赋予了《呼兰河传》深沉的诗意之美。

四、结论

我的这篇拙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上更深入地解读《呼兰河传》的诗化特性、诗意之美，解读儿童视角建构下的文本的叙事特征及其美学意义。试图探讨萧红采用儿童视角呈现诗化特性的主观因素。《呼兰河传》以儿童视角建构叙事文本，文本呈现出诗化性的叙事特征。天真活泼的儿童形象、文本叙事内容上的浓厚的儿童色彩、儿童特有的叙事口吻及叙事语言具体地显示出了这一特征。儿童由于思维的直觉性使得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对于成人来说是新鲜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陌生化。但同时由于成人的作家不可能完全不介入文本的叙事中，于是儿童视角建构下的叙事文本出现了两种叙事眼光，一是儿童的眼光，一是成人的眼光，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被并置，儿童世界的美好与成人世界的丑陋构成对比，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张力，拓深了作品的内涵，儿童诗意的目光下潜藏了一些更深刻的东西。这种儿童视角的采用诗化特性的呈现，我认为与作家主体的个人经历、内心体察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研究《呼兰河传》的儿童视角、诗化特性所不应忽视的。由于鄙人学识的有限，时间的紧迫，论文存在着许多不足，有的地方论证的不够深入，不够严密，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 [1] 王黎君.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J]. 文学评论. 2005. (6)
- [2] 萧红. 呼兰河传[A]. 萧红小说全集[Z].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 276.
- [3] 曹文轩. 面对微笑[M]. 泰山出版社, 1999, 252.
- [4] 宋晓萍. 萧红的地: 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J]. 天津社会科学. 1999. (4)
- [5] 吴晓东, 倪文尖, 罗岗.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阈[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99. (1)
- [6] 徐晓红. 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文学视界 <http://www.white-coiiaar.net>
- [7] 范智红. 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28-129.
- [8]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09.
- [9] 范智红. 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15.
- [10] 杨霞. 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综述[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 [11] 熊立. 论童年经验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 [12] 王洪涛, 胡亭亭. 论萧红小说中的童年视角[J]. 学习与探索, 2006(3)
- [13] 姚华. 自我言说的超越——《呼兰河传》的叙述视角解读[J]. 湘南学院学报, 2005, (01)
- [14] 张升阳, 冯昊. 萧红: 一个边缘的叙述者[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 (05)
- [15] 姚丽芳. 试论《呼兰河传》的叙述模式[J]. 江西社会科学, 2001, (10)
- [16] 姜红. 回归诗性之家——评《呼兰河传》[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1998, (02)
- [17] 何江凤, 黄康斌. 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04)
- [18] 高云书. 论萧红作品中的个体意识[J]. 甘肃农业, 2005, (04)
- [19] 林幸谦. 萧红早期小说中的女体书写与隐喻[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4, (04)
- [20] 王品. 寂寞独语——由《呼兰河传》谈萧红独语式小说[J]. 美与时代, 2006, (2)
- [21] 李德平. 论《呼兰河传》的艺术风格[J]. 晋中学院学报, 2006, (1)

(作者简介: 韩灵,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15级学生。)

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考

——以 COVID-19 为例

□ 李佳倩 指导老师：魏清彩

庚子鼠年伊始，COVID-19 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给各个行业尤其是旅游业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重创。据统计，以国内为例，每隔 5-10 年都会爆发一次或大或小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每发生都会给属于旅游业的 OTA 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OTA 企业该如何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市场发展态势，及时调整企业短期发展战略，并对疫情结束后的企业长期发展做出战略部署，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今后应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 OTA 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绪论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 OTA 企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研究凤毛麟角，多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于旅游景区、整个旅游行业或者经济的影响研究。如陈曦发表于科技日报（2020-03-19）的《科技助力，旅游业危中寻机》和李凤整理于中国旅游报的《文旅行业要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2020-03-09）分别从对科技和信息技术助力旅游业转危为机进行了研究。楚永珍的《菏泽市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2019）则是对菏泽市（某一地区）的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进行了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杨萌的硕士论文《国内在线旅游电商企业商业模式评价研究》（2016）对本文相关概念界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指导、巅峰智业主办的文旅振兴公益在线巅峰大会（20200301）邀请众多互联网专家于科技创变板块对 OTA 未来发展做出了系列解读，对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些许启发源泉。

（二）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 OTA，研究范围是中国境



内（包含港澳台地区）。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 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举措，二是消费者对 OTA 应急举措的感受，三是疫情期间 OTA 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问题以及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 OTA 应对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

（三）概念界定

OTA，Online Travel Agent（或 Online Travel Agency），在线旅行社或称在线旅游服务商，在本文中，主要指的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借助 PC 端、移动端或掌上电脑等电子设备，依托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上支付等电子信息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交通、住宿、门票、导览等预订服务及目的地环境、价格、风俗等信息搜索服务以及其他旅游服务的在线旅游企业^[1]。与传统旅行社不同的是，除旅游活动中的服务体验外，其余包括售前咨询预订和售后反馈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在网上进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人群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划分为特别重大（I 级）、重大（II 级）、较大（III 级）和一般（IV 级）四级。^[3]

VR 旅游,即虚拟现实旅游,也称虚拟实境旅游。指的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借助计算机、三维可视化、3DMAX 建模、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等技术手段,对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进行处理,使得与所构成景物不相吻合的空间内存在交互式的逼真的景象的一种不同于传统目的地旅游方式的新的旅游方式。

(四) 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和点评分析法

问卷调查法和点评分析法主要应用于收集消费者感受情况相关数据。

2. 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

定量分析法主要应用于问卷数据及点评数据,定性分析主要应用于相关的概念理论阐释。

3. 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应用于对整个 OTA 的相关研究的阅读整理,个案研究法主要应用于本文中选取的代表性重点 OTA 的文献阅读及个案调查。

(五) 研究创新点

1. 关注旅游者对 OTA 售后的感受

疫情发生以来,部分主流研究机构对旅游者是否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选择旅游活动进行了调查,但是鲜有进行旅游者对 OTA 售后感受的调查。大多数人可能认为,疫情发生属于不可抗力,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等待 OTA 的退订政策。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好的售后是最好的营销。在经历了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后,OTA 还能留住多少“老顾客”,有多少消费者因为一件这样不可抗的事不再选择以往的 OTA,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 OTA 应该关注的,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和创新点。

2. 有效利用点评数据

因部分平台存在刷好评的现象,点评数据一般是不被采用的。点评数据的输出者均为已经接受过 OTA 服务的人,因而点评数据是具有极大参考度的。点评数据可信度不高的原因无外乎部分刷好评及控评行为。事实上,近几年随着网络环境的进一步规范,此类现象已经所剩无几了。同时,在本文中,为进一步提高点评数据的可信度,创造性地采取人工过滤无效点评的方式,使数据有效率达到 100%。

(六) 逻辑结构

第一部分为绪论。通过查阅大量文献,确定研究内容,进而界定论文所需概念,选择研究方法,并初步确定研究创新点和全文逻辑结构。

第二部分为 OTA 应对 COVID-19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举措分析。通过对 OTA 公开资料的搜集,对 OTA 应对 COVID-19 的举措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与后文消费者感受形成对应或对比。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为消费者对 OTA 举措的感受分析。通过问卷调查法和点评分析法的双重方法,从不同渠道搜集 OTA 消费者的感受,与前文 OTA 应对举措呼应对比。

第五部分为 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通过前文 OTA 应对 COVID-19 举措的分析和消费者对 OTA 感受的分析,得出 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而可行的建议,包括疫情期间和疫情结束后的建议。

二、OTA 应对 COVID-19 的举措分析

COVID-19 疫情发生以来,以携程、飞猪、同程艺龙为代表的 OTA 企业纷纷采取各项应急举措应对线下旅游活动无法进行的危机,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一) 及时制定退订政策

疫情发生以来,各大 OTA 平台分别针对旗下产品制定了退订政策,以无损退订和退还未生效业务费用为主,如携程、同程艺龙、途牛、去哪儿等。疫情发生(一般以 2020 年 1 月 24 日为界)前订的依据国家政策免费退还全部费用,其中,涉及境外部分的由平台进行交涉,最大程度保障消费者利益。

同时,推出疫情期间预订免费退订政策。例如,携程旅行推出“预见世界 疫后同行”活动,5 折起预售,且提供退改保障。此举既为消费者提供了较为低价的同品质旅游服务,又有助于中下游企业(如酒店、景区等)回笼资金渡过难关。对于 OTA 来说,此举也有助于提高消费者黏度,大概率地保有“老顾客”,利用疫情期间衍生的“宅经济”吸引“新顾客”。

(二) 推出会员权益延期政策

经调查发现,大部分 OTA 平台是会员制,会员权益有限次安心退、体验升级、每月立减、贵宾抢票等等,是 OTA 企业提高顾客黏度的途径之一。

针对疫情的发生,各大会员制 OTA 平台纷纷

推出会员权益延期政策,如携程、同程艺龙等。此举不仅降低了疫情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也提高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从而更倾向于选择企业的服务。同时,也有助于疫情结束后提高旅游者的旅游热情,有助于旅游业整体的恢复。

(三) 及时提供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包括出入境信息汇总、同行程信息查询和旅游目的地信息推介等。

疫情期间,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针对中国人的出入境政策。大部分 OTA 企业纷纷上线出入境查询专栏,切实为出入境的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如 Booking(中国)上线了持续更新的“出入境信息”专栏,马蜂窝上线了“全球疫情/出入境/航班变更汇总”专栏,途牛和凯撒旅游都上线了持续更新的“目的地出入境政策重要提醒”和“使馆及签证中心开放时间”栏目,Trip advisor(中国)上线了“多国入境及航班政策变更汇总”栏目。其中,途牛、驴妈妈、Trip advisor(中国)、马蜂窝、去哪儿等均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该类信息。马蜂窝疫情响应速度应该是最快的,最早可追溯到2020年1月22日。

同程艺龙、去哪儿等 OTA 平台纷纷上线了“确诊者同行程查询服务”,为保障消费者安全及时隔离提供了技术支撑。既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也体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多个 OTA 上线了旅游目的地信息推介项目,如携程的“云游世界 心向远方”和“足不出户 听游世界”,同程艺龙的“世界听得见”,飞猪的“夜游东方明珠直播”等,不仅为宅在家中的游客提供了消遣的途径,也为旅游目的地进行了推介宣传。将在下一板块“推出免费云游服务”详细介绍。

(四) 推出免费云游^[4]服务

“云”现象并不是本次疫情发生后才出现的,却在本次疫情发生后迅速进入大众视野。疫情助推了“宅经济”的发展,进而滋生了“云经济体系^[5]”,进而衍生了一系列如“云课堂”、“云视频”、“云办公”等的“云端产业”。“云游”可以说是其中之一。

“云游”是众多 OTA 平台在疫情期间的安排之一。它们有的是利用声音,如携程的“足不出户 听游世界”和同程艺龙的“世界听得见”,旅游者点击图片获得导游绘声绘色的讲解,以此来达到“出游目的”。有的是利用社区旅拍,如携程的“云游世界 心向远方”等,通过他人的文字描述配合旅图

来达到“游览目的”。有的则是借助直播请网红带全网的旅游者线上云游旅游景点,如飞猪的“夜游东方明珠直播”和马蜂窝新上线的直播功能及后续直播项目等。

免费的云游服务不仅抓住了旅游者的闲暇时光,也对旅游目的地进行了推介。云游之余还带动了疫情结束后的酒店订单增长(直播卖房间),促进了疫情结束后旅游业的恢复。同时,也是困难时期酒店资金筹集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 制定旅游复兴计划

在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时期,各大 OTA 平台纷纷推出了旅游复兴计划。携程推出“旅游复兴 V 计划”,全面准备迎接旅游业大复苏。

在国内有序复工时期,同程艺龙推出“酒店安心房”服务,为复工的商旅游客提供隔离房服务。

制定旅游复兴计划,昭示了 OTA 对旅游产业全面复苏的强烈信心,给中下游供应商带来一线希望,也刺激了旅游者的旅游热情,是疫情过后旅游产业全面复兴的强有力的定心剂。

三、基于问卷调查的消费者分析

在由“卖方市场”进一步转变为“买方市场”的今天,无论是大型 OTA 集团还是小型 OTA 企业,都不得不关注消费者的感受。企业的优惠便利政策是否能称为良策,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

本文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OTA 平台用户反馈及“云游”接受度调查问卷》,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OTA 平台用户体验和新旅游方式“云游”进行调查。

采取分层调查的方式,借助微信、钉钉、QQ 等社交通讯软件分别对属于学生、上班族和其他的人群发放了调查问卷,采取 113:36:27 的比例,共发放电子问卷 362 份,回收问卷 190 份,回收率为 52.49%。

其中,对用户退改签票体验的调查有效问卷为 42 份,有效率为 22.11%。

对“云游”的调查有效问卷为 185 份,有效率为 97.37%。(信度分析)

(一) 不同人群的消费者平台偏好不同

学生人群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平台依次为:飞猪、携程、美团、去哪儿、艺龙、同程,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5.81%、22.58%、19.35%、16.13%、

6.45%、3.23%。而在上班族人群中，市场占有率较为靠前的平台及其比例为：携程：飞猪：美团：同程：百程旅游网 = 2：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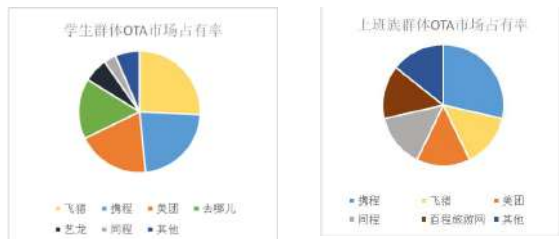


图 3-1 不同人群 OTA 市场占有率

不同人群的消费平台偏好不同，但多集中于国内 OTA 巨头（如携程、飞猪、美团、同程等）。随着学生人群年龄的增长，学生人群 OTA 市场占有率图将逐渐取代上班族人群 OTA 市场占有率图，成为新的上班族人群 OTA 市场占有率图。

（二）不同人群的消费售后处理方式不同

学生人群中，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出行的学生，100% 曾因退改签与 OTA 平台进行交涉。其中，83.33% 的学生认为 OTA 平台的退改签途径易找到，66.67% 的学生表示了解 OTA 平台的退改签政策。

上班族人群中，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出行的上班族，62.5% 曾因退改签与 OTA 平台进行交涉，剩余 37.5% 的上班族未与平台交涉，任由票作废。其中，25% 的上班族认为 OTA 平台的退改签途径不易找到，25% 的上班族表示不了解 OTA 平台的退改签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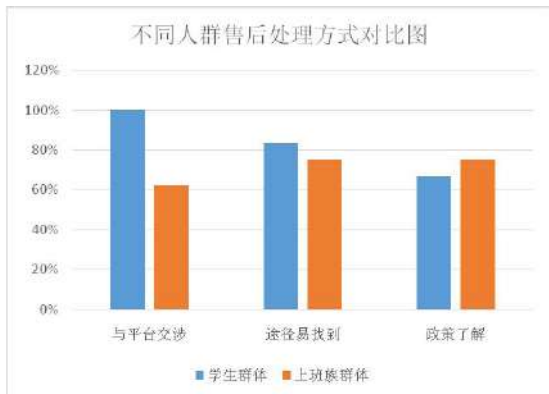


图 3-2 不同人群售后处理方式对比图

不同人群的消费售后处理方式不同。与学生人群相比，上班族人群更有耐心去了解 OTA 的退订政策，但部分人因与平台交涉麻烦等原因选择任由票作废。与上班族人群相比，学生人群更加了解 OTA 平台各项功能的触发点，更容易找到退改签途径。

（三）不同人群的消费售后感受不同

在对 OTA 平台退改签的全过程依据政策、价格、效率、服务等要素进行评分时（分值从低到高依次为：1, 2, 3, 4, 5），学生人群的平均分为 4.31，上班族人群的平均分为 4.5。

表 3-1 不同人群对 OTA 平台退改签全过程的评分表

	政策	价格	效率	服务	综合
学生人群	4.39	4.17	4.33	4.28	4.39
上班族人群	4.75	4.38	4.5	4.38	4.5

不同人群的消费售后感受不同。与学生人群相比，上班族人群对 OTA 企业政策、价格、效率、服务等的包容度更高。在政策、价格、效率和服务四个要素中，学生人群和上班族人群要求从高到低排列均为：价格 ≥ 服务 ≥ 效率 ≥ 政策。

（四）不同人群的消费“云游”感受大体相同

在对“云游”感受的调查中，63.16% 的消费者表示愿意尝试新的旅游方式，足不出户地完成旅游活动。其中，学生人群的接受度为 65.52%，上班族人群的接受度为 60%。愿意尝试新的旅游方式的原因由强到弱依次为：不受时间限制，更易于接受；景区拥挤，居家体验无需再前往景区；眼见为实，再决定是否前往景区。不愿意尝试新的旅游方式的原因由强到弱为：无法代替真实体验；会破坏对未去过景区的好奇和憧憬；担心价格昂贵。

学生人群对“云游”的感受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缺少真实体验，没有真切感受”；二是认为目前的“云游”无非是看图片视频，不算是旅游；三是认为缺乏氛围和代入感。对“云游”的建议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互动项目，提升游客旅游体验”；二是推出像实地旅游一样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三是希望能让朋友们一起会更好；四是希望能既有大视角，也有小细节，更加真切。对“云游”的好处称赞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很有创意，在疫情期间给居家的人提供了一种旅游和消遣时间的方式；二是认为足不出户观遍天下美景，很好；也有部分学生希望第一批体验“云游”世界。上班族人群对“云游”的看法，普遍认为旅游产品雷同，缺乏新意。同时，因只展示好的一面而缺乏真实感。

不同人群的消费“云游”感受大体相同，可见目前“云游”产品单一和同质化现象使不通过人群的消费都颇为不满。消费者的高期待度与 OTA“云游”的高单一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云游”

产品亟需创新创意开发。

（五）客服回应速度及办事效率遭到质疑

在对 OTA 平台退改签的全过程进行调查时，部分旅游者提出了“客服回应速度慢及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因此问题较为特殊，在下一部分再详细分析。

四、基于点评调查的消费者感受分析

对于消费者来说，OTA 平台移动端 APP 的下载评论是选择 OTA 平台的重要参考，也是决定是否选择该平台旅游产品的重要参考。对于本文来说，OTA 平台移动端 APP 的下载评论也可以是对 OTA 进行评价分析的重要依据。

采取重点调查、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搜集数据。重点调查的对象为包括携程、去哪儿、飞猪、途牛、同程、艺龙、驴妈妈、凯撒、美团旅行、遨游网、芒果旅行、百程旅行网等在内的 12 个 OTA 平台，典型调查的对象为马蜂窝、穷游网、Tripadvisor（中国）等在内的 3 个 UGC 平台，抽样调查的对象为以微博、大众点评等为代表的 2 个大众社交平台。

为确保数据有效性，本文数据分别从 Ipad 应用商店、华为应用商店、OPPO 应用商店等 3 大应用商店获取点评数据。

因大部分 OTA 平台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推出退订政策，之后 10 天均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统计日期顺延。以一般平台业务等待最长时长 15 个工作日为界，再将日期延长。故而，统计数据开始日期距离退订政策总计 29 天，定为 2020 年 2 月 22 日，结束日期定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点评数据时长总计 20 天。

（一）退改签服务有待优化

在有效的售后点评中，90% 以上反映的都是退改签问题。据点评数据显示，在消费者办理退改签业务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自助处理且无法联系到人工客服，甚至人工客服态度恶劣拒不处理。部分消费者反映，在按照客服提示发送审核文件后，仍有过后十余天未被处理的情况发生。

（二）无损退订政策执行困难

在有效的售后点评中，半数以上反映退改签仍收取了正常退改费用，并未执行无损退订政策。对于拟定出行距离较近、票价较低的旅游者来说，正常退改费用在 5%-20%，勉强可以接受。而对于拟

定出行距离较远、票价较高或预定了特价高额产品的旅游者来说，正常退改费用即意味着退回的费用已所剩无几。对于消费者来说，等同于独自承担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消费者无法接受的。

（三）后台优化运营有待加强

在有效的售后点评中，部分消费者反映移动端 APP 卡顿及强制更新等现象。APP 卡顿极不利于消费者体验和进一步消费，强制更新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困扰。这些现象说明，OTA 在拓宽旅游业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科创^[6]在企业的分量。

（四）企业营销公关尚存缺失

在所有售后点评中，恶意点评数不胜数。极大地影响着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恶意点评泛滥却没受到企业关注是企业营销公关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企业业务的进一步扩大。

五、OTA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建议

通过分析疫情期间 OTA 应对举措，并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点评调查法等调查方法分析消费者感受，进而通过调查结果对比，可以发现 OTA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仍存在消费者体验关注度和市场精准定位程度不够以及技术创新有待提高等问题。以下是调查结果显示的具体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从基层着手，关注消费者体验

疫情发生以来，各大 OTA 平台均推出了无损退订政策，但在各大社交平台及 APP 评论区仍可见到未能成功退订的旅游者怨声载道。对于该类现象，我们以携程为例来看一下。

3 月 10 号，携程旅行网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关于企业新政策“旅游复兴 V 计划”的推广博文，配文主要内容为“新冠肺炎期间，百万级退订的携程旅行客人，获得了携程重大灾害保障金计划的全额退款”。这条博文评论区满是仍未得到退订的旅游者的控诉。

那么，为何在携程官博甚至 CEO 孙洁都亲自表示进行了无损退订后仍有旅游者不满甚至控诉呢？

一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由于管理某些层面的缺失，高级管理层的决策无法准确地传达至低级管理层乃至直接服务者，于是才会出现客户经理对顾客态度恶劣的个例，以及超出正常退订时间很久后仍有未处理的订单这样的事。

企业应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应急机制。加强对

直接服务者的绩效考评和培训，同时提高其服务效率和满意度。适当增加直接服务者的储备，必要时可储备兼职云客服。以此次疫情为例，大部分品类企业大面积停工，导致部分无法线上办公的上班族赋闲在家。而因业务特殊性，疫情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OTA平台都处于退订业务激增的时期，需要大量云客服（可居家办公）。也正是因为消费者业务因工作人员不足无法得到及时解决，才导致部分消费者怨声载道。

二是企业政策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因顾客不知情而错过退改签时间导致无法进行退改签以至失效的例子也时有发生，这种现象虽说消费者应付主要责任，OTA也应尽到一定的提醒责任。

企业应及时宣传企业政策，确保百分百传达对应客户。面对目标客户指定的政策，应确保客户收到信息。退改签费用的利润与长期预订的利润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必要时可采取APP通知、短信、电话、邮件等途径。

三是旅游者对企业政策理解程度的问题。企业政策发布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冗杂没有针对性。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静下来阅读漫长的文字对旅游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大部分内容是与自己无关的。这就造成了旅游者不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OTA的企业政策。

企业应调整政策呈现方式，以旅游者更易于接受的呈现方式来发布企业政策。举个例子，钉钉“一星”事件，其公关部采用了视频“求饶”的方式来巧妙化解，不仅让公众选择性的忽略了钉钉的不足之处，反而收获了更高的人气和认同度。OTA也可以增加采用短视频、Rap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发布政策，而非仅冷冰冰的新闻式。既不失严肃，又不乏趣味和接受度。同时，分门别类，针对不同产品对应的不同旅游者人群，划定不同的栏目来供她们获取信息。在旅游者因不理解政策或不会操作找寻云客服的时候，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机器设定语言或是互相推诿，而是真实的为旅游者解决问题。

（二）市场细分，以大学生和已退休人群为切入口开发新顾客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人群使用OTA平台订票占总使用人数的比例达到了75.61%，以交通票为主。已退休人群使用比例仅占不到1%，使用率极低。

近年来旅游大数据显示，“夕阳红”团体占据

了团队游的大部分份额，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已退休人群有闲暇时间和可支配金钱，且大部分已退休人员思想并不落后，他们手持智能手机，日常生活十分丰富。而大学生人群将在毕业后几年间成为市场消费的主力。大学时期的学生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在此期间培养其对OTA平台专属业务的情怀。因此，以大学生和已退休人群为切入口开发新顾客将会是疫情结束后OTA未来企业发展的重要竞争板块。

（三）加强技术创新，减轻顾客负担

OTA平台移动端APP点评数据显示，部分OTA平台移动端APP存在卡顿、闪退和强制更新等现象。此类现象出现在疫情期间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因疫情而被迫取消的订单导致企业退订业务激增，短时间内APP日活量远超平常水平。

其次，因疫情而被限制的旅游活动被迫由线下全部转为线上，流量激增导致的服务器运行困难未能被及时解决。

此类现象对提高顾客黏度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大部分OTA平台都上线了依托流量平台的小程序，如同程艺龙、飞猪等。旅游者无需另外下载APP即可使用此类平台提供的部分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平台使用的便利度和可接受度。而反观其他一些平台，固守公司研发的APP却不能进行日常维护，导致用户怨声载道，反而是对公司客源的浪费。

应加强技术创新，提供日常维护，减轻顾客负担。可采取聘用专业技术人才或企业内部培训学习交流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科技兴企”，抢先一步拓展新业务

在对“云游”项目的调查中，乐意接受新旅游方式的人群还是比较大的，占比达到了63.1%。可见新的旅游方式是有较高的接受度的。综观疫情受灾严重企业，无外乎产业单一、产品单一、人才技能单一。

OTA企业应积极布局新旅游经济，以期应对诸如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影响。

（五）及时调整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发展计划

疫情的发生，使企业已经制定好的短期发展计划受到严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往指定好的企业发展规划和预期实现会有一些困难，及时调整

止损才能更快地投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去。

OTA 应及时调整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发展计划，必要时可以调整企业营收侧重点，尽量避免企业长时间营收亏损；同时，积极帮助下游旅游供应商“活下来”。

（六）抓住全员待家机遇，挖掘潜在客户

春节期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地区均处于全封闭状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居家多与互联网产品为伴。对于携程、去哪儿之类的互联网旅游公司（OTA）来说，占据疫情期间的线上流量市场对于疫情期间的工作安排来说显得十分重要。

OTA 应抓住全员待家机遇，采取一定的举措挖掘潜在客户，提前为疫情结束后的市场份额做打算。

（七）加强企业营销公关，多渠道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移动端 APP 的大面积差评现象说明，部分 OTA 企业应对疫情时仍缺乏公关意识，对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事关注度不够。

建立专业公关团队，及时有效处理售前售后诸多问题，采取多渠道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是 OTA 企业下一步应该做的事。

结语

中国境内的 OTA 早在上世纪末已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时至今日，仍多充当代理类的角色。与国内互联网巨头相比，盈利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此次 COVID-19 疫情给 OTA 带来了重创，也必将加

速 OTA 行业重新“洗牌”，给 OTA 企业未来发展带来些许启发。

本文通过对 OTA 应对 COVID-19 举措的分析，指出不同人群的消费者平台偏好、售后处理方式、售后感受和“云游”感受的同与不同之处，进而提出有关退改签政策、政策执行、后台运营和营销公关等相关问题，最后提出从基层着手关注消费者体验、以大学生和已退休人员为切入口开发新顾客进行市场细分、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减轻顾客负担、通过抢先一步拓展新业务的“科技兴企”、及时调整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发展计划等意见建议。

下一步，OTA 的商业布局是否会有所倾斜，会倾斜向何处，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 [1] 杨萌. 国内在线旅游电商企业商业模式评价研究 [D]. 北京邮电大学, 2016.
- [2]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EB/OL]. (2003-5-9) [2008-3-28].
-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EB/OL]. (2006-1-10) [2015-1].
- [4] 何珂. “云旅游”替补，别样“风景” [N]. 安徽日报, 2020-03-10 (010).
- [5] 宋清辉.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两大新经济业态 [J]. 中国商界, 2020 (03): 48-49.
- [6] 李凤. 文旅行业要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 [N]. 中国旅游报, 2020-03-09 (003).

（作者简介：李佳倩，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文旅专业 2016 级本科生。）

●学术动态●

李相中博士、杨金华博士获批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2021 年 6 月 9 日，2022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名单进行了公示。此次我校共获批 11 项，我院获批 2 项。历史系李相中博士的《埃德蒙·伯克帝国思想研究》及杨金华博士的《豫籍赴台史家郭廷以与台湾史学发展研究》分别获批立项。

上述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反映了我院各级领导对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青年教师踊跃参加高层次科研工作的热情，展现出强劲的科研潜力。接下来，我院将持续做好 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21 年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申报等国家级、省部级各类项目的申报工作，力求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而为学校科研发展、一流本科专业申报创建、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做出更大贡献。

● 艺术空间 ●



《草亭秋影澹无人》，45cm x 45cm，纸本水墨，2020年曹天成作



《青山如洗》，33.5cm x 33.5cm，纸本设色，2021年曹天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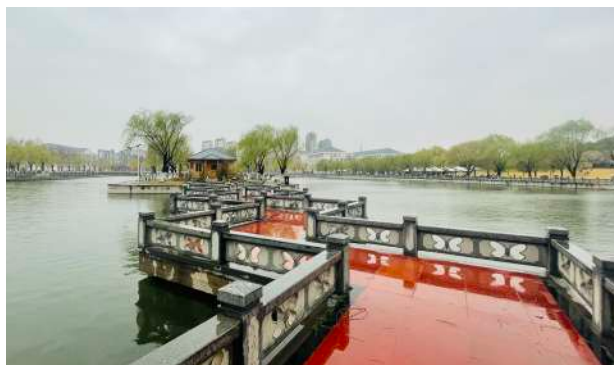


《云山图》，68cm x 68cm，纸本设色，2022年曹天成作

曹天成简介：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商丘师范学院教授、美术学院副院长、商丘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夏梦湖烟雨（一）高远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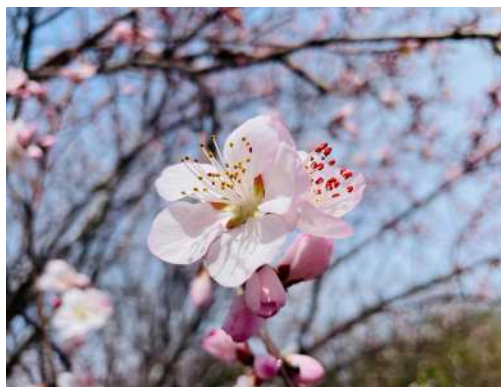
夏梦湖烟雨（二）高远摄影



文秀山春早 高远摄影



春明湖夕照 高远摄影



绽放 麦子 摄影



临水照影 麦子 摄影



雪中春意 麦子 摄影



青春 尚启玉 摄影



光影里的女孩儿 尚启玉 摄影

志道 弘毅
乐知 笃行

应天文化季刊

(2022年创刊)

2022年春之卷 (总第1期)

总 编 辑：吴金山 郭文佳
主 编：高建立 陈晓明
副 主 编：冯志伟 李卫军
卢忠雷
执行副主编：常丽洁 李瑞华
本期编辑：张甲子 孙 佳

主管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主办单位：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编辑出版：《应天文化季刊》编辑部
E-mail: ytwbjk@126.com
联系地址：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55号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